



共产主义者

月刊第5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5.9

时事

江油运动: 还做
梦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理论

我们的
民主集中制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我们是谁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世界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国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双手开拓的更美好的世界！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时事

I	江油运动——还做梦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5
II	少林“CEO”释永信的倒塌：哪还可能有“一方净土”？	10
III	武大图书馆女子诬告性骚扰——网络力量是如何被引导和发挥作用的？	12
IV	中央巡视组——服务于什么？能带来什么？	18
V	《南京照相馆》——荧幕之内和之外的战争	22
VI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凭空而起的“消费节”	27
VII	社保“新规”——不过是皮笑肉不笑	30
VIII	美俄阿拉斯加会晤：帝国主义的虚伪与困境	34
IX	评“共享家园”风波：乌托邦，还是乌龙？	37

41	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X
45	“取消主义”批判：无能、逃避、被动的看客们	XI
52	跳脚、谩骂、胡闹，都收起来罢！——绊脚石们如何、为何破坏革命事业	XII
57	葛兰西思想评析	XIII
71	八十五年之际：托洛茨基思想评析	XIV
97	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历史	XV

理论

江油运动——还做梦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025年7月22日下午，在四川省江油市一处校外建筑内，14岁女生赖某某遭到三名未成年人（包含刘某甲15岁、彭某某14岁、刘某乙13岁）强行脱衣、下跪、拳打脚踢、言语羞辱。其中1女表示“以为我们怕你？又不是没进去过”，另一名女子说“我都进过10多次，没20分钟就出来了”。有媒体报导，事件中的受害者的手机被霸凌者夺去后售卖敛财。8月3号视频开始在网上传播。

迫于不断发酵的舆论压力，官方终于表态，在2025年8月4日来自四川江油市公安局的通报中，称女子仅“轻微伤”，处罚决定：刘某甲处行政拘留13日并罚款1000元；彭某拘留10日并罚款800元；刘某乙因未满14岁，不予行政处罚，仅责令监护人加强管教；另外，两人将送至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其余围观人员受到批评教育。一言概之，校方和警方迟迟未惩处施暴者。据悉，被霸凌女孩的母亲为聋哑人，父亲也是身患残疾，在女孩遭到霸凌后多次前往派出所报案，甚至有图片显示两人亲自下跪讨求说法，但警方始终没有给予应得的答复，因为施暴者中的一方有四川政法委的子女。

群情激愤

这封堪称侮辱性的形式通报一经发出，酝酿积累了许久的群众愤怒被彻底激起。大批市民聚集在江油市政府前声援受害者家属，要求严惩施暴者。傍晚，规模达到巅峰，大规模群众聚集、绵阳警力到达江油。8月5日凌晨3点左右，市政府周边及多条街道上仍有群众抗议。警方开始最终清场，不分青红皂白殴打抓捕聚集的群众，组成队形驱散人群，并对落单即使只是围观群众实施殴打后强行带走。多名市民在冲突中受伤，部分人满身是血。

一名市民开启抖音直播，试图用手机记录现场情况，被多名警察上前围殴，直播也在混乱中被关闭。与此同时，警方在江油多个公共场所展开清查，商场、KTV设点派警

力驻扎，对过往市民的手机和身份证进行检查，禁止拍照录像。同样在8月5日，绵阳市公安局又发布通报称，网传的“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打人”、“施暴者父亲为律师”、“施暴者亲妈是江油市一级警督”说法均为谣言，已对2名造谣者进行了处罚。官方把自己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频发的校园霸凌抗议

早在今年一月份，就曾有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学生党某从学校宿舍坠楼身亡，据蒲城县联合调查组的通报所述，2025年1月1日晚10时许，党某在4楼宿舍因郭某（该校一年级学生）与徐某（郭某同乡）聊天影响自己休息，与郭某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随后，党某在学生会成员陈某的陪同下前往一楼，向政教处副主任雷某反映情况。雷某将党某和郭某带到值班室进行调解后，两人返回宿舍。次日凌晨3时许，党某的舍友黄某在如厕时发现宿舍阳台窗户下放有一张木凳，推拉窗呈开启状态，且金刚网纱窗已被卸下，而党某则已倒在窗外楼下。死者母亲便接到通知前往学校，但学校并未说明到校原因。抵达学校后，她迟迟未能见到自己的孩子，随即却被一名教师带去教室看管，期间不允许离开。在学校呆了几个小时后，她被直接送往殡仪馆探视死者遗体。她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淤青，遂试图拍照，但遭到随行教师阻止。之后她又多次要求再度探视死者遗体，却均被拒绝。此外，知情学生的手机和智能手表被没收，照片被删除。

从1月4日开始受害者家属便在学校门口抗议要求解释，之后更多群众闻讯赶来，到1月5日，死者的舅舅被警方带走，现场事态再度升级，民众大喊“放人”，要求警

方释放被捕的死者亲属。事件在 6 号达到顶峰，现场至少有上千人聚集起来，最后中共官方又以强硬的态度处理消息了本次事件。



劳动群众唯一的希望

在如此长时间以来，无产阶级如从饱受欺骗和压迫还能够一忍再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家庭和子女，劳动群众每天不能够被当作人来对待，拿着只够甚至还不够还清贷款的工资，小心翼翼地在日常生活中省吃俭用不敢犯事不敢表达不满，为了什么呢？反观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为了自己的市场份额，为了自己能够升官发财，为了自己子女的前程宁要牺牲本就积贫的百姓的利益乃至生命，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江油这起事件当中，尤其被霸凌者的父母的身份更令人动容，他们是整个中国社会最无助的一个群体，哑巴和残疾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因为身体的残疾不被接纳从而找不到工作无法供养女儿上学，而自己的姑娘在如此小的年纪遭遇了同龄人的霸凌，自己却无能为力，莫大的痛苦对于任何父母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身体的残疾和弱小无奈让他们不得不向这些不能主持公道的“官老爷”们下跪，得到的却只是更多的欺骗和拖延。任何一个人父人母都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

军队的介入？

比如说，广泛传播的解放军电子战车辆大概率为虚假信息。原推断街边停放的是可以 VHF/UHF/SHF 频谱监视和测向的特种车辆，所属部队应该是西部战区 77 集团军勤务支援第七十七旅，部队驻地在三河基地。（坐标：30.770650478383736, 104.13060394181575, 30° 46′ 13.4″ N 104° 07′ 48.2″ E）但视频中的部署位置在江油无法找到对应特征（宽十字路口 + 窄水沟 + 建筑外观），并且在山东临沂的抖音同城找到了视频源。所以此新闻大概率是谣言。



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此事上升到军队级别，那则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调动由战负责而不是地方政府。这意味着事态的上升惊动了中央，被判断是有不可容忍的危险需要用最“下策”的方法进行扑灭。撕掉“人民子弟兵”的外衣让其进行自己本身并非专业化负责的镇压工作，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处理大多数运动合适的手段，更像是危机时刻保命的孤注一掷；此事件的规模 and 影响，大概率不至于让中央直接介入，地方政府也不会冒如此大的风险。当然，如果真的军队参与到了镇压中，则代表了中国政府内部协调可能出现了严重问题，或者运动背后牵动了现在不为人知的利益网。

我们的历史任务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

使他越来越强烈，直到他把自己的枷锁打碎。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都给自己扣上一顶“为民”的帽子，可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个？中国政府在此事中自己的丑态可谓暴露的一览无余。这次运动中参与群众的英勇行为，我们相信是给所有鼓吹“中国人奴性强”继而否认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的可能性的的人的一次重击。和这些人相比，群众并没有滞后；滞后的是他们！

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暴力手段在现在扑灭了这场烈火，但他们未来面对的不会是一帆风顺。因为群众将会从经验中学习，而在这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也将打造出革命的领导层。地区的将会变成全国的，自发的将会变成有计划的，无纲领的将会变成有纲领的，零散的将会变成有组织的。

现在单单看到新闻感到愤怒，口头声援反抗的战士们是无济于事的。组织起来，让统治阶级看看自己的坟墓！

少林“CEO”释永信的倒塌： 哪还可能有“一方净土”？

河南嵩山少林寺，这座被无数宣传材料渲染为“东方智慧”象征、中华文化瑰宝的千年古刹，在2025年7月27日的那个傍晚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官方一纸通报宣告，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罪名包括挪用和侵占寺院项目资金与资产，以及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一个被包装为“新时代宗教领袖”、被海内外媒体称为“少林CEO”的人物轰然倒塌，成为舆论的焦点。

许多人愿意把这视为个别僧人的道德沦丧，甚至认为这仅仅是一场少见的丑闻，然而，这场风波绝非偶然，而是中国社会如火药桶般即将爆炸的阶级矛盾的显现。释永信的倒塌绝非孤立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危机和官僚体系统治压力结合、以对宗教的长期异化为媒介所导致的必然产物。正是这种结合，将一座**古老寺院彻底改造成牟利机器**，**将信众的精神寄托变成可以定价出售的消费品**，并将宗教领导人推上企业家的宝座。也正是这样的结合，导致释永信作为这一体系代表的垮台。

二十多年来，少林寺逐步脱离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刻板印象中的清净精神，成为**以市场逻辑为驱动的巨大商业帝国**。门票收入节节攀升，一年数百万游客，光旅游门票就带来以亿元计的现金流；围绕少林品牌的授权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包括功夫表演团、保健产品、旅游地产、影视版权、武术学校，甚至海外分院。少林寺已不是求道者的净土，而是资本支持下消费主义的轮回之所，是地方财政的摇钱树，是宗教品牌化、商业化最成功也最赤裸的案例。释永信正是这一切的操盘手，他拥有现代企业家的所有特征：熟练的品牌运营、娴熟的谈判技巧，却丧失了人们脑海中僧侣本该坚守的戒律与出离精神。**当宗教与资本结合，逻辑就彻底改变了。信仰不再是心灵慰藉，而是可以定价的商品；参拜、开光、祈福都可以明码标价，修行课程变成收费培训，所谓的佛教智慧成为广告噱头。**寺院不再关心信众的精神成长，而是统计游客数量、评估收益报表。少林寺不再是信众追求宁静与觉悟的道场，而成为了功夫表演的景区，成为了商业品牌的营销基地。这是中国近二十年来宗教市场化、旅游产业化和地方财政依赖景区经

济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视寺院为财政收入来源，释永信拉来投资所依靠的资本家视其为品牌资源，少林寺内的宗教精英视其为个人利益的攀升工具——释永信垮台后，一切照旧，新的住持很快面带微笑登上舞台。**少林寺的一切繁荣建立在对天真的劳动人民之朴实信仰的剥削之上**，信众为香火与法会掏出真金白银，却得到一场资本化表演和商品化的虚假安慰。

释永信不过是这部机器的明星齿轮，他的“成功”完全来自地方政府的勾连、使少林寺享有特权地位，宗教品牌化带来的巨额财富又让资本蜂拥而至。在这样的体系中，个人品德的堕落绝非偶然，而是被资本主义市场所看重的特质——对权力的顺从，对资本的敬仰，对信仰精神的抛弃。

人们或许会问：既然释永信的生活腐化和财务问题早在2015年就有人实名举报，为什么当年没有查处？那时自称“释正义”的僧人公开指控他生活淫逸、财务黑幕、包养情妇并有私生女，但调查不了了之。答案很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未允许触碰这一利益链条**，宗教资本化仍是地方财政和宣传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连中央政府都还能容忍这样的行为越做越大。十年后的今天，局势变化了，地方财政压力陡增，中央反腐持续推进，社会舆论对宗教商业化的质疑越来越多，这条曾经稳固的利益链条出现了裂缝。显然，释永信的倒台并不是正义觉醒的象征，而是中国政府内权力斗争扩大化的副产品，是体系内部自我调整的结果。今天倒下的是释永信，明天可能是另一个“宗教企业家”、人民企业家。**只要市场经济所主导的、对宗教、信仰和一切上层建筑的异化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释永信。**

我们要求的不是通过体系内部的修正来改善宗教，而是让群众在掌握物质生产资料之外也掌握精神文化的生产和分配权。宗教作为历史特定阶段的现象，已经落后于当前生产力巨大发展的信息社会，**势必要在未来消亡**。宗教如今还能生存繁荣，完全是因为它被进入晚期的资本主义看作延长寿命的盟友。**无产阶级应当坚持无神论观点**，则作为战线的一部分，首先就会要求宗教不再服务于资本的无限增殖，折去资本主义的一条臂膀，进而促进宗教消亡。只有当无产阶级群众掌握社会的全部资源——这当然包括宗教和精神资源，他们才不再成为官僚与资本家的附庸。

释永信事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宗教资本化、资本主义和官僚主导下的社会精神异化的全部丑陋。不仅是宗教，革命文化遗产也面临这种处境。我们必须看清楚，只有推翻这种将信仰异化为商品的制度逻辑，广大群众才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解放。否则，即便释永信倒下，未来还会有无数个“释永信”从这片土壤中再度生长。

武大图书馆女子诬告性骚扰——网络力量是如何被引导和发挥作用的？

2023 年，武汉大学女学生杨某某发文称，在图书馆自习时被男学生肖某某“性骚扰”。事后，武汉大学给予肖某某记过处分，后杨某某在 2024 年 6 月，杨某某以性骚扰指控民事纠纷形式起诉肖某某。2025 年 7 月 25 日法院裁定驳回女方指控，认定不能证明构成性骚扰。在 2023 年就已经引起巨大社会讨论的此事件于近日又引起了新一轮的广泛讨论。

因为此事件横跨的时间较长而且较为繁杂，我们可以先在下文梳理一条时间线出来。

2023 年 7 月 11 日武汉大学文理学院图书馆当事人肖某某与当事人杨某某同在图书馆内自习，自习过程中，据杨某某称，自当日下午六点后，肖某某反复揉搓其大腿根部，杨某某怀疑其在进行自慰行为，随后在七点至八点十分这一时间段内，杨某某在肖某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录制共计 5 段视频，视频时长总计 4 分 50 秒。据杨某某称，八点二十分，其与肖某某对质，并要求肖某某书写道歉信。之后，杨某某与肖某某辅导员联系并向校方举报称肖某某行为涉嫌性骚扰。

10 月 7 日校方调取监控，认为无法证明存在性骚扰，而后杨某某拒绝肖某某辅导员及家长所提出私下解决意见。

10 月 11 日，杨某某在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上透过“景容饮冰”发表长文《关于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受到性骚扰这件事情》，公开举报肖某某，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并有大量的对于肖某某的网暴行为。同日，武汉大学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当晚，肖母与肖某某向警方报案称被诽谤。10 月 13 日，武汉大学以“存在不雅行为”给予肖某某记过处分。

2023 年 10 月 17 日，肖某某被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至 12 月病情恶化，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并被评估有 80% 自杀或自残风险。而肖某某的祖父亦因看到网暴当场昏倒，半年后离世。

2024年2月，肖母公开肖某某就诊记录，表示儿子是因为湿疹复发而隔衣抓痒，否认相关指控。同年肖某某就记过处分，对学校提出申诉，并对网暴提起民事诉讼。

2024年6月，杨某某以性骚扰指控民事纠纷形式起诉肖某某，要求肖某某在省级或以上报纸上刊登公开道歉，并支付精神抚慰金。

2025年7月25日，法院一审宣判，肖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驳回杨某某指控。在判决结果公布后迅速引发巨大社会讨论。

败诉后，7月27日，被指认为杨某某的账号在多个平台发表对于肖某某的嘲讽言论，炫耀其顺利毕业以及和通过法考，并将前往香港浸会大学，同时进一步泄露肖某的个人信息。在杨某某公开嘲讽后，网友扒出其硕士论文，其中的诸多低级错误例如“离婚法”等等引起关注，知网上其论文下载量达到十几万，并有人士对其论文以学术造假等理由进行举报。

7月31日，有博主公开其深夜被疑似校方伪装成的警察上门骚扰，进一步点燃舆情。

8月1日，武汉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尊重司法判决结果，已组建工作专班正对肖某某纪律处分、杨某某学位论文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复核。同时多个平台出现大量为杨某某搅混水的评论，疑似所谓豆瓣生活组等极端女权团体等进行组织行动。

纵观全事件的发展经过和舆论的转变和发酵，男女性别、网络暴力、高校官僚、无良自媒体等等问题缠绕在一起，引发了巨大讨论和争议。

谁在引导舆情？

在整个事件中，我们可以先看到此次事件为何会引发社会关注的起因：杨某某通过微信公众号上发表《关于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受到性骚扰这件事情》，同时多家媒体对其转发评论，共同引导了对肖某某的蓄意网络暴力。

对于杨某某来说，当其与校方交涉后明确得知其自身的证据根本不能支撑其诉求，靠着正常的手段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同时任何人都十分清楚，高校的官僚们最怕的就是把事情闹大、引发舆情关注。而女性身份的标识和性骚扰就宛如政治正确的不死金牌，利用社会对于往往是受压迫较多群体的同情心等而为她本人达成目的。舆论施压的目的、身份政治带来的天然爆点和同情心等等造就了她的公众号的长文。

对于媒体来说，爆点和流量才是其追求目的，所谓新闻学的客观真实不过是裱在墙上

的挂画罢了。毕竟有了爆点和流量才有收益，才有源源不断的赞助和关注量，拿到更多经济利益。而这样的所谓“性骚扰”事件，既能挑起男女对立引起争议，又有擦边桃色新闻的影子，关注量和讨论都绝不会少，何乐而不为呢？对于各个网络平台而言也都是同样的逻辑。

利用自己的身份标识，媒体只追求热点的推波助澜，共同营造了对肖某某的大型网络暴力，同时也达成了其向学校施压的目的，很快学校为了稳定舆论而做出所谓“不雅行为”（而不是以性骚扰的名义）的处罚，在各种意义上彻底摧毁了肖某某。

而在一审判决出来后，随着舆论反转，有些媒体却又顺着舆论开始说起什么理性思考，不要舆情审判来了，其只为流量和关注负责的丑恶嘴脸可见一斑。而杨某某在败诉后如同跳梁小丑般的种种博同情和讽刺等表演引发的公愤以至于将舆论从事件本身转向对于其学业论文水平的质疑，只能说是利用舆情后的反噬。



高校官僚的维稳逻辑

在此事件中，武大本身扮演的角色也同样引人关注。

在2023年事件伊始时，轻易调取监控便能说明杨某某的所谓证据根本无法支撑其指

控，同时希望双方当事人调节而使事件平息。而在杨某某发表长文引发巨大舆论后，武大反应也可以称为是“极为迅速”的，当天就成立了专门调查组，两天后就给了处分。

对于有任何会引起不稳定因素的事件，高校官僚们的一致行动便是“捂嘴”，当捂不住时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能迅速平息舆情并且不触碰到“政绩”和实际利益的，那便是怎么快怎么来。至于武大校训里强调的什么“求是”或是德育？这种东西刻在石头上用作美观观赏即可了，毕竟“求是”或者什么其他的道德标语可不会给校领导的政绩加分，但万一舆情久久不能平息导致“有损校誉”，乃至可能引发什么抗议行动了那自己的乌纱帽可就不稳了。

诸如此类舆论事件是需要维稳，还有一类高校遇见的也十分频繁的便是诸如学生自杀事件等等。在自杀事件等等发生后我们同样也能看到这一个平时懒洋洋互相踢皮球的官僚系统是如何迅速的与医疗、公安系统等等相互配合，只需短短数个小时就可以销毁掉一切痕迹，封锁一切校内舆论，并且用诸如保研等实际利益稳住数名例如同寝的知情者，实际就是封口费。

同时在一审判决结果公示后，从7月25日至8月1日足足一个星期的时间校方才做出了正式回应，这与事件发生当日即成立调查组，两天完成调查并给予处分的高效可是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在通告内专门提及其论文问题，而且发布日期正好是有关博主曝光其疑似校方半夜上门后的第二天，不禁让人猜测假如没有后面的舆情进一步发展和曝光，校方还能装死冷处理到什么时候。

从校方在此次事件背后的维稳行为中我们也能一窥当今中共官僚的维稳逻辑，只要是会引发不稳定因素的，先是“私下沟通”捂嘴，如果捂嘴没捂住被曝光引发舆情了，视情况看是迅速高效的处理给一个定论以搪塞舆情，还是在装死冷处理等舆情降温后再站出来给解释。

而在此次事件中逼迫着校方冷处理没有用而被迫站出来解释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众多网民们的挖掘肖某某论文以及武大其余教授等论文的行为，以及持久不衰并且因半夜上门而进一步激化直指武大校方的博主曝光等等，这些便是我们可以窥见的借助于网络信息手段而实现的群众监督的雏形。

网络舆情背后的群众

在此次事件中，我们能同时窥见舆情的两面：在2023年时，在杨某某长文“信息查”以及媒体无良的诱导下充作了对肖某某等人迫害摧残。而在2025年时却又充作了不断保持舆论升温，迫使武大等方给出解释的力量。

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绝不会停留在某些自由派所声称的群众和舆论就仅是“乌合之众”的浅薄视角，就如同我们在“谁在引导舆情”的板块中所写的那样，在这场舆情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借助“985 高校”、“女性”、“性骚扰”等标签以及只追逐流量关注的无良媒体打出的信息查和刻意引导下的暴力。

如果群众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始终是缺失和不完整的，同时又没有任何权力促使相关机构在调查后公开他们的调查过程和证据，自由派口中所谓的“理性”不过是在实际上定义为只有掌握社会资源的那一方才配拥有的——毕竟信息的掌握方实际上就是那实际握有整个社会的资源的那一头，也就是资产阶级等统治阶级。

当他们口口声声以“愚民”来辱骂群众时，他们看到的只是群众在各个事件中被各方利用的表现，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背后他们为何会被各方利用的原因以及各方的真面目——利用社会同情心理的身份政治者、只追逐利益的无良媒体和各个网络平台、急于维稳的校方等等。

但即使如此，群众的自发监督的力量也依然在完全缺失信息监督权和被扭曲的信息获取来源的情况下展现了他的力量——各个网友扒出杨某某的论文学术问题、博主曝光疑似校方的深夜上门、在各个平台给武大的“刷版”和无数信件、给香港浸会大学的举报信等等。在这样的群众监督的力量下，得意洋洋的杨某某的“美好前景”虽然依然无法被群众通过例如参与到浸会大学的听证会投票将其投出而破灭——毕竟掌握实际权力机关的不是群众而是一群横贯于社会之上的官僚，但也依然通过间接的舆论压力得到了初步的胜利。

但是，难道我们要满足于这样一种被无良媒体打“信息差”带偏同时又无法得到有效的公开透明信源等等情况下的实际上极易被利用的群众力量吗？难道我们要满足于只在种种事件发生后才能用所谓舆论压力间接纠正和实现公正吗？难道我们要满足于这帮子做出任何决定完全脱离实际群众，一心只是为自己的乌纱帽着想的官僚们来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吗？

不！我们绝不愿意在这憋屈的被统治阶级肆意妄为操控的环境下成为他们声音的被动接收者和利用者。而这只能是我们群众自己掌握了社会资料实现公有制后才能实现的。

对于各个媒体和平台，在公有制下将不再追求所谓的热度和爆点，他们所要作的就是将他们收集到的信源等等公开透明的报道出来，有任何的春秋笔法和搞刻意信息差迎来的将是群众们对其的不信任撤换，退出相关行业等等。

对于这起事件中杨某某利用的这个身份标识，当我们真正实现公有制时也就不会有人对人的剥削压迫，各个性别和受压迫的特殊群体也才能真正平等的发出自己的声音，

得到最平等公正的待遇。

对于高校官僚，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以学生**自治社团、参与管理**学校，将这批官僚寄生虫赶出学校，并以最为透明和民主的方式执行学校的一切事务。

同时，在公有制下的无产阶级民主也使得网络信息技术能真正彻底的发挥其起到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下最为广泛的群众控制和监督等等职能，使得任何决策和信息都可以得到及时的公开透明等等，也使得选举等民主权利能以最大范围内被最好的实现和贯彻。

但是这样的公有制以及上述图景的实现所要依靠的必须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打碎如今的私有制和国家机器为基础，而这样的打碎必须也只能以最为强大并且日益被资本主义的日渐腐朽所激化和组织起来的阶级——无产阶级所领导，并且以号召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最为团结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革命。

现在就组织和行动起来！为了我们的明天以及真正成为我们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中央巡视组——服务于什么？ 能带来什么？

上月 20 日，二十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这次中央大张旗鼓的活动包含了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广西、重庆、贵州、西藏、陕西、青海、新疆等 16 个省。官媒一边在大肆宣传，群众另一边一头雾水：中央巡视组是什么？是来干什么的？

在当下，社会中部分群体对巡视制度存在盲目的追捧现象。很多人相信，“我们的”巡视组是来“专门来查问题”的！它的任务是监督党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权力运行，看看有没有腐败、懒政、作风不正的问题。官方的解释里巡视组如同“行走的包青天”，代表着中央对基层群众切实利益的关照，是来打击地方横行乡里的恶霸、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护民官”们。

中国政府**试图用肤浅的、逗小孩的解释糊弄群众，来淡化国家机器的性质**并为政权提供正当性不是一天两天了。比如，我们被告知“人民警察”是遇到危险时的救星和公共安全的守护者。的确，警察部队会抓捕伤人害命的犯罪分子，但他们的副业被宣传来盖过了设立的主业——淡化了实施镇压、维持阶级秩序的根本目的。中央巡视组的活动是一样的道理。

维持官僚机器统一性的根本目的

1990 年 3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中提出：

“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根据需要向各地、各部门派出巡视工作小组，授以必要的权力，对有关问题进行督促检查，直接向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报告情况。这项工作，可吸收有经验、有威望的老同志参加。”

表面上，中央巡视组的设立看似是出于打击问题瞒报、地方腐败的目的。但决议对“有关问题”具体指的是什么模糊不清，报告情况的内容涵盖什么方面一笔带过；更可疑

的是，缺乏任何衔接的情况下，突兀的一句允许老干部（还要有威望）参加显得毫无理由。路人皆知的现实是官越老越贪，因为越老官级越大，为什么彻查腐败要用这种最可能油嘴滑头、和地方势力形成利益网的老干部而不用一腔热血、不怕惹事的愣头青、年轻人呢？

因为中央巡视组设立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彻查腐败、打击地方地头蛇。在十四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中他们暴露了本意：

“按照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的有关精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其任务是了解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廉政情况，直接报告中央纪委，中央纪委及时报告党中央。”

不同于今日官媒所宣传的，廉政在这里是只配作为结尾“以及”之后的补充。**确保全国官僚体系运转的统一性，落实中南海的计划在地方被无条件贯彻，才是中央巡视组的根本工作。**作为官僚机器体系中的关键构成，它绝非孤立存在：巡视制度自始至终都在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利益提供服务。



从先秦巡狩制度对早期邦统制贵族利益的维护，到秦汉监察体系助力城镇官僚的统治，再历经唐宋时期的演变，直至明清走向彻底腐朽。这一过程中，巡视制度始终是统治阶级维持剥削秩序的工具，如秦汉刺史制度防止地方豪强势力过大威胁中央税收，却在维护自家田产上与地主豪强勾结；唐宋巡视制度也是如此，它因此也在短暂的有效打击土地兼并后，沦为形式；明清时期更是在邦统主义制度衰落中全面腐败，如明朝巡抚与巡按在“火耗归公”漏洞下大肆敛财，清朝巡视制度在殖民经济冲击下瘫痪。

其根本矛盾在于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决定了巡视制度无法真正实现公正监督。

形式主义表演的局限性

我们绝非是要否定监督本身所具有的必要性，而是旨在揭示任何一种监督机制，如果只是政府的“事务员”自上而下设立的、而没有自下而上建立起群众管理社会的方法，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都必然会沦为维护特定阶级统治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建国前后虽有积极探索，但仍然存在脱离群众、巡视覆盖不足等问题。很多时候负责者眼高手低或出于个人试仕途主义考虑，让监督偏离方向、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主观造假。在这里巡视制度就没有工人民主的根基，被上层特权者操作导致无法发挥其具备的潜力。

改革开放后，巡视制度恢复重构，在适应市场经济过程中，逐渐被改造为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常态化政治组织手段。当前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高度集中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看似提高了监督效率，像在查处周永康这样的重大案件时，似乎契合了当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特性。然而，深入剖析便会发现，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以对地方“一把手”的监督为例，存在明显的畏难情绪。

这种“少数人监督多数人”的模式，本质上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逻辑缺陷。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理应成为监督的主体力量。但现有的制度设计依赖少数精英群体进行监督，广大人民群众只是被动的旁观者，使得根本上无法解决权力监督中的深层次问题。

在巡视工作聚焦的“腐败、作风、纪律、用人”四大重点领域，可能取得了一定的反腐成果，但不可忽视的是，反腐的出发点在于维持阶级不平等制度进行“断臂自保”而非根除腐败，在“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监督上，表现出明显的薄弱。以扶贫为例，大量涉及民生的资金被侵占，却未能及时得到有效监督和整治。现实中“巡视一阵风、过后又反弹”的现象屡见不鲜，以环保巡视为例，在巡视期间，相关问题可能得到暂时遏制，但巡视过后，污染企业往往死灰复燃。这一现象充分证明，单纯依靠周期性的专项巡视，无法触及深层次的矛盾根源。

社会主义下作为一种手段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必须清楚巡视本身不是目的也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但也是可以作为服务于建设新世界的一种手段。

前提是巡视权要切实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彻底解决长期以来“监督者不受监督”的局面；巡视者必须作为公正、民主选举出的**代表工人政权的的事务员**而不是脱离基层群众的特权阶层的分子进行活动；巡视要**解决切实问题**而不是走形式，沦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表演。巡视者发现问题进行处理应当作为针对重大事项的针对性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渠道，**工人群众应有自己的民主渠道实行权利。**

中国共产党的巡视和其虚伪的上访渠道一样，只是**压迫制度的一块遮羞布**。打破这黑暗、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进行。这个前途，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南京照相馆》 荧幕之内和之外的战争

中国的电影行业似乎并不像一个面临困难的行业，它总能够给我们玩一些花样。年初的《哪吒》，就为我们上演了一场战争；于7月25日上映的《南京照相馆》又给我们搞出了一场新的大战。

就电影所描述历史铁证，共产主义者绝对不会和自由主义者，所谓“殖人”一样为了反对中国政府而颠倒黑白。我们很清楚帝国主义对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电影的叙事方法和整体逻辑并不是单纯的记录历史**，它的受众也不是平日会喜爱纪录片的人。通过对事实以特定的方法呈现，《南京照相馆》有自己的私货夹带在其中。而且，这份私货被**动员起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利益**，它不是“中立”的，共产主义者有必要指出这点。

对“国家”概念的模糊和“正义”对抗“邪恶”的童话叙事

战争是残酷的，只有在和平时代过久了又恰好脑子不灵光的人才会否认这个结论。几十载建筑起的辉煌大厦，几秒内就可以被炮火夷平；战争往往不仅摧毁外在的建筑，也摧毁人内在的道德观念。于是，那些在战争中被当作正常的行为，被身处和平的我们称为失序、恐怖、残忍、血腥、毫无人性与禽兽不如。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日本大兵攻占了南京后，中国人立刻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到处都是杀戮与被杀，到处都是奸淫与抢劫。人头滚滚，尸山血海——当然，影片不能只描述那些反人性的场景，否则这只不过是一场猎奇秀。一切都在于杀戮发生的原因，那个贯穿整个影片的线索：南京的沦陷，南京的社会秩序被颠覆了。

然而，这个社会秩序是什么呢？影片没有直接给出来。但是，它做够了暗示的功夫：中国从南到北的大好河山，与南京的诸多景点，以及照相馆顾客在南京沦陷前的相片。这与日军进城后的南京形成了鲜明对比：之前阖家团聚拍全家福，变成了在江边被机枪扫射无一幸免。

后来的日本摄影师，受命从象征中华民族的建筑物那里各拿走一块砖（比如北方的长城和南京的城墙），以建成所谓的“八弘一字塔”。电影中，象征日本的旭日旗、“建设东亚新秩序”标语出现时，伴随的就是象征中国的事物的崩塌和被掠夺。

电影从此出发塑造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日本一方进行侵略、掠夺、屠杀，试图扩大自己的国家，而这必须以中国相应的缩小乃至灭亡为基础**。中国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影片里，中国作为实际存在的人与物的集合，算是溃退了，中国军队在开头的溃不成军和互相残杀说明了这点；人们各顾各逃命，留下者自己学起了日语。但“中国”作为一个观念却在人们心中完美无缺，从阿昌的那句“寸土不让”便可看出来。这被视为爱国的表现。

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影片力求**塑造出一个模糊、高尚而不容侵犯的“国家”概念**。它屡用象征物来表达这个自己不可言状的“国”，把抗日战争解释为两个“意志”层面的国家之间的对抗。我们很难深究：爱的这个国是什么？

比如说，记录了日军罪行的照片被林毓秀带出了南京，并成为激发外国人反日情绪与东京审判定罪的重要依据。在这里，照片是记录与见证的载体，是宣传的重要工具，也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军方面刻意销毁带有罪证的照片，拍摄“中日亲善”的照片。照相馆方面得知自己为日军洗的照片的性质后，便陷入了自我怀疑：为他们洗照片，就相当于当汉奸。好在电影给了他们“赎罪”的方法：把有日军罪证照片带出去。电影通过设置死局与破局的矛盾，将电影的重心放在了照片上。在这里，国家仍是一种象征体系，是影片中人物确证自己身份的方式。而从照片送出去直接跳转到其它国家的反日，也是在呼唤着如此一种预设：是国家的观念统摄着国家的物质，只要这种国家的观念还在，国家就不会灭亡。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预设。翻译王广海就说，日本这么强，中国人又是一盘散沙，日本怎么可能会输呢？严格来说，他并不真的关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观念打败哪个国家的观念，他只关心在他身边的国家的物质，这样，他才能够活下去。王广海的情人，林毓秀则不这么想。她说，日本人不把我们当人，“我们”怎么办？这就是影片演绎其逻辑的另一层需求：光是强调两个观念上的国家的对立还是不够的，因为不同国家的观念此时还只是平等地对立，我们支持其中一方就只能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就不能分辨出，在其中谁是正义的？

因此需要暴行，需要赤裸的、不参杂任何杂念的恶意，需要无人能辩解、同情的罪恶。南京大屠杀恰好就是绝佳的素材。日军的暴行被描绘出来了，没有日本人反对，但是所有中国人都明确地反对，其它国家的人们也明确地反对。于是，国家观念的对立被更高的道德评判。日本人完全违反了道德的原则，因此日本是坏的、邪恶的；中国人

与其它国家的人们遵守了这一原则，因此他们是好的、正义的。正义打败了邪恶，这是大多数**天真的童话故事**的套路。

为了完成这一逻辑，电影还涉及了一条小线索。伊藤秀夫为了洗照片，把阿昌叫做“朋友”。但是，在伊藤秀夫伪善的面貌全部狰狞地露出来后，阿昌说：我们永远不是朋友。伊藤秀夫形象的反转，说明电影把他的逻辑贯彻下去了。它不仅要在国家之间分出善恶，还要在人之间分出善恶；人的善恶则依国家的善恶而定。至此，电影的逻辑完成了。它直接地具有了与现实结合的意义，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套评判现实的准则，而这些准则，最后都落到了**观念上国家的正义与否**。



荧幕之内是战争，荧幕之外也是战争

影片内，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于是，影片外，中国人就不把日本人当人。在一些人眼里，一切有关这部电影的争论，都可以归结为中国人与日本外务省的斗争。抛却人性，是日本军官上给新兵的重要的一课，于是，一些中国人便有样学样，抛却了思考，把所有的情绪都建筑在国家的观念上了。他们不在乎自己逐渐与电影里的日本人长得越来越像，他们只晓得盘算，如何把日本在中国做过的事，在日本再复制一遍。反对的言论，于是都成为日本外务省的安排，他们便进一步不把持异见的同胞当人了。

称颂这部电影的人中有不少还会批评《南京！南京！》，仅仅是因为其中塑造了一个有人性的日本军人角川，因为不把日本人当作禽兽，他们的叙事就进行不下去。他们

既希望日本作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人一样背负责任，却又不接受把日军塑造得真的像人。因为只有这样，“夷平日本”的言论才能在理论上成立。

这种“爱国情怀”最终是廉价的，毕竟“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一个庇护所”。电影里，日本人好歹还会假惺惺地说一句：我们是愿意和中国人做朋友的。电影外，因为这一层“历史的仇恨”，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则这一套包装也不需要了。中国品质上最恶劣、思想上最肤浅并受人操控的一批人，在这个电影的鼓动下，得以把自己服务于最反动的立场、渴望犯下最恐怖的罪行包装的如此冠冕堂皇。**他们和自己所仇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除了皮不一样，里头是一致的。**

也许某些人需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叙事，而是发表廉价爱国言论的机会呢？须知，这种爱国情怀的结局反而是让爱国失去根基。电影之外我们也不乏滑稽戏看：网传小孩看过电影后，回家将日本卡片剪掉。在荒诞的剧目中，我们又一次看到那残缺的逻辑的显现。**仇恨可以被消费了，爱国也是。**他们拙劣而滑稽地表演着仇恨的样子，所求不过那一点流量，结果只会让他的所谓情怀更廉价。

在这里仍然有尚未解决的问题：国家的观念为什么能够统摄国家的物质？国家的观念是怎么来的？“人性”的观念又是怎么来的？“爱国人士”们很少这样的询问，因为国家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是现成的，无需反思的。可是，如果要既承认爱国又承认人性，就需要认为人性中就包含着爱国，于是爱国从道德要求上升为先验情感；而且爱国是一种对特殊群体的要求，人性则是对所有人类的普遍的要求。究竟是爱国所涉及的主权更高，还是人性所涉及的人权更高呢？结果，在实践中，**爱国还是成为了一种道德原则，并且能够以此开除别人的人籍；**人性则足以为他人的没有人性而被忽略。

“反思”、“铭记”历史？利用、剥削历史！

国家之间的对立为何而存在？**民族国家的存在本身，就为自己设立了限制。它把自己限制在一定的地域之内与其它国家相对立，这本身就为冲突埋下了可能性。**这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从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造成的区隔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国内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依靠民族主义来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在电影中，南京在战争前是中国人的城市，在战争后也是中国人的城市。它在试图强调一种社会构建的连续性，一种以民族为标准的连续性，于是，只要是中国的城市，便是中国人民的城市，民族内部取得了完全的同一性。

但是，这种同一性只有靠不断排斥异质性才能生存。兄弟阋墙的事发生的可不少。在**强调私有权的市民社会，恐怕很少有人因为你是同胞就免费给你包吃包住，资本家也不会因为你是同胞就减轻剥削。如果中共真的找日本“报仇”去了，也只会让资本家们赚的盆满钵满，无产阶级收获的则只有战争带来的恐怖。**

中国现在流行的这批电影（比如同期上映的《东极岛》）和反思历史、铭记国耻搭不上一点关系，因为理智的思考在这个市场里没有消费，更无法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他们十分热衷于自己**扒开自己的伤疤，利用、剥削中国人民历史上所受的苦难**，以歌颂这么一个计划：

强军！备战！大炮是用来丈量国土面积的。外国人曾经不拿我们当人，那今天，我们也不把他们当人！

这个计划的前提是：

你**无条件爱你的这个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的“民族”。你不能对我国的政权提出质疑，不然你就是叛徒。

这个电影的误导性因此再清楚不过了。**统治阶级把历史的不幸用自己的叙事方法呈现出来，以转移矛盾并为自己政权现在的所作所为提供“正当性”**。这种题材下，不服务于这个目的的电影，一方面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还甚至会被打压（因为它破坏了这个民族主义的叙事），一方面会因为缺乏被欣赏的市场而中道崩粗。

因此，我们要做的，应当是先**质疑民族国家这一观念本身**：凭什么不同的民族之间要以这样的形式的对立？凭什么要让资本家与官僚的政府代表民族？当工人阶级打破民族国家的枷锁时，他们就会发现：该仇恨的另有他人。

中国工人阶级需要从这种宣传中醒来，认清**自己的敌人不是未曾谋面的他国人民，而是把锁链拴在自己脖子上，拿自己当狗、使唤着去冲“敌人”叫的统治阶级**。那时候，我们才能有除了高喊“打倒小日本外”，打倒我们工作场所、我们社会、我们国家里的这些剥削者的勇气。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凭空而起的“消费节”

立秋这天，网络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淹没了。抖音、微博、小红书、朋友圈，铺天盖地都是转账截图、矫情文案、情侣对饮的“幸福”摆拍，甚至还出现了现成的“奶茶转账模板”，在消费主义的年度狂欢之下，绝大多数人都迫不及待地跟大流秀出这份“秋日温暖”。

很多人或许会纳闷共产主义者为何要讽刺一个大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不过是借个由头喝杯奶茶，情侣之间表达一下爱意，缓解一下生活的苦涩，犯得着上纲上线吗？

的确，一杯奶茶不是什么奢侈品，这个日子喝奶茶也不是和一群魔怔的学生一样要被批斗成“小资产阶级”还是“反动”的行为。之所以我们现在提这个事情，绝非提出一种“无产阶级这天不该喝奶茶”的离谱主张，而是想要借一个绝大多数人所熟知的现象，去分析此类现象常不为人所知的背后推动力，并提供一种消费者之外的视角，揭露资本主义如何将他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渗透入日常生活并服务于现实利益。

凭空而起的“消费节”

在中国，除了外来的圣诞节、情人节等，很多谐音的日期都被转为敛财的工具（例如5-20因与我爱你相似）。在此之前，代表着阶级斗争、性别平等的3月8号国际劳动妇女节，也被恬不知耻地篡为“女神节”，成为了化妆品行业的开张日。传统的中国本土节日也逃不过祸害：现在重阳节他们教你必须给老人买保健品，中秋节必须买价格虚高的抢钱月饼。

他们制造这些消费主义陷阱，用来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文化上霸道地渲染出在这个节日进行特定购买、开销的必要性。这早已不是新鲜事——浪费资源、制造虚假需求等等，这些老生常谈的罪名早已挂在资本的头上。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出道则把这种荒谬现实主义发展到了极致。现在，资本主义

创造出新的需求不需要借助历史性的传统节日还是外来节日或者谐音梗，竟然毫无羞耻之心的捡起一个黄色梗大肆炒作，只因它能跟“奶茶”沾边。媒体紧随其后，推波助澜，添油加醋；而政府为了刺激消费、粉饰经济下行的窘境，也乐得配合这出闹剧。

资本、媒体、政府，三位一体，联手把一杯茶末兑水的工业垃圾包装成“精致生活的仪式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节日的本意在这个社会被扭曲了：我们不再为了团聚、为了感情、为了纪念，一切都和消费捆绑，在这个环境下如果不进行消费就是“不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只能通过消费作为中介进行传递。



奶茶行业、物流劳动者的受难节

过去几年，资本在奶茶市场疯狂的扩张，赚得盆满钵满，很多品牌在经济危机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在几大奶茶巨头垄断的情况之下，关店潮席卷全国，甚至有些地区一线大牌也愈发艰难地保证运营，只能更多地偷工减料，而苟延残喘的小品牌不得不靠着裁员降薪续命。

在这一杯奶茶背后，却是无数劳动者的血汗。站在奶茶店里长时间站立、不断端杯打包的店员，风里来雨里去送单的外卖骑手，在工厂里加工茶叶和奶制品的工人，在生产线上打包装、在卡车里送货的物流工人，他们为这一杯奶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面临的却是微薄的工资和更加长的劳动时长和劳动强度。

他们同一切产业工人一样，仍然默默承受着垄断资本最残酷的剥削。放眼望去，奶茶店的店员从上班到下班忙个不停鲜有休息时间，有时候甚至压了上百单；骑手们因为卡餐被迫在门口等待几十分钟，之后的订单都会超时；而顾客却很大概率迟迟不能喝到奶茶。店员会操劳过度，骑手会心急如焚，顾客也有可能因为超时而发作，在巨大压力下就出现了劳动者受压迫群众之间大打出手的现象，骑手为了更快拿到餐，而与其他骑手或者店员发生冲突，在这些视频和图片的背后是唯一一个在这个节日中“大获全胜”的一方——资产阶级，他们端着红酒笑看穷人自相残杀，而后又为自己能够让这么多人赚到钱、提供这么多就业机会而感到自豪。

对于行业中的劳动者来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苦的，能感受到的只有为了生计高强度劳作的不易。人们如果只站在消费者一端看待这种消费节日，不仅是对生产端阶级兄弟的漠视，更是对放下奶茶后进行工作的那个同为劳动者的自己的无视。

我们并不要求任何人出于同情心再不喝奶茶，因为按照此逻辑我们将不得不不吃不喝；要理解的是作为所谓“消费者”，工人阶级不能学会资产阶级的那套趾高气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每个人的享受都先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只有彻底破除这个封锁生产力的腐朽体制，人才能在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种身份之时都得到享受。

奶茶的甜，盖不住生活的苦

不断鼓吹还是炒作，“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掩盖不了经济的凋敝。糖水冲淡不了经济危机下越发尖锐的阶级矛盾——它只会让这苦涩更明显。今年的奶茶热潮远不如往年，原因显而易见：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劳动群众随时面临着降薪，失业，怎么可能会有更多的钱购买非必要的饮品。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生活教训的人们逐渐在摆脱消费主义的困扰。

我们每年都过各种节，同志们肯定都感觉的出来，值得庆祝的事情越来越少，吐槽埋怨的部分越来越多。资本主义试图制造出一种永恒的自我稳定机制确保工人阶级会听话地苦中作乐，持续为其创造剩余价值，但这是不可能被实现的。无产阶级正在“破防”，现实的打击一次次让缠绕在其精神上的锁链松动。

他们的麻药正在失效，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中。对此，我们必须为革命做好准备。

社保“新规” 不过是皮笑肉不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已于2025年2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

最近，这条司法解释被称为“强制社保”登上舆论头条。它的第十九条是这样的：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规定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然后换行：

“有前款规定情形，用人单位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后，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我们先听听新闻怎么说：“对打工人：短期工资可能少了点，但未来多了‘定心丸’，对企业：别再打‘社保算盘’，规范才能走得远，对灵活就业者：自己交，但保障一样到位。”这个《解释》的施行貌似从长期来看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只不过短期的收入减少了。不管是评论区寥寥的机器人评论还是嗜热度的新闻媒体，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东西太少了！并且他们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如果哪天有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内容，用部分网友的话说：“是想吃子弹了。”他们避开不谈社保难以落地的现实情况。这就是他们的回答，这就是他们本质的一个方面。后面我们会阐述，这种宣扬，是怎样的一种诡辩。

实际上的“新规”

所谓“新规”只是一种司法解释，并不新，在二月就已经默默地通过了，只在施行前夕冲上了舆论之尖。社保强制缴纳，早就有法律规定了：

“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一方面法律很早就规定了企业缴纳社保，另一方面企业不缴纳社保却不罕见，这本身就很矛盾。一直以来，行政部门为了所谓的“保护小微企业”，对企业不缴社保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趋向集中，小微企业生存将会一直是个难题。中共在自废社会主义的武功后，便只能做这样的消极抵抗。出台新的司法解释更合理的解释是：法院在自己职责之内做事时，意外打断了行政部门的节奏。事实上，劳动者想要在不降低或至少不太多降低原本收入的条件下取得这份社保权益，还是要主动发起诉讼。法院不告不理，而行政部门监督一直在有目的地消极怠工。能有效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还是劳动者自己的坚决斗争。新的司法解释冲上舆论，一个作用是刺激劳动者在合法范围内更积极地争取自己权益。



但归根到底来说，社会保险有用吗？抛开缴纳社保的金额，它能给医疗报销，失业了能领点钱，能在遥远的几十年后领点养老金……当然好。那我们都去愉快地交社保吧！不过，有劳动者不参保，就已经说明了其中有不好的地方。劳动者参保的另一面，是企业以此为由压低工资收入。

现在，法院“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雇佣者怕职工起诉他自己，要么选择裁员，要么选择缴纳。如果裁员，没有失业保险，劳动者困难。那么缴纳社保，劳动者自己掏一部分，公司掏一部分呢？也不好过。公司掏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他原先作为利润的那一部分，现在被国家掠去了（倒是成了税了），他就要想方设法从劳动者的工资扣，更加剥削劳动者，从其身上剥削更多的油水以弥补他飞走的那部分利润。**这样下来，受苦的仍是劳动者！志愿回到劳动者身上的那部分社保呢？命运掌握在政府手中了。

《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情况：“重点审计了25省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4.14万亿元，发现各类问题金额601.61亿元。一是重点人群297.43万名漏保脱保等。其中：23省的困难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等47.7万名应保未保；21省的249.73万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应补未补。二是22省未清理不符合全国统筹要求的“小政策”，不当增加基金支出责任187.53亿元。”看啊，缴了社保，但不一定能领到手。未来这个未领到的人数会不会更多呢？拭目以待。（但拭目以待着的同时，他们仍在这样的社会中活着）

我们知道，“他的社保不等于他的社保”。“红一代、二代”，2014年前的工龄视同缴费处理，他们最后领取的养老金是最高的一档。农民曾经交过多少公粮多少农业税啊。他们做的贡献不可估量，现在却是每月领那么几百块钱。中共当然清楚农村现状，不知道多少次提道：“缩小城乡差距”。现在看到了，城乡对立从往至今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共不可能真正缩小城乡差距。

社保对国家是怎样的？《2024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107282万人，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82019亿元，基金支出72978亿元；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24589万人，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973亿元，基金支出1842亿元；年末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30398万人，全年工伤保险基金收入1321亿元，基金支出1298亿元。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87226亿元；失业保险近五年波动大，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3344亿元；工伤保险2020年收入约为支出的60%，近四年收支相近，年末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439亿元（含储备金116亿元）。

这是宏观数据。其中重要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只有两，三亿人。养老保险却有十亿参保，而2024年就业人员73439万人。这可说明：社保缴纳人数占比低。根据收入与支出的数据，我们甚至可以说“社保的本质是**税**”了。国家在这过程中赚了，至于赚的钱去哪了？可想而知**他们不会理想地把钱花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身上。**只需要知道公务员与农民的差别就明白了。

有爱国主义者说了，中国给你提供保险，给你发养老金，给你提供安稳没有战乱的环境，

应该感激国家。

这句话很明显是从市侩的视角出发的。他们只看到“没有国，哪有家”，看不到国家存在的基础，不知道国家的本质。没有什么价值不是出自劳动者之手。以为是国家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实际上反而是国家机器帮助资本家剥削无产者。

我们来看这个政策：“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从2030年1月1日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十五年逐步提高至二十年，每年提高六个月。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按照规定通过延长缴费或者一次性缴费的办法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中国在面临财政困境时，在优先割舍谁的利益？

回到那条司法解释：“有前款规定情形，用人单位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后，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就是说，雇佣者同样可以告劳动者了。这显示出上面所谓“新规”根本不是为了劳动者着想的，最后受害者还是劳动者！依据这一项，长期约定不缴社保领取工资的劳动者将受约束，也实际压制了因这一条款导致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增長。中共本质上无法接受任何这样的增长，除非他是被迫的。国家好像是为劳动者着想，而实际上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劳动者受着资本家的剥削加重了，现在受到国家机器的剥削也加重了！资本家仍费尽心思扩大资本，官僚殚精竭虑地听着《玉树后庭花》。

有些人引用这段话表达自己的见解：“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但劳动者正实实在在地受着剥削，受着压迫。他们想过上好日子，他们拒绝这样的社会。有人问：能怎样？我们要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打破这枷锁，因为我们有力量做到。

美俄阿拉斯加会晤： 帝国主义的虚伪与困境

美国东部时间 2025 年 2 月 12 日，特朗普先后与普京、泽连斯基通电话。此后短短数月间，美俄高层密集互动：2 月 16 日，特朗普声称将“很快”与普京会面；2 月 18 日，美俄代表团在沙特利雅得展开会谈，并决定恢复大使馆人员配置；2 月 23 日，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透露普京与特朗普会晤筹备启动；2 月 25 日，双方再次在利雅得磋商；2 月 27 日，普京在联邦安全局会议上表示俄美准备重建合作关系；3 月 14 日，普京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举行深夜闭门会谈；3 月 18 日，普京与特朗普通话，同意在美方停火倡议下暂缓袭击乌能源设施；3 月 23 日，美俄新一轮会谈开启。此后 5 月 19 日、7 月 3 日，两国元首又先后通话。

终于，北京时间 2025 年 8 月 16 日，美俄首脑在阿拉斯加举行会晤。

俄乌战争从 2022 年初到现在已经 3 年有余，乌克兰由于欧盟、北约以及美国的支持，能够与俄罗斯在乌东以及其他战场打的游刃有余，但是这一情况在特朗普上台后，出现了变化。

与欧洲必须直接面对俄罗斯威胁不同，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动机主要在于牵制俄国、维系对欧洲的控制。但三年来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屡遭质疑，而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转向牵制中国，比如特朗普政府才上台不久，就急不可耐的与中国大打贸易战。

乌克兰在特朗普政府眼中已成沉重负担。

所以当泽连斯基在今年 2 月底访美时，就因着装“不正式”、言辞“不礼貌”，遭到特朗普及其心腹万斯的公开斥责，甚至一度被暂停军事援助与情报分享。这一幕彻底撕破了美国“人道”“正义”的虚伪外衣：一旦战争的走向不再符合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所谓的“盟邦”立刻可以被抛弃。

美国的转向迫使乌克兰不得不谋求“自主抗战”——在啃食乌克兰人民，以及欧洲和

其他支持者的帮助下，继续这场战争，直到战争最终的结束。尽管美国的援助在减少，但对乌克兰的反侵略战争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仍然需要时间来显现。

泽连斯基政府不仅更加依赖欧洲支持，更不得不诉诸于国内的更大规模的征兵。早在1月，乌克兰便开始强制登记17岁青年；网络上关于强制征兵的视频不断流传。同时，泽连斯基政府日益集中权力，甚至企图削弱反腐部门独立性，引发群众抗议。长期战争使得政府在国内承受越来越多的质疑，但泽连斯基只能依靠频繁的全国讲话和主动的对俄攻势来维持团结。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与俄罗斯签署“不平等条约”的和谈都将引爆民怨，动摇其统治根基。**



俄国同样面临着长期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国际制裁造成的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的严重下滑，这使得俄罗斯的能源寡头们对普京政府的不满情绪愈发上涨。而且普京政府财政赤字的飙升，也使得在维持巨大的军费开支上越发力不从心。而在国际关系上，俄罗斯曾经的盟友亚美尼亚，白俄罗斯，以及联邦内的车臣都出现了貌合神离的微妙变化。虽然普京政府力图与朝鲜，中国加强关系，比如各种联合阅兵，以及向非洲派遣更多的瓦格纳雇佣兵来维持自己的国际地位，但事实不可否认：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仍在持续下滑。

普京政权需要打破当前的局势，无论是处于僵持状态的军事战争，还是欧洲和乌克兰推动的对俄罗斯的孤立和制裁。

而对特朗普而言，结束乌克兰战争不仅是其竞选时的承诺，也是其塑造“和平缔造者”

形象的关键。最为重要的是通过外交斡旋换取所谓“重大外交胜利”，有助于缓解因为关税政策带来的经济冲击造成的国内民众的不满，和民主党的政治攻击。正因对泽连斯基的“不合作”态度的失望，特朗普转而寄希望于“老朋友”普京。然而事实是，普京在特朗普上台后的几个月里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攻击，丝毫没有让步迹象。

正是这种互相矛盾的需求，将美俄推向阿拉斯加的谈判桌。两国首脑虽都怀抱政治野心，但会议仍以无果而终。再盛大的接待仪式，也掩盖不了双方利益的根本冲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注定无法在外交桌上“和气地”完成对乌克兰的瓜分。

尽管如此，会议的象征意义对俄罗斯而言仍是“胜利”。至少在镜头里，普京表现得从容不迫，宛若阿拉斯加依旧是殖民地。而特朗普则空手而归，饱受批评。**对于乌克兰而言，也算是松了空气——至少没有宣布任何“协议”会让乌克兰失去领土。**

这次美俄会议之后，未来会走向何方，仍然是不确定的。但是我们作为中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应该是明确的：我们既不会顺从于中共的官方亲俄叙事，也不会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和西方帝国主义给予支持。

我们同情乌克兰人民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遭受到的痛苦：家园被毁，亲人离去，贫困与恐惧。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能支持任何一方，因为它是双方的反动战争，**我们唯一支持的只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人民。归根结底，这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冲突。我们不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方。**

是的，战争还远未结束，但是它每延续一步都将大大加剧着各方人民的不满和愤慨，都将促使新的伟大的战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的时刻早日到来。帝国主义在发动战争中不断膨胀，也必将在战争中被削弱，乃至摧毁。也难怪互为死敌的美国和俄国的帝国主义能够心平气和的坐到一起互相勾结，因为他们感受到战争的延续将会成为革命的开端。

就像俄罗斯的工人阶级肩负着推翻专制腐败的普京政权，重建工人阶级的苏维埃俄国的革命任务，我们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同样要承担着推翻专制腐败的中共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历史使命。也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夺取政权，才能够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带来的恐怖的战争和贫困。

评“共享家园”风波： 乌托邦，还是乌龙？

“我就是全国第一个干这事的人，谁抬杠也没用！”最近，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类视频，他们说着这句话，宣布自己建成了一个“共享家园（山村 / 农庄 / 村庄……）”。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王耀城。

对于王先生个人，我们其实没什么兴趣，毕竟他既不是第一个有办共享家园想法的人，也不是最成功的。诸如向前农场、小北回农村、水岸人家二庄主，办得比他早，至少到目前也在运营着。我们也不关心他个人的品质如何，不会无聊地把他办共享家园的事与他在此前卖珠宝的行为并列起来；强调他曾经帮人募捐、帮助抗洪也不会对我们的分析有所助益。

我们关心的，是他们的话术与所谓“共享家园”模式。

共享家园是如何经营的？

共享家园们很多都会如此宣称：他们要“打造六十年代的大集体”，吃饭、住宿、水电费，统统不花钱，一起劳动，一起共享，甚至还有民主权利。质疑声随之而来：吃饭不要钱？骗人的吧？会不会只是个噱头？其实共享家园这种经营模式，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如果真的把它当作“六十年代的大集体”，恐怕就有失偏颇。

首先，“六十年代的大集体”是在既有的农村实行集体化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本身就直接依靠历史上已经存在的物质基础。而共享家园模式是从零创建出来的，主要是利用一些弃置的土地、房屋等等资源，虽然降低了先期投资成本，但由于往往处于较为偏僻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预付地租等也需要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据这方面的博主宣称，仅先期投入就往往高达上百万。光是这笔资金，就决定了“共享家园”不是想建设就建设的，哪怕它真的是慈善项目，也必须依靠所谓“良心发现”的货币占有者才有可能建成，与工农大众的真实意愿无关。

其次，共享家园也不是慈善项目。我们看到，真正常住在共享家园的人数并不多，并且多是中老年人；规模也不算大，一个共享家园不一定比得上一个普通村落。其中人们从事的劳动，除了卫生劳动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业劳动（包括种植和养殖），但是我们几乎从未看过共享家园在这方面尝试过规模化、机械化地生产，反倒是为了宣扬所谓“回归农村”，我们见到的共享家园中的农业劳动几乎都是以手工为主。这不禁让人怀疑：与自然经济时期相差无几的劳动方式，真的能养活共享家园的居民吗？有的共享家园为了和居民打好关系，甚至专门用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农产品。钱究竟从哪来？

这就不得不提到共享家园中人们主要从事的另一劳动：服务劳动。这大锅饭不光是常住的居民吃，更多是前来参观的游客吃。有的共享家园选择对游客收费，这便是一笔收入，这种共享家园便类似于另类的农家乐。即使不对游客收费，也不意味着共享家园能够自给自足，它的收入还包括直播打赏、直播带货、短视频广告、付费课程（主要是自媒体课程、线下店铺引流等。也就是说，共享家园的经营非常依赖于互联网以及相关流量。否则，所谓共享家园一定会入不敷出。

共享家园是乌托邦吗？

即便如此，“免费吃免费住免费玩”的口号还是能吸引到不少人。一些是游客；另一些则是网左。对游客来说，把它当作一场低消费旅行的目的地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听信话术，真的把共享家园当成六十年代的大集体，便显得愚蠢了。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共享家园的经营本质上仍是一种商业模式而不是一个社会组织。它甚至不是“新和谐公社”那样的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它不过是个掺点泥的浪花。“共享”更多是博取流量的噱头，而不是一个改造社会的方针。因为这些创始人根本没有一套成体系的理论，从来没有认真审视过，自己的这个家园究竟是什么，真正的共享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的这个家园究竟如何才能存在。

可是，共享家园的诞生，需要货币所有者的投资；共享家园的存续，无论是承包费、水电费还是生活资料的购置，也需要依靠从网络平台中以各种形式取得的钱。在这里，“不花钱”以“花钱”为基础，并且以“花钱”的广泛存在为基础。再考虑到共享家园事实上存在的现金流，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不过是资本的又一形式；其中的成员是某种变相的员工。只不过它的盈利模式不仅仅是传统的靠卖出附有剩余价值的商品，还是利用共享的噱头来宣传。

这还涉及到中共的经济政策——乡村振兴。最理想的方案是在乡村搞出产业吸引就业人口，可是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时代这何其困难；于是很多地区便退而求其次，开展旅游业，打造“特色小镇”之类，吸引游客消费。这种模式往往与生产关系不大，生产

在这里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存在那些有闲钱的游客。也就是说，乡村振兴最终走向了让“中产阶级”多消费，以这种扭曲的方式实行财富的再分配。共享家园事实上也是类似的思路。可是，随着经济下行逐渐严重、中产“破产”现象愈发普遍，中国本就不多的中产阶级更加缩水、更不愿消费，这条路也愈发困难，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很多跟风的“共享家园”大多难以维持。



此外，共享家园内部的民主也是一笔糊涂账。王耀城就是一个例子，他宣称“不会我一个人说了算”，可是整个共享家园的产权仍然在他手上；更别提什么民主制度设计了。事实上，在共享家园必须参与市场经济的时候，就决定了整个共享家园的运作仍需服务于市场，从而服务于商品生产逻辑，从而仍然是物的条件强制着人。

也就是说，“共享家园”不是乌托邦，它不过是资本想起的一个新点子，披上老旧褪色的军大衣。它本身就难以稳定，它依靠的也只是一个摇摇欲坠、极不稳定的社会现状。

“真正的”共享家园有成功的可能吗？

共享家园往往会宣称自己是一个世外桃源。王耀城的旗号是“乡村振兴”，四川向前农场的理念则是“田园生活”。他们都说，自己是在践行某种“理想”，显然，他们的话语与活动是非政治化的。共享在这里被解读为纯粹的经济活动，一如中共的宣传当中这个词的内涵。可是，一方面，共享家园的经济活动许多都在非共享的领域进行；另一方面，它从来没考虑过如何提高生产力，而只是在分配上下功夫。

假如我们发动空想之力，真的打造出一个大集体农庄，拥有现代化的农业设施、完全共享的经济制度、设计精妙的民主机构，它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了吗？仍旧不见得。马克思曾如此评价他们前辈拙劣的实验：

“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

首先，共享家园不可能与外界断绝联系。经济方面，它的先期投资本身就依赖于大量的货币；农业需要配套农具制造厂、化肥制造厂、粮仓等等，从而还需要钢铁冶炼、机械设计、原料生产、能源生产等等产业；生活方面也需要相关的配套设施。那么，整个共享家园就会需要一套工业体系，而这远非一个农庄能够建设的。那么，农庄就必须与外界有所交换，从而受到价值规律的影响。政治方面，则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但政府肯定不愿意看到一个封闭的、抱团取暖的社会组织出现。

其次，共享家园作为局部的改良性质的集体，其必然会遭到资本主义的抵制。因为资本主义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有一大批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工人，资本通过不断地榨取剩余价值而维持这个前提条件。而共享家园的集体所有制则会破坏这一点，使得工人存在直接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可能性，这会造成劳动力的流失。因此，资本家们一意识到这种共享家园的威胁，即使它本身不瓦解，资本家们也会想方设法从外部摧毁它。

最后，最彻底的共享家园的运行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一个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而不受资本控制的实践。但是，如果这种实践只出现在山沟沟里，而不是出现在千千万万劳动者身上，那么政府对它的干预就是必然的并且易如反掌的。在这个劳动者实质上没有结社权的国度，仅仅是一个村庄的这种实践都会被视为极度的不稳定因素。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说共享家园就一无是处。虽然是以某种商业化运营的方式，但是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广大劳动人民内心的愿望。就像有的视频讽刺的那样，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处处不共享、处处要花钱的社会，它是一个充满着压迫与剥削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王耀城选择浪漫化地想象出一个六十年代的大集体：人民已经吃够了原子化的苦了。

因此，共产主义者们要做的绝不是幻想一个所谓的“共享家园”，或者拿它玩梗。我们想要共享的，绝不仅仅是几千亩名义上由个人承包的土地；我们想要共享的，是整个社会几千年来发展至今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我们要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给劳动者自行管理，我们要把所有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由劳动者行使。这才是最彻底的共享；而这个共享，不经由革命推翻这个不共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都宣传自己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词成为了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种政治正确：即不可被质疑、内容并不重要，而如何被利用为一种标榜自身的武器更加重要。许多革命者们不假思索就告知天下“自己已经摸清了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使得它逐渐变成了信条，一种我们必须遵循的道义。

实际落实上，很多小组就暴露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无知，最后反而称为实质上民主集中制的反对者。我们必须理解，民主集中制是为了在资源极其有限、形式无比紧张、压迫和打击随时都先悬在头顶的、这个阶级斗争的动荡时代，革命者们有效组织起力量反击资本主义制度的手段。民主集中制不是伟人的发明，更不是写在纲领或章程中就能奇效的魔咒。它是历史上革命实践总结的经验，和根据旧日、今日的环境，同志们不断摸索出的组织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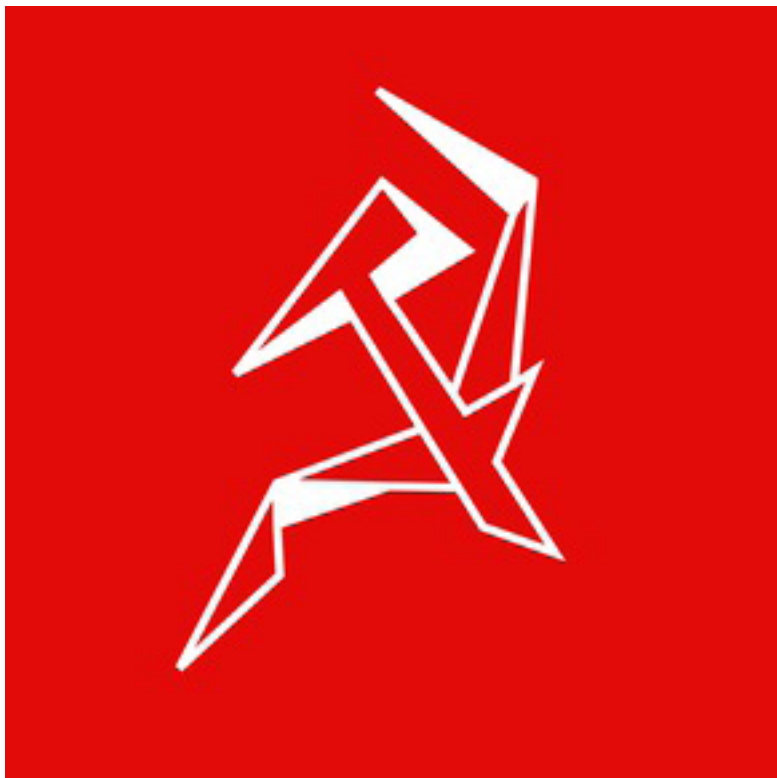
在这里，我们将根据组织和每位同志们长期积攒的经验和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分享我们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和执行。我们希望本文可以提供给同志们**不同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或者官僚主义的另一条出路**，一条组建起我们时代新的共产主义革命党的道路。

讨论自由，行动一致

很多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的同志们心中都难免有这么一个疑问：民主集中制，听起来为什么这么奇怪？两个彼此矛盾的词拼凑在一起，如同说“自由专制主义”一样。实际上，民主集中制里民主和集中并不矛盾。辩证的分析方式不同于形式逻辑在于，我们不把世间万物视为绝对对立、水火不容的东西。我们不认为世界是非黑即白的，正如没有“死”，何来定义“生”？没有“热”的概念，何来定义“冷”？看似对立的两极也往往都是相互转换的。我们看到极端保守的压迫最终会引来最为激进的革命，我们看到南北互斥的地球磁极都在历史中发生过无数次倒转。民主和集中，对立中仍存在着统一：他们都是**革命组织决策和行动采取的形式**。

只有通过最充分、开放的方法针对政治议题在党内用民主手段进行讨论和辩论，我们才可能保持政治上的统一性和行动一致。在任何共产主义组织里，**没有民主是不可能达成“集中”的，因为强制性、不情愿的统一，只会是一栋分裂的房子。**要让成员保持政治方向的一致，不能只依靠外部约束力，更需要内驱力，这只能通过民主手段达成。新思想的提出，旧路线的调整，形势的改变等等，都只有在存在党内民主的情况下才能及时得到反应。让一个组织成为一言堂，最后的结果就是少数人将自己过时、悬在空中不切实际的执念强加于全体成员之上，政治上死气沉沉，一条路走到黑。

因此每位同志都有权在组织内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思想。但组织大于所有个人之和，也不只是一群革命者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人堆”。每位同志在集体性的决策面前，必须放下个人观点进行无条件执行，不管这个集体决策是反对个体的思想还是针对个体想要执行的实践的否决。个人主义在民主集中制里被最彻底地否定。想要以民主之名，用小孩子幼稚的心理——自己的需求不被满足就撒泼打滚去阻挠决议的推行，恰恰是最反民主的手段。这种**意图将个人观点强加于组织之上**，得不到就挑拨内斗、退出队伍之人，只是还没有得到权力的官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眼中，任何的反对声音都属于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者眼中，任何不符合自己愿景的也都属于官僚主义。在这里这种看似对立的两极，实际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反应罢了。



动态的条例而非静态的戒律

我们看到很多共产主义小组清楚地意识到，随着工作的推进，有一套正式的规章制度是很重要的。相比于那些借口“规章没用，现在阶段用不上”进而在自己山头内做山

寨大王，所有工作推进都要满足自己心情的官僚分子们，这些同志们是先进的。条例可以确保在平稳航行时，我们组织能有类似汽车的“自动巡航”功能，不需要一直踩着油门也能维持同一速度前进；在关键转折时，就像停车一样能有倒车雷达，像转弯一样能有引导线。

当然，一个好的司机不能只在有这些功能的时候会开车，没了就傻眼。因为这个对比是粗略的，革命工作中任何规章制度都不会和汽车的辅助功能一样稳定提供帮助：阶级斗争的变化可比路况复杂的多。民主集中制下组织的条例不是先入为主的信条，而是不断实践反馈得出经验的总结。**所以一个健康的组织的条例和章程不该是千年如一，那代表这个组织陷入了发展停滞和政治上的原地踏步；**只有根据形势的不断改变进行创新和修正，条例才能起到自己该起的作用。

那条例本身的意义是什么呢？条例不是为了束缚我们的工作，让组织内最落后的部分在条件改变后，针对新方法拿曾经的条例说进步的同志们“不合周礼”。条例不是辩经，而是用来**辅助工作、指导同志**们的。我们有条例因为这简化了工作，不需要每时每刻都针对所有细节投票，而可以以条例——曾经集体对于这些细节该如何办的民主表决——作为指导基础。我们用条例可以最大程度减少组织执行上的不一致性，规范什么样合适，什么样不合适。

所以条例如果不想最后沦为一种标榜自己正式的“装饰品”或者内斗之时双方用来攻击彼此违规的武器，而真正起到规范、指导工作的作用，就必须是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党章不可能涵盖所有范围、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这里就需要革命者把握**革命工作中的一种分寸感**：每个同志都需要有谨慎判断我之所行是否合适的能力。

靠政治而非组织手段实现统一

我们不是用多数实行革命，而是通过革命达到多数。单纯通过强制性手段，组织规章逼迫同志们达成的一致，终究还是不稳固的。前文我们提到过个体必须服从集体作出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是和个体思想背道而驰的，但这绝对不是说我们执行革命实践只需要在达到超过半数后就万事大吉，因为剩下的那些同志不得不服从我们的决议；**我们向来追求的是百分之百。**规章规定的比例只是行政上通过所需，从党的健康、成员的理解和执行力等方面考虑，我们都尽可能达成思想上的统一。分裂的状态不代表“组织很有活力”，而代表同志们之间没有充分彻底的交流，对于问题的认知仍然处于不同层面、对不同角度缺乏调查。

我们想要的党内民主，绝非小资产阶级式故意创造出分歧彼此看着不顺眼各自为政；我们想要的是**通过讨论解决分歧**。分歧不是好事，而只有通过统一的交流和行动而非分裂才能被彻底消除。这需要干部们用合适的方法统一成员们的政治思想，以推进行

动上的一致，不能简单粗暴地将基层革命者视为服从指令的“下属”。

用政治手段争取同志们，为上策；用组织手段约束同志们，为下策。与其将我们的党比作一台机器而成员们皆为螺丝钉，不如我们党是一颗树而同志们皆为细胞。

民主集中制最终落实程度从来不取决于组织的章程有多么完善，有多少条例。我们看到过一些其他组织创建的外围群组，规章写了几十条密密麻麻，但其管理层自己都不进行遵守，甚至很多人都未仔细阅读过；那是资本主义喜欢的法条，给法官和律师看的；而革命党的规章，是要让每位同志铭记于心，实践于行。

没有全体同志们对政治目标清晰的认知，我们就不可能记住这所有条条例例。只有我们组织的同志们都是严肃、认真的革命者，对于我们的政治方向又清晰的认知并在行动上认同，才能有一种内驱力去促进同志们落实我们的组织章程。一套正式、高效、革命的规章制度，只有在符合其要求的革命者身上，才能得到落实——你不可能用橡皮泥建起高楼大厦。

只有我们每位革命者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这样的组织。树立纪律，严肃组织。民主讨论，统一行动！

“取消主义”批判：无能、逃避、被动的看客们

“取消主义”是俄国 1905 年革命失败后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于俄国革命党中的一种思潮，它在历史中绝非特例，而有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1905 年革命虽然迫使沙皇颁布了《十月宣言》，短暂地开放了一些政治自由，但很快遭遇镇压，工人运动和革命政党的地下组织遭到重创，大量革命者被逮捕、流亡或处决。面对形势恶化，一部分成员判断继续坚持革命主张进行政治工作将会是毁灭性的，于是主张取消革命党的建设、取消对群众的教育和组织、取消革命宣传来等待“客观形势改变”，直接不进行政治工作以此来“保全革命力量”。

这种立场看似确实是在革命低潮期采取的保护措施，但实质上违背了俄国当时的政治现实。首先，取消主义立场想通过改良手段逐步实现社会变革，但在沙皇政权仍是高度专制的条件下，任何合法空间都极为脆弱，政府随时可以取消或镇压这些权利，依靠合法手段也没办法所谓隐藏革命力量。其次，取消主义将自己视为跟在群众后面的观察者、革命运动的旁听人，用模糊不清的一个“革命形势未来会自动变好”的谎言为胆怯退出运动提供理由；更严重的是，取消主义主张解散、推迟建设党的地下组织，而这否定了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高度纪律性、理论统一和组织高效的先锋队政党，才能有效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共产革命。”

因此，从根本上讲，取消主义不是一种面对客观形势的策略分歧，而是**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否存在的根本分歧，涉及进行革命还是退出革命的分歧**。取消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也有自己的影响，且利用了青年革命者犹豫未定的摇摆心理，对进一步推进革命工作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他们如何狡辩

如果说百年前的取消主义者产生自革命失败后的妥协与退却，那么当今的取消主义者则是在全球资本主义高压统治下，对革命的意义的主观遗忘乃至敌意否定。

这些组织、这些人，不再把革命之安全——即工人阶级是否能夺取政权作为政治出发点，而是把个人的安全、职业发展视为首要。他们打着“革命视数十年为一日”的旗号，把大量满腔热血的共产主义者们塞到了所谓的“秘密干部党”和“地下组织”里，**不推进这个组织走向正式化、成熟化，不推进革命团体去建设自己的力量、发展出群众性的工作**，实际上干的却都是繁杂的“党务”和毫无意义的低质量时评、念经。

他们以虚拟为居所，以分裂为荣耀，打造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左翼迷宫”。所有试图跨出屏幕、建立现实行动的尝试，都会在第一时间遭遇他们的抵制与打压，甚至连军警宪特都还没开始行动，这些人就开始在自己的圈子里大吵大闹。每当真正试图建立组织、开展活动的革命力量萌芽时，这些取消主义者就会立刻发动攻击：**他们不组织自己，却热衷瓦解他人，不自己带头，却穷尽一切手段断绝他路**。通过对其他革命组织的污名化，将其描绘为“危险分子”、“夸大形势”、“警察间谍”、“叛徒”……疯狂的翻找历史引经据典就是要把真正的革命者塑造成原罪之人，以此合理化自己的无能。这些现代取消主义者善于狡辩为什么不该干事，却从来不敢也不会自己干事，更无法把组织力量落实到地。

他们狡辩的方式相当的幼稚：因为中国政府的镇压力量很强，所以进行工作会被抓，因此不该干任何事情，除了自己在博客上牢骚或者在海外搞什么媒体；因为中国群众的意识尚未形成革命浪潮，所以我开展群众工作不会一呼百应，那我就干脆闭嘴；因为中国革命者的整体素质低下，我就高傲地等着他们自己撞墙、被抓，组织起任何人、开展教育都是没必要的。

我们将会对这些理由一一反驳，证明为什么它们不会说明取消主义的政治主张——即取消革命是合理的。我们本文的目的就是揭露这种思维如何**诱导革命者错误地判断形势，并用最机械、被动的方法分析，得出最懒惰的行动**。

中国处于什么革命形势？

中国劳动群众的意识偏保守，激进化到得出必须进行革命的结论的只是极少数人。这在革命前的准备阶段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人面对压力本能性能忍就忍、先管自己是再寻常不过的心理。就和一些人常说的那样：中国老百姓好伺候啊，能吃饱饭就不会说你什么。只有彻底放弃了糊涂过日子的幻想，意识到制度已经把自己逼的无路可退，孤立自保无法保障需求，被动的防守才能转为主动的进攻。

革命意识形成不只是“官逼民反”。群众更需要的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感受到广大工人阶级被组织起来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很多学生特别傲慢地作为家庭惯养的脱产者去斥责现在拒绝推翻政权、夺取生产资料的基层工人，说他们是“反动派”，完全无法从工人阶级个体的角度出发思考，在我不认为现在的反抗有充足的胜算时，

破釜沉舟的行动能带来的不是解放，只能是更悲惨的地步。工人群众需要在不断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意识到和广大阶级同胞一同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和共同利益，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才能深入每个人的脑海。

是的，如今的中国群众运动是被国家机器死死压住的。但革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一夜之间都可能出现巨变，这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平日我们看似事物没有改变，不过是还未浮上水面。现在我们的革命就处于量变积攒的过程。这绝非革命的“退潮”期，而是暴风雨前的静宁。

同时，中国的革命者无组织，**运动的革命领导层是完全空缺的**。在这个情况下，即使群众的阶级意识形成，到时候也会因为犹豫、徘徊、匆忙导致不必要的绕路和失误。我们的解决方法不是和取消主义者一样哀叹革命者都不行，而是要吸取所有这些失败的革命组织的教训，以真正**建立起一个革命党**。我们一直以来反复强调，由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负面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工作迟迟不能被有效推行。这个局面必须被打破。

我们不同于他们在逛商场，挑自己觉得入眼的那个革命党来推进革命；我们自己是这个革命党的建设者，很清楚现在没有这个党。这个市场再大，也不可能找到一件不经过人的努力所打造出的商品。

“环境宽松”后才能开展工作吗？

中国对革命运动的镇压十分残酷而高效，这个无人质疑。但必须理解这是一个常态，**“政治宽松”的环境不是体系自然演变的结局，只有革命，只有群众的动员，能将极端的高压统治解除**。疫情为何放开？这绝非过了三年中央想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等自由派还是谁帮我们改善政治环境！在如此高压的状态下，不应该因此当胆小鬼停止工作，而应当谨慎、安全地推进我们的事业。不要拿危险当作退却的理由，革命工作任何情况都有危险。

中共的镇压和国安力量可谓首屈一指，但不代表革命者静等革命机会送来：**不推进工作干等对革命来说简直就是“温水煮青蛙”**。我们不否认社会客观条件，但不能无视人的因素，更不能忘记革命的连续性；马克思曾说过，“在资本主义彻底吐纳完全部生产力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很多布尔什维克也是将其奉为了圣经，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够充分，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于是下结论应该支持临时政府。他们忽略了俄国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无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的失望，如果再不向社会主义推进，那么无产阶级将会丧失信心、社会将会在无限的恐怖中原地踏步；在这里，就不该因为理论上判断“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尚未成熟”而取消革命，让无产阶级走向被奴役的命运。

宽松的政治环境一定会有利于革命开展吗？很多同志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有利于革命工作，当下的中国由于高压做工作是“低效”的，不如等到政治自由开放那日再行动。诚然在欧美国家，革命的宣传和呼吁是被部分允许的、工会和游行示威是合法存在的，但这并不代表资产阶级会放任共产主义运动。他们绝不会允许共产主义的崛起，一定会千方百计去打压革命的趋势，宁愿要一百个波拿巴也不要一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地上工作更加方便、可以随意在街头宣发革命思想之时，不代表革命将会更加简单。**资产阶级政治上方面的松口，必然会在别处加大新的压力**，比如更为猖獗的改良主义和民粹式的“直接行动”。一杯下了毒的酒对人的害处，不见得比被棍棒打击少。

如果抱着取消主义的心态，用僵硬、机械的方式去看待革命，在高压的环境下选择退却，那么即使到了未来局势改变的那天、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也无法领导革命走向成功。因为，**革命是连续的，不是革命者自己偷懒、选择喜欢的阶段再介入的**。不要抱怨环境，无病呻吟不会改变什么！张嘴闭嘴“客观条件”，我们不需要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我们需要的是大胆地前进。



共产主义者当下形势该怎么办？

我们也不能陷入盲动的心理。很多共产主义小组热衷于夸大当下中国社会运动的力量、群众意识的激进性，以为“发起进攻就是足够的”。事实上，**我们追求的不是“进攻”，而是胜利**；危言耸听吓不倒反动派，更组织不起来革命党、动员起劳动群众。每个月都千篇一律地大吼“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革命要来了”像极了自由主义者在互联

网上的作秀。每次看他们的言论，就仿佛明天中国政府就要垮台了一样！这只会让革命呼吁在人们眼中如同鼓吹了 20 年“中国崩溃论”的海外学者的哀嚎一样可笑。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我们推进革命从来不是蒙着眼睛往前撞，而是仔细调查群众的激进程度、组织状态，根据有利条件开展工作，考虑不利条件并保存力量。干革命不是单单满腔热血就足够的。

但这从来不同于取消主义的缩头乌龟们。他们伪装出一副客观的外貌，以“形势”、“阶段”等等借口包装自己的行为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调查形势后承担的任务是先锋队而不是旁观者，**革命者走在形势前面而不是后面**。我们不干等“神迹”到来拯救革命。正是革命先锋队和广大无产阶级在一次次的危机中的不断实践和磨合，塑造了群众的阶级意识和坚实的革命领导层。

我们对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有信心。这不是盲目的信仰还是口号，而是基于对社会和历史进程科学的分析得出的结果；但我们知道光分析是不足以改变世界，只有理论落实为实践，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才有前途。我们因此不向现有环境屈服，**我们不是适应环境的人——取消主义者以自己“适应”当下形势还在沾沾自喜——我们是改变环境的人。**

认为革命是“自发”的革命者就无需花费力气将其推进的人，看似是“唯物主义”的立场，实际上他们的哲学一方面是如此机械和片面，无法意识到人的活动本身就是客观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所谓经济指标、战争、政策才算做“客观原因”，和唯生产力者一样“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另一方面他们的思想又蕴藏着一种神秘主义的萌芽，按照其思路，具体物质、经济生活上的压迫是如何工人阶级在脱离革命者的努力的情况下，得出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是“不可被解释”的。这些**脱离生产的学究根据自身的生活习惯认定，工人阶级得出革命结论是孤立、自我的“大脑进化”，而不是和整个社会不断互动中导致的结果。**

抗议运动想要打破地域性并取得广泛的全国影响，想要有清晰的指导和严密的战术达成自己的目的，则需要革命党的领导；各种社会舆论想要从各过各的悲观主义自保转为积极谋求团结以捍卫自身权利——换言之从被动转为主动——也需要革命党的努力。我们从不否认工人阶级从经历和思考中得出革命结论的可能性，相反，这是绝大多数工人走向革命的方式，不是直接听从革命政党的宣传还是地下组织的动员。但是，革命者的努力恰恰就是这场反应中的**“催化剂”**，工人阶级中有组织的、最先进的部分、有纲领、计划和理论的**“火车头”**。罗莎卢森堡说：

“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因此，不是靠对群众罢工有无可能性和利弊进行抽象的冥想，而是通过对现阶段阶级斗争中造

成群众罢工的那些因素和社会状况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工作主观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对群众罢工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和讨论这个问题。

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某一特定情况下的群众罢工本身，而是党的整个态度中的政治形势，这是一种策略，它在斗争时期的一切领域里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给敌人的一切挑衅以严厉的回击，每时每刻都大大提高着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和斗争勇气。采取强有力的进攻政策，也就做到了：既可以使群众行动起来，还会使他们的行动得到成果。社会民主党坚定不移、奋勇前进的策略，会在群众中激发起必胜的信念、自信心和斗争热情；而动摇软弱、建筑在低估无产阶级力量基础上的策略，会使群众畏缩不前、不知所措。”

群众开始动员、做好准备之日，如果不想让革命的努力变为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是真正作出有用的“功”，就必须在这之前打造出革命的领导力量以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历史上无数的教训在告诉我们，**运动缺乏革命性领导层“自发”爆发并不足以保证工人阶级实现自身的解放，革命组织必须在此之前就做好准备**：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工人阶级控制了街头、工厂和整个社会，动摇了军队和中间阶层，甚至连戴高乐都在压力下萎靡不振，放言“我们都玩完了。共产党过几天后就会掌权。”然而由于所谓“左派”革命者的背叛，统治阶级作出妥协后很快就动摇了运动的士气并将其逐个击破。群众这里是准备好了的，革命者们却束手无策。

创建新的报刊、建立起一个个读书会如果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前进，就已经过时且不会有更多的发展。这个形势我们不是无事可干，建立党是如此紧迫，需要被完成的任务只会多不会少！

取消主义如何为反动派服务？

取消主义是统治阶级最喜爱的喉舌，他们**彻底取消了建立起一个革命政党的可能，取消了唯一对统治阶级能构成威胁的工作，并倒退回原子化的个人学习**，阻碍了革命思想影响广大劳动群众，任由这种思想蔓延只会扼杀革命；更不要幻想中国的政治环境会变得宽松，统治阶级再走到悬崖边上时，他们不会悬崖勒马，而是疯狂的去“踩油门”：我们前面的不会是岁月静好。

取消主义的懒人思维等待着别人为其完成革命，去改变形势。态度上还偏要厚脸皮对着那些为这个事业路上牺牲损失的革命者们说一声：“哎呀我都说了你们这么干没用，看看出事了吧！”不过是一群懦夫喜欢伪装成预言家揽功。

除了害怕国安的大手，他们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是死气沉沉了，某位知名取消主义者更是认为2022年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并没有显著变化，和十年前相比只是罢工数量增加，他们看到今天一场符合自己心中预期的“纯洁”的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就下结论中国劳动者未来没有出路。**中国工人阶级只会在战斗中醒来而不是“深思熟**

虑”中觉悟，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碰壁后，社会主义的思想就会从经验中成长出来；那些说工人“已被资本驯服”的人，才是真正短视的失败者。他们看不见工人阶级正在蛰伏中的风暴，看不见新的革命形式正在酝酿，看不见人民的怒火早已在土地深处燃烧。他们不是在判断现实，而是在为自己的软弱寻找借口。

取消主义者在自己的长篇大论外，通常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逃避本质**：那就是他们没有任何“实践”。如果他们是客观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局势并提出了合适的路线，则应奋力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去教育中国的革命者们不要飞蛾扑火；但他们只是乐呵呵地在旁边说着哭丧话置身事外。他们甚至在这个程度上，都在“取消”自己的取消主义路线。

革命里**无能但多嘴的看客**罢了！就麻烦这种人请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少出来惹事对革命事业的推进指手画脚。同志们，当下容不得懈怠。正是因为革命仍是萌芽，我们才需要发展它而不是取消它；组织起来！

跳脚、谩骂、胡闹，都收起来罢！—— 绊脚石们如何、为何破坏革命事业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创立的短短数月里，从无到有地创造了现在的全部工作成果。和干等的“理论家”与急躁的“行动家”们不同，我们从未懈怠，而是有节奏地推进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共产主义革命党的任务。这段时间，共产主义革命阵线也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和组织。我们教育、吸纳了其中合格的同志，也尝试说服了其中摇摆、有待进步的青年革命者。对于来访的各路团体，我们也都礼貌、友善地接触。因为**只有积极开放而不是固步自封，才可能向中国共产主义队伍的混沌中照进一束亮光。**

但这份开放和友善并不会打动部分人。他们限于自己的宗派利益和思想水平，将黑屋中的亮光视为打破“稳定”的灾难：**他们畏惧真正有革命性的反对派，畏惧不被他们控制的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畏惧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将在自己狭隘的观念之外推进。**

八月十三日，《共产主义者》频道收到读者同志反映，“有些网左要开你们的盒”，并提供了截图。调查后我们并没有感到太过意外：对于无力用理论和工作成果反对我们路线的这些山头大王们来说，对于**眼红革命者们通过牺牲和奉献取得的成果的这些小肚鸡肠者**来说，与其看着自己的幼稚暴露，不如放手一搏——打一场对异议者的歼灭战！即使这不能让资产阶级敌人动摇半分，甚至有利于资产阶级敌人！

他们的密谋如同小娃娃打电动因自己“菜”而恼羞成怒摔游戏机般幼稚，这些竟可笑地从所谓共产主义者口中说出。对于这样的挑衅还保持沉默，就不是大度，而是向阅读我们文章的革命者们隐瞒中国很多所谓“革命团体”的丑陋面貌。在我们发布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成立党》的第一段中我们说：

“必须以最现实与开放的路线去统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去破除任何散漫和胡闹，必须用最紧迫的速度去高效组织起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们，建立一个崭新的共产党。任何怯懦在这里都无济于事，任何犹豫在这里都是对革命的犯罪。”

是的，散漫和胡闹自己不会自然消散，而是需要我们严肃地揭露以破除。

“绊脚石”们的恐惧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一向明白，革命从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来自统治阶级的监视与镇压，也来自所谓的“同志们”。某些组织在数月前对我们“致以革命的敬礼”，而如今却将我们打成“法西斯分子”、说要联合起来找到我们、让我们噤声、对我们“下手”、把我们“枪毙”，直到我们无法再为工人阶级发声、无法再挑战他们建起的一个个宗派主义小山头。

全国、全世界的革命运动没有留给这些山头领导人们的空间和时间。这些口口声声说要对“反革命分子”下手的宗派主义组织也已然明白属于他们的时间早已不多，所以他们用尽一切手段要阻止一个革命的共产党的发展和革命时代的到来。只要对革命者的工作能造成一丝阻拦、对革命的爆发使一次绊子，这些组织就能张灯结彩地宣布自己对“反革命”的胜利。

这些依赖个人关系而立的组织妄想要对共革阵的所谓“头目”下手，这无疑是可笑的。就如同1918年的社会革命党以为向着列宁开枪就能阻挡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洪流一般，共产主义革命阵线从来不是依靠着几个“头目”的组织：允许我们建立起完善的理论体系、宣传渠道和民主集中制的是全体组织成员的忠实工作。换句话说，若是这些山头大王们期待着用某些不见得光的手段绞杀“头目”以阻断革命组织的发展，这无疑是寄希望于某种空想并将自己彻底地置于革命运动的对立面。

这些领导人们为了将自己包裹在“唯我独革”的茧房中以控制自己的少数成员，将任何关系的建立、信息的流通、字符的书写都挂上了战斗色彩。接触其他团体叫“外交”，入群叫“入党”，自己公开群组的人把事情往外传叫“间谍”，语无伦次的谩骂叫“批判”——很多时候这种幼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他们如同历史上的那些特权官僚，执起了为镇压革命者而欺骗工人阶级的通用手法：**妖魔化自己的对手**，说那些革命者都是长着犄角的恶魔，然后用物理上抹除的方法保护自己的位置。

“神圣的围剿”

在某组织的Telegram群组中，一人在与群组管理员的交流时提到了共革阵，表示“正好我们对这个组织（共革阵）也要准备下手了”。群组管理员声称我们曾将他开盒并提出“也准备对这个组织下手”、“正在找他们（共革阵）的头目”。两人随即相约“我们直接联合批判吧”。

将他人开盒从来都不是我们组织的利益，正是因为它从来都不会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最为迫切的需求是加紧团结起来，组织起自己的政治力量，一直都不会是扒取某些个人的身份信息。扒取其他个人的身份信息，无益于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更何况是扒取声称为劳动解放的“同志”的身份信息？迫切地想要获得有异议的共产主义者的信息，除了资产阶级为其利益乐于为此之外，只能是为了宗派的特殊利益。正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利益，所以我们从来不屑于做这一点。



如今，某组织声称正在找我们的头目？是为了什么呢？要与我们的对话吗？不会是这样，因为要与我们联系是很简单的，他们不应会比许多联系我们的人要迟钝。诸位同志们完全有渠道与我们负责同志联系。难道是要取得我们组织成员的身份？**目的极其可疑。**

这群自称工人阶级、农民等一切劳动者的解放者的人，却要花巧心思去对一个为了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行剿杀。资产阶级都不会因这一围剿寒颤一下！工人阶级也不能因此进任何一步。

一个不惜嫁接中伤，也要打击其他共产主义者；另一个竟仅凭他人一言，就要为其他共产主义组织下达判决。一个敢说，一个敢信，沆瀣一气！严谨认真的革命者，应当谨慎查证消息的真实性，为自己一言一行负责。

事情真正的主线在于，他们碰见了一个难以用理论和行动击败的、不受他们控制的革命组织，进行了谩骂抹黑，但这个组织仍然在继续向前。而对他们来说，剿灭不同声

音的宗派利益就已为中伤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于是我们能判断：**他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所谓共革阵派遣的“间谍”，实际上是他们一位看不得自己组织的宗派主义思维和不学无术的同志在加入我们后，于他们内部没有经过任何民主程序就被“清洗”。我们从来没有利益也没空去对这些网左群组派遣“间谍”：图什么呢？他们的闲聊有什么教益吗？我们主动打探他们的消息是为了什么呢？不过是他们自己一个网群什么东西都往外传罢了。我们派了“间谍”，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互联网疯子”们的性质和未来

“绊脚石”们热衷于骂战、在如同“键政版 QQ”的群组中吹水，时不时搞个所谓“斗争”，把政治当成了一种近似于娱乐的消遣项目。他们没有耐心。花费在思考和阅读上的时间，连打字聊天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很多同志会不理解：为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人能出现在“革命队伍”中呢？

革命工作本是严谨艰苦的。但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让**一些本来毫无资质和勇气的人都得以挤进来玩自己的扮演游戏**。发言的成本最多是敲几个字的时间，不用在意逻辑、形象、影响。人们能在互联网上看到无数“逆天”发言，却在身边环顾一圈难见如此不得体的事情——很多时候一块屏幕给了这类人一种安全感，让他们有了无脑宣泄自己情绪的胆量。

这批人的攻击不是什么政治斗争，只是他们**在自己唯一可行的渠道内玩自己的过家家游戏**罢了。这让互联网上无数解构讽刺“网左”的梗总能博人一笑。如果他们只是待在自己的亚文化圈子内，将恶臭的习气留在自己屋里，那我们不会关心。现在的情况是，共产主义者将互联网作为宣发工作的一环，而这群人对环境的侵入破坏了严肃性和组织性。

他们想要的东西很简单：我在网上能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有人夸我、支持我，我不喜欢的东西和人都被打倒，我能像个官老爷一样主宰我的领域。

这些东西只有在共产主义队伍保持这个散漫而幼稚的状况下才能被满足，对他们可惜但对我们可喜的是，这个环境是会被改变的。这批人没有未来：**他们无法对革命事业的推进构成多大威胁，就像做不出任何贡献一样**。也许他们有能力花费几日几周几月大骂其他人是假革命，但真正的革命工作，到了手就搁置了。

我们的处理方式也要考虑到这种人的性质，要对症下药。**“狗咬人，除非是疯子，不然不会反咬狗一口。这时候狗脑子里唯一想着的事就是咬人，而被咬的人有自己的事**

情要干，只是被打断。” 我们不该为反击这种人投入不合理的资源，磨耗我们的精力，何况在他们没给出任何严肃论点前，我们的反击除了是揭露他们的性质外也不会是其他什么东西。

因此，我们不会沉浸在和这批人的骂战中，这毫无意义。当然，我们不会出于什么“礼貌”，在他们过分的时候还用温柔的语气哄着说什么。如果在任何情况下提到他们，那只是为了揭露现在的环境，作为反面教材指出我们建党的道路。我们不会因为他们在污蔑、伪造，就使用同样的手法，这是为我们不齿的。目的为手段赋予正义，但总要有何为目的赋予正义。

他们像什么呢？在这里给一个和此类人同样低级趣味的例子：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谁和那谁也好了” “哎哟那不是出轨了，我也觉得他长得就坏” “我靠，你知不知道他之前……” “那谁和我说……” “这人怎么他妈这么坏” “咱得去骂骂他们”

我们该干什么

这群天天在网上喊着枪毙这个枪毙那个、谁是反动派谁是小资的野蛮、幼稚行为，需要**被抵制并冷处理**。没有了受众，小丑就没了舞台。让他们去塑造自己的假想敌，每日沉浸在扮演革命者的游戏里吧。在我们的呵斥外，实际的革命运动总会教会他们，或者淘汰他们。

所谓的“左派团体”在互相网中陷入过家家的泥潭，社会现实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茶馆窗外的一抹风景。但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个小泥潭悲哀，因为**真正的革命力量并不在于数十年来搅在这个泥潭里的“网左”们，而在于数万万正随着社会矛盾的锐化，逐渐走向激进，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是决定性的力量的无产阶级等一切劳苦者们。他们没有沾染上左派圈子的种种陋习，只是尚未被组织和动员起来，而这才是中国革命的未来。**

重要的是，只有最有深度的理论和实际工作成果能给予想要前进的革命者以希望，一同组织起来；而有了这个组织，我们才能有效推进劳动群众的解放。**这个结果不是用争吵赢得的，而是找饶舌者无力的地方：实际的行动。**我们进行的可是要每一位革命者做奉献的事业，不是什么玩闹。

跳脚、谩骂、胡闹，都收起来罢！

葛兰西思想评析

自人类迈入阶级社会以来，社会就不断发展出越来越复杂的形式，其中的社会机构、教育机构、传媒机器、私人团体等，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地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而这些机构也在不断再生产着阶级社会本身，同时也延缓了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有效地动员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就正确认识这些机构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葛兰西的理论正好为革命家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用的理论工具。

安东尼奥·弗朗切斯科·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主义革命家，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认为，革命需要人的实践，而实践也离不开人们主观的认知。一切思想文化形式最终源于并服务于特定阶级的物质利益与实践需求，而**思想文化斗争的方法也必须被视作无产阶级政治动员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过程，它同改良斗争，同武装斗争，同革命的总体要求统一起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其实质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进行辩证分析，从而找到现实中实现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实现更高效组织方法的有效途径。

本文旨在简述葛兰西的理论贡献，如对知识分子的深入解释、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与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常识”、霸权装置（即精神生产资料）与“整体国家”的关系。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

知识分子研究的起点不应该只是从个体知识生产者出发，而要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出发。那么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能描述所有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活动，同时又能把他们和别的社会群体区分开呢？葛兰西认为，这种标准应该在**知识分子群体本身及其活动在社会关系总体中的位置中去寻找**。我们说某些人是“知识分子”，并非是因为这些人是某一特定的思维技能的载体的集合，而是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思考的人，或以特定方式思考的人，而是那些**其思想言论被认为具有一定权威**

性和分量的人。

在广义的知识分子范畴内，葛兰西认识到不同的知识分子存在不同的用处，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的具体智力活动必须根据其内在特性而被区分。在阶级社会，知识分子在最高层次上是科学、艺术、哲学等各类思想文化领域的创造者、领导者，也是对原始社会中由劳动者们创造的知识的总结者。知识分子在最低层次上则是社会秩序的“管理员”和传统积累的智力财富的传播者。

从伟大的创新者到基本的管理者和传播者，**所有在知识生产和传播领域耕耘的人都属于葛兰西定义的知识分子范畴**。从广义来说，他们必然是被其所处的社会 and 知识世界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所产生的知识不仅来自他们个人，还来自他们所代表的更大的社会力量，例如其代表的阶级，甚至是整个社会本身。那些参与传播知识的人，也符合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一词必须被理解为不仅指传统上被称为“有知识”的社会阶层（例如专家），**他们是狭义上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在广义上执行组织功能的（即阶级社会的秩序的再生产）人（包括但不限于国家职员、官吏、教会成员、教师等），无论是在经济生产、思想文化还是政治领域，葛兰西认为这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军队中的“士官”和“下级军官”。

出于这些考虑，葛兰西明确地将这一阶层，即我们可能称之为“行政人员”的人群，纳入知识分子的范畴，尽管对他来说，这些行政人员只是知识生产和传播总体过程中的一个要素。葛兰西提出了按照先前引用的军事军官阶层的隐喻，根据阶级内部不同能力和效能的知识分子的垂直组织。这种垂直关系的划分能够让我们发现，同一阶级中执行看似不同功能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在实际上比表明看起来更为密切，而不是不同阶级中从事仅表面上的相似活动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在狭义上的知识分子中，我们又可以划分出两种知识分子：1. 有机知识分子；2. 传统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的特定性，与其所产生阶级利益的特定性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并非只有一种“有机知识分子”类型。不同的阶级利益预设并暗示了不同的阶级组织形式，因此需要不同类型的有机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是从思想文化和实践两个方面来制定这种组织。

有机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由一个特定阶级在其发展中产生的，以服务于该阶级的利益和需求。有机知识分子深深嵌入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与该阶级的实践和目标紧密相连。这种知识不是抽象的或普遍的，而是具体且功能性的，旨在组织和动员阶级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他们将本阶级的其他成员的意见和需求转化

为连贯的政治表达，从而推动本阶级的利益的实现。每个阶级，都会有机地创造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阶层赋予它以同质性和对其自身功能的认识，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

有机知识分子的本质以及他们产生的知识类型并非固定不变，新出现的阶级会产生新的知识分子类型、新的知识形式和新的制度结构。特定类型的知识分子将从定义一个给定阶级的特定条件中涌现，能够产生该阶级所需的知识形式。葛兰西提供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知识分子的例子：“资本主义企业家在其身边创造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学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

然而，**一个阶级的知识生产形式将采取何种具体形式，只有在该阶级确立了其稳定的阶级统治，尤其是建立了该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完整的阶级统治后（即“文化霸权”），才会完全显现。**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是阶级在形成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定阶级所依赖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形成了特定形式的知识分子，因此在一个阶级形成前，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个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将采取何种形式出现。例如，西欧封建时代的教会学者与资本主义一道产生的科学家、技术专家、记者以及文学家就非常不同。但**一旦一个阶级及其有机知识分子确立了主导地位，其知识生产形式将凝聚成具有自身学习文化和传播知识方式的特定机构（即为本阶级服务的精神生产资料）。**例如，资本主义与现代大学的兴起就有这非常强的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既定的文化机构发展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和根深蒂固的“文化”。

对于那些“守旧”的知识分子——葛兰西所称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世界可能显得与象牙塔外政治家的权力斗争格格不入。他们甚至可能开始将自己视为真正的自主个体，即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超越阶级的。我们需要警惕特定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文化机构和对思想文化的实践中的定位，以及这些文化机构和实践与特定阶级的联系。知识分子阶层并不存在独立，每个知识分子都是某个阶级中的一员（他们代表自己所在的阶级），同样的，每个阶级都有其知识分子。然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行使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最终他们使其他阶级的知识分子从属于自己，并在所有知识分子中创造一种“团结”的环境，以实现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统治。

传统知识分子更像一个旧时代的“祭司”。所有传统知识分子都是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特定知识分子”，他们停留在“技术”领域，无法进展到对其所在的社会的主导和组织功能的政治理解。葛兰西就举出过意大利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例子，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是“现代继承者”，以适当的世俗形式，继承了罗马天主教会所建立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纯粹形式统一关系，即知识分子被视为思想的守护者，在教义限制内享有某些创新的特权，而民众则被剥夺了对社会思想秩序的积极参与，仍处于发展迟缓、迷信和偏见的状态。所以，**虽说传统知识分子无法跟上时代，但是他们在实**

际上也积极的维护着现存的秩序。

所有新兴的、革命的阶级（例如资产阶级），当他们开始崛起并占主导地位时，都会面对这一既定的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知识分子体现的是现有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正在努力诞生的新权力关系。**他们自身无法提出社会变革所需的全新世界观，他们产生的知识与过去而非未来相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要，他们需要被新兴的革命阶级争取到进步力量的一边，**任何一个正在向统治阶级地位发展的群体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其努力在思想文化上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不过这种同化和征服的速度和效果会因为该阶级同时成功地培养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而加快和提高。**



现在我们弄明白了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论述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一般来说，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功能是组织一个阶级的阶级统治，他们利用自身的声望和影响力，让社会大众“自愿”地接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当这种“自愿”接受出现问题时，他们也能利用国家的强制机器来维持秩序。他们不仅在社会中，也在国家机器内部运作。他们是连接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帮助统治阶级将权力从一个方面传递到另一个方面，并把社会力量整合为政治权力。此外，知识分子还在社会中扮演着“非政治”的角色，比如从事教育、文化、媒体等工作，但这实际上是在为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增加合法性，让其看起来更有声望。所以，他们既是国家的“战壕”建设者，也是统治阶级在上层建筑中的“工作人员”，帮助国家在“有组织的失衡”中保持平衡。

我们也要明白，真实的政治力量和各种叙事方式（如民族主义叙事、种族主义叙事、女权主义叙事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源于**一切阶级，即全人类，特别是劳动群众的实践活动和生活经验**，换句话说，政治力量和叙事方式也必然来源于经济基础，来源于客观的物质世界。正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与自然界的不断的交互，构成了任何一种社会得以存在、得以延续的基础。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核心任务是充当一个“中介”，他们需要将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这些零散、具体、充满“感受”和“激情”的实践经验，提炼并系统化，使其成为一个**清晰、连贯且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理论体系**。这个过程并非简单的“翻译”，而是一种有机的、辩证的互动。

但是，从古至今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无法意识到其真正的社会作用和其社会实践的真实意义。真正的政治创造力，或者说一个阶级真正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势力，必然需要知识分子与其代表的阶级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凝聚力**。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和融合：知识分子要**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其代表的阶级的情感、愿望和实践，然后将这些“感受”转化为理性的“理解”和系统的“知识”；同时，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阶级也通过这种联系，将自己的“感受”提升到“理解”的层面。这种“感觉 - 激情，转化为理解，进而转化为知识”的过程，是动态的、鲜活的，而不是机械的。只有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知识分子与其代表的阶级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共同生活”和“个别元素的交流”**时，才能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社会力量。这种关系是“代表性”的，它意味着知识分子真正代表了其阶级的真实愿望和利益，而不是自说自话。最终，这种有机结合的力量，能够将零散的社会力量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历史集团”，从而真正地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向一个更高级、更进步的历史阶段发展。这也是“有机知识分子”的提法的来源。

“常识”

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常识”这个概念远比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常识要复杂得多。它不仅仅是大众头脑中那些零散、不连贯、甚至有些矛盾的观念，它更是一种**无处不在、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哲学**。当人们在思考什么是“常识”时，也必然生活在一种特定的“常识”世界里。

这种“常识”最根本的特点是，它既不完整也不一致。**常识就像一个由无数碎片拼凑而成的万花筒，每一块都反映着每个人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一句话，阶级地位。**然而，它并非“大众”独有的。葛兰西说，任何一种哲学，即使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最终都可能在特定的圈子里演变成一种“常识”。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常识”，只是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在的阶级不同，我们的“常识”也就各不相同。每个人都习惯于用自己熟悉的叙事框架来解释周围发生的一切，否则这个世界就会显得杂乱无章、难以理解。**这些叙事框架既来源于每个人所处的特定圈子，也来自每个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这些经历本身又被既有的叙事所塑造。久而久之，这些观念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核心，我们用它来判断和过滤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以及别人对世界的解释。

葛兰西把“常识”比作一个多股交织的结，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一方面，它拥有“良好感觉”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让人们不那么容易被那些华而不实的宣传和诡辩所蒙蔽。它包含了劳动人民最朴素的智慧和生存经验，是“人民的创造精神”的体现。这种“良好感觉”在许多情况下都能够直觉性地判断出是非曲直。但另一方面，“常识”也充满了短视的盲目性。它有一种强烈的保守倾向，防御性地坚持那些令人感到舒适和熟悉的事物，排斥任何新的、陌生的观念。它“粗俗地恐新和保守”，这使得任何想要挑战现有秩序的尝试都异常艰难。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常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它是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社会——阶级社会中产生的，它所积累的“真理”本身就是不同社会和经济位置所产生的异质生活世界的沉淀物。**每个人的“常识”都带有其阶级的烙印。**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觉醒并形成自己的意识的，而阶级不平等的现实正是通过这种文化被我们所体验。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轮廓，包括其中的权力等级和与之相关的“常识”观念，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不容置疑**的，否则阶级统治就无法被延续下去。**它们是如此显而易见、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甚至不会去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或者提出质疑。**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可能被我们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经济规律，或是命中注定。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些不平等表示赞同或反对，但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些不平等结构中的人来说，要真正想象一个没有这些不平等的社会，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要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要实现共产主义，仅仅依靠改变经济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它也必须是一场文化的新兴，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常识”和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这种新的“常识”能够让被压迫的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能够**想象另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如果缺乏这种文化上的转变，那么任何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努力，都可能像堂吉诃德向风车冲锋一样，显得荒谬而无效。人们会认为这种尝试是徒劳的，因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至于这种新的文化和新的“常识”具体会是什么样子，葛兰西明确地说，这无法被预

先设计或预知。它将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和被决定的结果。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它将是工人**阶级与其“有机知识分子”之间持续“对话”的产物**，并且它必须建立在“常识”中那些积极的“良好感觉”成分之上。正如葛兰西在前文中提出的疑问一样：“一种形式上‘新’的观念是否可能以一种除了民众的原始、未加工的版本之外的其他形式出现？”可见，任何真正的新思想都必须植根于大众的土壤，从他们最朴素的智慧和经验中汲取养分，然后由知识分子进行提炼和升华。这场文化上的革命，正是实现社会解放的关键一步。它不仅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更要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

“整体国家”的概念

很多人认为，“国家”就是政府、军队、警察和法律，是一个高高在上、用暴力来维持秩序的实体。但葛兰西的“整体国家”概念就彻底颠覆这种认知，因为国家的权力远不止于此，它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正是阶级统治的精髓所在。

“整体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包含了两个既不同又相互渗透的部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它掌握着法律和暴力机器，是强制力的最终保障。而“市民社会”，也就是所谓“精神生产资料”，或是“意识形态再生产机构”。它不是与国家对立的，而是国家的补充。它包括了各种社会组织、文化机构、学校、媒体，是我们普通人日常交流、思想观念形成和阶级之间争夺话语权的地方，一句话，精神生产资料掌握着思想文化领域。

葛兰西揭示了国家和精神生产资料是如何**相互渗透和强化的**。他指出，资产阶级要想稳固统治，不能仅仅依靠武力压制，更要通过“市民社会”来赢得一切被统治阶级的“同意”。这个过程，他称之为“文化霸权”。文化霸权是一种基于“共识”的统治方式，它不只是用枪炮逼迫你服从，而是让你在思想上、文化上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让你自愿地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

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来对比资产阶级和以往的统治阶级。他说，之前的统治阶级，比如封建贵族，本质上是保守的。他们的统治是封闭的，是严格基于等级制的，不试图吸收其他阶级来补充自己。他们的观念是僵化的，只服务于自身。但资产阶级不同，他们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有机体，不断地吸收整个社会，将所有人都同化到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和经济体系中去。

正是因为这种特性，国家的全部功能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强制工具，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伦理 - 教化”机器。它通过教育、法律、社会福利等各种手段，塑造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让我们在无形中接受和认同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想想我们每天接触的媒体、教育体系、流行的文

化产品，它们都在不自觉地传递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观，这其实就是“伦理 - 教化”的体现。



葛兰西认为，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 19 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虽然是革命性的，但他们的国家机器还远未发展到后来那种高度精致、深入社会各个层面的地步。他指出，直到 1870 年后，那种“现代民主的庞大结构”才真正成型。但他强调，在那时，一个不可逆的原则已经确立：**国家不再是完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体，它必须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不再只是一个自上而下施加命令的工具，而是一个生产共识、将普通人整合进统治阶级发展蓝图的网络。

而实现这种整合的主要手段，就是市民社会。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理论阐释，正是基于这种新的国家形态。他认为，市民社会远非与国家对立，而是作为国家的补充，但它并非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就像一个缓冲地带，一个中介场所，让被统治阶级能够“有机地过渡”到统治阶级的国家中去。

在市民社会这个场域中，资产阶级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吸引和整合被统治阶级。他们提出了“自由”这个概念。在原则上，这种自由是向所有人开放的。这与古代的等级制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种社会里，你的出身决定了你的一切，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而资产阶级所带来的这种“政治”革命，正是通过赋予我们“现代人的自由”的真实感，让我们自愿地接受他们的统治。

这种新的统治方式，也就是“文化霸权”，与以往的纯粹强制手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市民社会中，霸权是统治阶级在国家机器中获得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而这种政治权力反过来又会强化他们在市民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这就像一个循环：在市民社会中建立的共识，支撑了国家机器中的权力；而国家的权力，又反过来巩固了市民社会中的共识。这个更广义的“整体国家”，正是这种阶级关系被固化并转化为制度形式的过程。因此，资产阶级的统治问题不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或者说，军事力量只是最后一道防线。更重要的是，统治已经变成了一种“毛细血管般渗透且永不停歇的引导”，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就像是渗透进社会肌理的血液，将社会的每一个部分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改造它们，让它们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工具。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浮现了：既然统治阶级努力地在市民社会中构建“霸权”，那么被统治阶级又如何回应这种霸权呢？这引出了一个常见的、但却错误的观点：有人可能会认为，阶级社会中的劳动者之所以服从统治，是因为他们“完全自愿被统治”。这种论调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服从也可以选择反抗，甚至选择以死抗争，因此不存在“被逼”的情况。

然而，这种观点完全误解了“完整国家”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力。葛兰西的思想，特别是他对意识形态的深刻洞察，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反驳。这个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阶级社会的客观强制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服从”等同于“自愿”。劳动者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暴力。它迫使他们在客观上再生产了剥削和压迫关系，但这绝不能被理解为他们是“完全自愿”的。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的，统治阶级通过对“精神生产资料”（即市民社会）的垄断，建立了一种“文化霸权”，把现有的生产关系“自然化”为一种“永恒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人们对生存需求的服从，被制造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常识”，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

那种认为“人不是动物，可以战胜生物本能”的论调，也陷入了自相矛盾的逻辑困境。它一方面宣称人可以超越本能，另一方面却将“选择生存”这一基本行为贬低为“动物性”，而将“选择死亡”抬高为“人性”的证明。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任何自由意志的实现，都必须以生命存续为前提。一个以死亡为代价的“反抗”，恰恰取消了自由意志的物质载体，又何来真正的“自由”可言？当统治阶级将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与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捆绑在一起时，“服从或死亡”的选择，就变成了**暴力下的形式自由**。

这恰恰印证了葛兰西所揭示的意识形态机制：**“无人相信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却仍在正常运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们可能明知自己被剥削，甚至嘲笑那些鼓吹“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鸡汤”，但他们仍然将工厂的制度视为“自然的空气”，不得不去服从。这种“实践意识的矛盾”正是对抽象“自由意志”最有效的证伪。统治阶级通过教育、法律，以及最终的国家暴力，将“服从”建构为一种“道德义务”，同时通过垄断生产资料和暴力机器，迫使人民不得不“假装相信”。这种强大的结构性暴力，远非个人意志所能对抗。

再者，有人可能会异想天开地问：那么为什么人们不能脱离这个阶级社会，回到原始丛林去生活？这个问题看似提供了“第三种选择”，实则完全忽视了国家在提供基本生存保障方面的关键作用。国家通过垄断合法武力，建立了军队和警察，终结了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的部落冲突和个体间的血亲复仇，极大地降低了非正常死亡率。国家还通过公共事业来抵御自然灾害、提供医疗和基础保障，将人的生存从原始、脆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去学习野外生存技能。骤然失去国家的保护，他们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因此，在“绝对的自由”与“有保障的生存”之间，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选择不是出于懦弱，而是源于对现实最基本的考量。最终，我们发现，除了在“整体国家”的框架下，服从统治阶级、再生产剥削关系和压迫关系之外，我们几乎别无选择。

所以，无论是法西斯国家的士兵、殖民统治的帮凶，还是血汗工厂的基层监工，他们看似拥有“选择”，实则都深陷于特定的生产关系和“文化霸权”之中。**他们的行为，甚至包括压迫行为本身，都是被这个巨大的系统所塑造和驱动的。**他们只是维持系统运转的“齿轮”，而他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在这种强大的结构性暴力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葛兰西的“完整国家”概念，正是为了揭示这一深刻的社会现实。

然而，葛兰西将“文化霸权”主要视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他似乎低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类似的统治方式。**事实上，无论是封建社会，奴隶制社会，都存在着一一种通过非强制手段来维持统治的“文化霸权”。

当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霸权”的实现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区别。

它不是通过葛兰西所说的渗透到社会肌理的“市民社会”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等级森严的宗教、宗法和传统习俗。在西欧封建社会，教会通过宗教教义来宣扬“君权神授”，灌输“上帝的旨意”，使农民相信自己的地位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信仰上的驯服比任何强制手段都更为有效。同样，在日本的封建社会，儒家的等级观念和武士道的忠诚思想，构成了稳固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让下层人民接受自己的命运。在古希腊的奴隶制社会，哲学家们通过将奴隶制合理化为“自然秩序”，将奴隶定义为“会说话的工具”，从而在思想上确立了奴隶制的合法性。

因此，可以说，**葛兰西的错误在于将“文化霸权”的实现方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和生产关系绑定得过于紧密。**他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市民社会来生产共识的方式。但实际上，“文化霸权”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在不同阶级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只不过它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霸权”更多依赖于**神圣的、不可动摇的传统和宗教权威**，而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则依赖于看似平等、自由的市民社会网络，这是它们最根本的区别。

“霸权装置”

如果说“整体国家”概念旨在描绘特定阶级如何在政治领域中使其制度性政治权力或多或少地持久化，那么“霸权装置”的概念则试图勾勒出该阶级如何通过市民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

这种权力的上升不是一次性的，它必须是日复一日地、持续不断地进行，也就是说，它必须让权力结构能不断延续。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案要想有效，就必须每天都在我们生活的背景中，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视野里，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再生产。而“霸权装置”，正是构成这种日常背景和视野的物质基础。

因此，“文化霸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主导，更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霸权。它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东西组成的复杂集合体：有制度（比如学校、法院）、有意识形态（比如流行观念、价值观）、有实践（比如日常行为规范、社会习俗），还有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当然也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知识分子”。

起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集合体看起来杂乱无章，但葛兰西表示，它有一个内在的统一性，那就是它始终围绕着某个特定阶级的扩张而展开。这个“装置”只有通过参照那个在各种子系统的中介作用下构成其自身的阶级，才能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跨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与“私人”的界限，涵盖了一个统治阶级为了具体化其霸权方案而采取的所有举措。

“霸权装置”的本质是一种力量关系的物质凝结。它是统治阶级或阶级联盟内部力量

的体现，正是通过这个“装置”，他们才能在政治层面上有效地对抗他们的对手。它就像一个**桥梁，将一个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积累的力量，转化为他们在政治社会中的实际权力**。因此，“政治权力”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一个特定阶级的属性或能力。它指的是一个阶级相对于另一个阶级的行动能力，也指一个阶级能否将其在政治领域中的举措，与其在市民社会中的社会基础充分地联系起来。政治权力并不仅仅存在于国家这个凝结体中。相反，它内在于那些霸权方案之中。正是通过这些方案，各个阶级才能够将自己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能力行使政治权力的阶级。这与那些仅仅为了“行会式”利益而组成的松散群体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当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时，这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才能在与其它阶级的关系中，最终呈现出国家的形式。

因此，一个阶级的政治权力有多大，并不取决于它掌握了多少武器或法律，而是取决于它能否找到与其自身独特的霸权方案相匹配的制度形式。这个“霸权装置”正是这种制度形式的体现。它是一个阶级在市民社会中的根基，也是他们在政治社会中获得权力的秘密武器。它让我看到，权力并非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施压（这只是一个方面），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由社会基础支撑的复杂过程。

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的实现方法

我们讲完了旧的剥削阶级是如何实现其统治的。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统治，也就是他所说的“霸权”？葛兰西表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政权那么简单，革命更是一个深刻的、全面的、涉及思想和文化的革命。这让我意识到，**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宣言，而是一套系统的、能够真正改变人心的“辩证教育学”**。

葛兰西认为，这种无产阶级的霸权装置需要一种全新的集体机构或组织，其核心是让大众积极、直接地参与到民主制度的构建中。这绝不是那种被动、间接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同意”，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即使这个过程可能会引发暂时的混乱和瓦解。这种积极的参与，是构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葛兰西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解释，他称之为“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不是为了让普通民众停留在他们原始的、零散的“常识”中，而是要引导他们走向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观念。它肯定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接触的必要性，但这种接触绝不是为了把科学活动拉低到大众的水平，也不是为了维持一种低层次的统一。相反，它的目的是构建一个“知识分子 - 道德集团”，从而让大众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取得进步。

对于那些有机地与这一霸权项目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角色也

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葛兰西表示，他们不能再满足于个人化的、孤立的发现，他们的任务更多地是成为“永久积极的说服者”。他们的使命就是不断地向大众展示，无产阶级霸权实践有能力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应该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学者，而要是一个投身于社会实践、致力于改变世界的行动者。

葛兰西指出，我们所处的社会，特别是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阶级，其思想和实践往往是“不连贯”的。这种不连贯，既是逻辑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这些阶级的经验，被限制在统治阶级所主导的“市民社会”领域内，他们经历着一种持续的、零散的、瓦解的“分子式转变”，这大大削弱了他们个人和所属阶级的行动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葛兰西认为，“锻造连贯性”，或者说“组成复合体”，就成了形成一个能够行使霸权的阶级的必然阶段。而“实践哲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将大众的“常识”提升为“良知”，也就是赋予它一种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这使得大众能够突破当下所强加给他们的不连贯性和被动性，从而采取积极的行动。

这个过程也反过来改变了哲学本身。**哲学不再是简单的“调和”各种矛盾的利益，它必须承认自己的基础源于大众对连贯性和行动能力的渴望。哲学要成为真正的哲学，就必须承认它依赖于“常识”作为其发展的“原材料”。**在葛兰西看来，常识的不连贯性，并非哲学连贯性的对立面，相反，它是其前提条件，是这种连贯性得以产生的“基石”。

葛兰西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全新的、作为世界观的哲学，不可能通过法令凭空产生。它需要实际的建设者和组织者。为了在思想上战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首先需要在政治上削弱他们，摧毁他们在“市民社会”中建立的“战壕”，切断他们赖以维持政治效能的知识和思想补给线。换句话说，要创造一种新的大众世界观，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要适合无产阶级的具体任务，还要在传统知识分子相对立的知识领域中行使霸权。葛兰西相信，当工人阶级发展出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时，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征服”就会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葛兰西也进一步阐明，工人阶级自己独特的知识分子群体，只有在该阶级整体努力摆脱其“经济-行会”阶段、并在其自身的具体霸权机器中行使真正的阶级霸权时，才会发展起来。

葛兰西同样关注大众中的积极分子。他指出，**这些人虽然在实践中改造着世界，但他们可能并没有对自己的实践活动形成明确的理论意识。**他们的“理论意识”可能与他们的实际行动是矛盾的。他们可能拥有两种矛盾的意识：一种是内在于他们实践活动中的、将他们与合作者联合起来的意识；另一种则是从过去继承而来、未经批判吸收的“口头”观念。这种“口头”观念并非没有后果，它会影响他们的道德行为和意志方向，甚至可能导致意识的矛盾状态，使得他们无法做出任何行动、任何决定，最终陷入文化和政治上的被动状态。

因此，葛兰西强调，自我批判性的理解是通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治霸权的斗争才能达到的。这是一个将自身的现实观念提升到更高层次的阐述过程，首先在文化领域，然后是政治领域。他认为，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确定的霸权力量（也就是政治意识），是迈向更高层次自我意识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理论与实践最终能够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事实，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从最初的感觉区别和分离、一种本能的独立感开始，最终发展到对一个统一、连贯的世界观的真正和完全拥有。

这就是为什么葛兰西认为，霸权概念的政治发展不仅代表了政治实践上的巨大进步，也代表了哲学上的巨大进步。因为它**必然要求一种智力上的统一，以及一种与超越常识、已成为批判性的现实观念相一致的观念**。他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特别是列宁主义后期的理论化，认为霸权被构想为常识与实践哲学的批判性要素之间的“辩证教育学关系”。这种关系构建了当前分散元素的连贯性，从而从根本上改造了哲学的基础和能力本身。**仅仅是“思辨”的、与现实分离并观察现实的哲学，在“实践与理论”的这种生产性概念面前，已经失去了所有意义。**葛兰西提出的任务不仅仅是理论与实践在形式上的统一，而是要思考它们在一种“更新的实践概念”中的同一性的生产。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理解：我们是在一个特定的实践基础上构建一种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并等同于它们，从而加速历史进程，使其更加同质、连贯和高效；还是在给定某种理论立场的情况下，组织必要的实践要素来使其运作？

葛兰西的结论是，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是一种批判性行为。通过这种行为，实践被证明是理性和必要的，或者理论被证明是现实和理性的。他分析了人类知识关系作为一种“力量霸权关系”的理论形式，这使他暗示了一种知识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关系可以承认其高度实践的地位，从而无需以思辨的方式去统一多样性，而是直接在实践中实现统一。

葛兰西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剖社会权力的利刃。它揭示了阶级统治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国家不仅是强制机器，更是通过文化渗透和思想教化来生产共识的“整体国家”。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要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就必须在经济和政治斗争之外，于文华层面展开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需要我们去改造“常识”，去锻造连贯性，并创造一种新型的、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有机知识分子。

八十五年之际：托洛茨基 思想评析

“自从我明白事理之后，在43年的生活中我始终是一名革命者，其中42年是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如果我必须再从头做起，我当然要力求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生活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与青年时代相比，倒是更加坚定了……生活真美好，让未来的一代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恶、压迫和暴力，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吧。”

“托派不等于托洛茨基”不等式

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讽刺的一样，反对革命者思想的人，也往往不得不作出表面功夫承认其功绩：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面对托洛茨基作为一名共产主义革命家对俄国和世界革命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不再有前辈们用清洗、囚禁、压迫和刺杀窒息真相的物质基础，也无法把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完全贬为“彻底的反革命叛徒”后，厚着脸皮继续赞扬十月革命（当然，活在自己时间线里对托洛茨基进行污蔑的“顽童”也不在少数）。他们转而创造出一个迷惑性的说辞以阻止托洛茨基的思想被革命者学习——这就是著名的“托派不等于托洛茨基”不等式。

从任何涉及托洛茨基的讨论底下都可以看到它。不涉及“托派”的地方，他们只要看到托洛茨基就非要说上这么一句。他们在营造一种氛围：差不多得了，你们夸夸托洛茨基还暂且能忍，但不许理解、不许付诸实践！

这个不等式在文字意义上的正确性显而易见，且不局限于托洛茨基和他所谓的“追随

者”们。我们年代许多自称“马列毛”的红小将们，难道不也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毛泽东身上，而对他的遗产从未认真学习和反思吗？**挂上革命者姓名的团体中，不乏利用前人光辉来照耀自己歪曲的思想和路线的野心家。**

有人提出不等式的原因，不是意识到了托洛茨基的思想远超于部分“托派”片面的解读，而真正革命性的核心部分被抛之脑后；他们自己对托洛茨基思想的了解少之甚少，只想作出一种切割：托洛茨基是安全的死人，任何人胆敢学习他的思想，我们曾给托洛茨基扣上的帽子就要加倍地扣给你们。

他们千篇一律重复“托派不等于托洛茨基”的时候，暗里就将托洛茨基变成一个金像受人尊敬，而他所代表的思想则埋于地底。从这个层面，不等式就是错误的了：**它引导人们的方向不是揭露“某人之派”们的局限性，而是彻底切断革命前人的思想和今日实践的联系。**

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最让人广为熟知的思想，就是“不断革命论”。它于1905年革命后，结合了运动的经验、俄国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民主工党斗争的成果诞生了萌芽，此后一直向更为系统化的方向发展，并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得以展开双臂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实践。

中国革命者首先很幸运，我们在翻译上不像英美革命者遇到了理解的障碍：不断革命的英文通常为“Permanent Revolution”，直译为“永恒革命”，乍一看如同信徒的誓言而非严肃的理论。中文的“不断”翻译精准地抓住了这个思想的核心：**落后国家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不间断性。**

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农民为主、专制政权压制一切民主权利的畸形国度。它自始至终没有一场真正的“资本主义革命”，许多俄国革命者，都认为俄国面前的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他们看来，历史如果不走过西方国家经历的阶段，就是乌托邦的幻想。但托洛茨基指出：

“移殖到美洲去的欧洲人，并不把历史从头做起。德国或美国在经济上之超过英国，恰巧由于它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起……历史上说是落后的民族，他们的发展必然要把历史过程的各个阶段，加以特殊的结合。他们整个发展的历程，带有一种无计划的、复杂的、综合的性质。”

“为全俄国利益而斗争的责任，已注定落在国内现有唯一强大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身上。因此，工业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政治重要性，因此，俄国争取从窒息它的专制制度重压下解放的斗争，已变成单纯是专制制度和工业无产阶级间的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农民可以给予很大支持，但不能起领导作用。”

列宁也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表示：

“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

可见，在对资产阶级的态度这点上，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不认为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将由资产阶级领导。列宁解释道，**只有工人阶级在与广大的农民群众的联盟中，才能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托洛茨基的口号是：“既不要沙皇，也不要地方自治者（即自由派），而要人民”。

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历史不是“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一样横铺开来的年代表，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历史的规律性与迂腐的图式主义绝无共同之点”。当资产阶级在几个地方建立了政权并巩固了对全球的统治后，其他国家**资产阶级就不再和他们的前辈同样具有所谓的“革命性”**。托洛茨基所称的“配合发展律”认为，俄国社会处于“各阶段路程的接近，各个阶段的联合，古代形态与最现代形态的混合”。

不断革命论反对机械的阶级力量和倾向分析。为 A 带来可观利益的革命，不见得只能由 A 来完成；B 替代 A 完成了 A 的革命之后，更不会止步于此，而是执行 B 的政策。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确在马克思主义定义上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这项革命的利益不会服务于资产阶级自己**，相反他们十分乐意苟活于专制制度之下。

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让他们清晰的意识到自己没有彻底消灭专制政权的勇气。资产阶级自身没有能力进行一场革命，他们的前辈唤醒了全民、作为民族的代表向帝王发起了冲锋。但现在的时代，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且由于工业的扩张一日比一日更有组织、更有力量。**相比于对专制政权的恨，他们更畏惧无产阶级对自己的恨。**即使哥萨克阻挠资本家进入议会，他们起码拦住了工人群众夺取工厂。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明白，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投资资金一般都会首先流向以世界市场价格计算利润率最高的部门，即原料生产部门。但是，这些地区落后的原因，正在于这些市场价格决定了投资集中在原料生产方面。要脱离落后，要使当地工业化，就要自觉地暂时将投资引向利润率较低（按价值规律而言）的部门，而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资本逐利的天性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此这种投资模式也不可能被消除。

这种投资模式强化了这些地区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产业链的依赖，使其经济结构畸形，而落后地区的资产阶级显然无法摆脱这一经济依附结构，**即使资产阶级主观上可能希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而有冲破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

和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的压制从而存在反帝反封建的诉求，其利益也必然与全球剥削链条深度捆绑，从而普遍表现出强烈的买办性，这种买办性也必然盖过反帝反封建的诉求，从而害怕把反帝反封建进行到底。要真正实现工业化和脱离落后，必须主动扭曲价值规律，将投资引向短期内利润率较低的工业部门，而这恰恰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悖。



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托洛茨基说，这场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会被资产阶级所执行：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要彻底、真正解决它们的民主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着全体被压迫的国民（首先是农民大众）的专政才可以想象。”

“俄国工业发生的条件及其结构，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性质及其政治面目。工业的高度集中，其本身即已表示了在本家的上层与民众之间，并无许多中间阶层。此外我们还得说明一点：最重要的工厂、银行与运输机关的所有人既然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俄国吸取了利润，而且还因此在各个外国议会中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不仅不促进俄国议会制度的斗争，而且还时常表示反对……如果在自己历史的曙光期，俄国资产阶级还太不成熟，不足以完成宗教改革，那末当它应该起来领导革命之时，却是过度成熟了。”

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局限于传统印象上的推翻帝王、成立共和国、实现普选等等建

立“反专制”的政治体制。上层建筑的改动，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发展出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于俄国来说，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废除落后土地所有制以推动资本主义发展：

“如果作为旧俄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已为资产阶级所解决，如果它能被资产阶级所解决，那末俄国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在 1917 年走上政权。”

但这个任务如今落到了和资产阶级同样年轻、但力量数倍强于它的俄国无产阶级身上。俄国经济上不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一个道德、主观上的概念，而是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诞生出的新社会体制。这点托洛茨基并未进行否认，而是指出这不足以让俄国革命者断言无产阶级就要等到资产阶级老爷“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发展了资本主义，才能走上历史舞台：

“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比在资本主义更先进国家早些得到政权。……若把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自动地决定于本国的技术力量和资源，那就是一种“经济的”唯物论成见之简单化至于极限了的。此种见解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创造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中，政权可以（革命若是胜利的，那就必须）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家尚未能完全发挥其统治才能以前，便落于无产阶级手里。”

换言之，**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不是在自己“喜欢”的历史阶段再介入到革命进程之中**。俄国革命的各阶段有一种显著的相续性，革命者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本身就反映出了无产阶级开始将自己的力量施展到政治领域，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阶段论”先入为主定义俄国社会下一步面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并必须由资产阶级所领导，不顾俄国具体社会现实和资产阶级自己是否有此意图，呼吁共产党人去支持、辅佐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刻板印象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旗手）反抗沙皇制度。我们的任务也被简化为了劝说工人阶级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建一个同样剥削自己的新政权，直到他们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把俄国发展到了西方国家的水平，工人才能提出自己的诉求，不然就是“企图跳跃历史阶段”。

革命有所谓的“阶段性任务”，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革命是螺旋上升、持续发展的过程，而非僵化的“阶段”的堆砌，阶段的划分从不代表共产党人在不同阶段就有自相矛盾的纲领、只能局限于某种“合适”的工作。任何特定阶段的斗争任务，其解决条件与内在动力都必然超越其自身的直接范畴，革命的进程因而呈现为一种“不间断”的螺旋上升——较低阶段任务的彻底实现，有赖于将其推向更高阶段的斗争；而更高阶段的斗争，又是解决前一阶段内在矛盾的唯一途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纲领必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超越性，其斗争形式与内容由革命的总体逻辑决定，而非屈从于对某个“阶段”的僵化定义。**划分阶段是为了更好的落实各阶段的重点工作，而不是撕裂革命者的立场**，不是像盯着革命工厂流水线的传送带发呆一样！

此外，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既是政治的（推翻前资本主义的制度残余、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少数民族、没收外国资本、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国民教育制度等），也是社会的（土地革命、建立统一民族市场、扫清工业化的障碍），两者紧密相连，但是往往无法由一次革命彻底完成。所谓要进行“两次革命”甚至“多次革命”是一个过程，其重点在于认识到**最初的革命行动常常带有探索性质（例如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俄国 1905 年革命），未必能完全达成既定目标。这种不彻底的革命并非失败，而是为后续更彻底的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扫清了障碍，积累了经验。没有这个必要的探索和准备阶段，真正彻底的革命就难以成功。**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第一次革命只解决政治任务而第二次革命解决社会任务；实际上，彻底的革命是对前期不彻底行动的完成和深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真正的革命完成需要经过探索和准备的阶段，缺失这个过程，革命就难以达到其最终目标。

阶段革命论的思想不仅在孟什维克中很有市场，它甚至曾束缚了很多布尔什维克，使得二月革命后党的立场蜕化为支持临时政府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比如，一名日后的“伟大领袖”在三月就曾暴论到：

“工兵代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领袖，是监督（？）临时政府的机关。而临时政府事实上起着把革命人民的成果巩固下来（？）的作用。工兵代表苏维埃动员力量，进行监督，而临时政府虽然固执已见，碍手碍脚，但总还起着把人民事实上已经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的作用（？？？）。”

在他看来，临时政府的“本意歪了，但是执行是好的”。苏维埃不应该代表工人和农民掌握政权，而应该辅佐心不甘情不愿、阻挠革命继续推进的旧统治阶级的新代表，像家长一样“监督”教育它为革命服务。临时政府的存在被颠倒为“巩固”革命成果的机关，而不是革命不成熟阶段过渡性的产物、企图窒息革命的反动机构、与苏维埃对立的双重政权。

列宁的《四月提纲》直接戳破了这层幻想——“**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诺言，完全是谎话。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不再是帝国主义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容许的”。资产阶级不会和无产阶级联手并进！无论是克伦斯基还是科尔尼洛夫都表明了统治阶级不会与被统治阶级和平共处。阶段革命论看似洞悉了社会运转规律，以为自己是成熟稳重的，其实不过是机会主义者的遮羞布，托洛茨基讽刺道：

“我们是不是该在革命发展越接近建立工人政府的时候，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或者我们应该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政权当作一种不幸，因而加以回避的好呢？”

那些对不断革命肤浅理解的人，往往不能从理论上提出有力反驳，便经常落下一句话就走：“啊，你们说的好听，不断革命论有实践吗？世界上有成功过吗？”他们此类

诡辩家如果放到马克思的年代，就是讽刺马克思“共产主义存在吗，你扯什么呢”的无知者；他们将黑格尔“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给倒了过来，变成了“凡事不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且此为一切延续的腐朽建制辩解、为一切走在路上的斗争泼脏水。可惜他们挑错了诡辩的对象：是的，**不断革命论有实践。这个实践，恰好就是他们了解程度只局限于油画里列宁振臂一挥的那场十月革命。**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政权，无论其领导者阶级出身如何，但凡要做出事情都在实践中不自觉地遵循了“不断革命”的规律。在东欧，战后苏联红军的存在使得本土资产阶级势力被瓦解，新建立的政权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大规模推行国有化和集体化，将生产资料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尽管这些政权由工人阶级官僚阶层统治，但其经济基础是基于非资本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以扭曲价值规律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正是在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摆脱帝国主义依附的唯一途径。同时，东欧各国也在苏联支持下也进行了大规模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土地并将其集体化。

古巴的革命则更加典型。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最初是民族民主革命，但面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古巴本土资产阶级迅速表现出买办性，选择投靠美国。为了对抗封锁、保卫革命成果，卡斯特罗政权不得不将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从1960年代初开始，古巴政府将所有美国公司、本国大庄园和工业企业全部国有化，废除了私有制，还实施了《土地改革法》，将大地主的种植园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民，彻底瓦解了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一行动不是出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而是为了生存，却客观上摧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了官僚专制的工人国家。

在叙利亚和缅甸，我们甚至看到了**小资产阶级和军官为了实现其民族主义和国家富强的愿景，在历史的特定时刻，不得不采取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的革命行动的情况。**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在1960年代初期，通过法律法令（如1963年的国有化法案）将国内的石油、银行、电力等关键产业收归国有，也通过土地改革法令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并重新分配给农民，例如在霍姆斯和哈马等地区，大地主庄园被拆分，有效地终结了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缅甸军政府则在1960年代，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法》（1965年）等法令，将全国所有银行、出口贸易公司、甚至零售商店都强制性地收归国有，以切断与买办资本的联系。奈温政府也在1960年代初实施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全面废除地主制，将土地所有权归于国家，并通过合作社形式进行集体耕种，例如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这打破了旧有的封建剥削关系。

这些措施导致了生产资料大规模地从私有转为国有，使得生产和投资决策不再以利润

为唯一考量，而是由国家计划主导；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国家确实展示了生产资料的非商品化。例如，叙利亚政府可以直接调配国营钢铁厂（如位于拉塔基亚的国有钢铁联合企业）的产量，用于建设基础设施或分配给其他国营工业，而无需考虑其市场价格。同样，缅甸政府直接控制了所有农产品（尤其是大米）的生产和流通，国家通过计划来分配资源和控制价格，大米不再作为自由流通的商品存在。它们在经济上建立了以国有化和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破了私有制和资本逐利的逻辑，实现了生产资料的非商品化。

但在政治上，这些国家都并非由工人阶级领导，而是由军事官僚统治的专制政权，这个官僚阶层利用国有化经济作为巩固自身统治、压制反对派的工具。但是这种政权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一个道理：**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特殊历史环境和阶级力量对比，使得在落后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是真正彻底的完成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唯一方法**，而在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使用社会主义手段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丝毫不否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必须在革命第一阶段优先完成”的命题，因为该阶段的核心目标始终是解决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问题。工人政党不能为了所谓的“民主革命任务优先”而牺牲工人利益或压制工人动员，整个革命过程中，不存在一个所谓“阶段”让工人阶级不必或不该为自己特有的反资本主义要求斗争。当然，从这些初步措施到全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会有过渡期（因为要实现国有化总归是需要时间的），而过渡期长短取决于实际情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和实际需求。但是无论如何，**革命必然会从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不间断地”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今日的中国革命，不断革命论的启示同样有自己的光芒。重要的不是它的结论，而是连贯性的分析方法。

资产阶级民主只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手段，资产阶级政治的一场形式，而非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已经是彻底完备的了，而且这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领导群众的革命推翻旧统治者实现的，而是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实现的。

因此，**我们中国革命的前景没有优先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实现民主如果只是在资本主义下给予形式民主，那任何东西都不会前进。对专制政权的进攻，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才能避免沦为改良主义“先为中国工人争来政治民主，再和劳动群众提阶级斗争”的立场。必须警惕向浮夸、精神错乱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屈膝臣服的阶段革命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和反专制的立场“矛盾”的，这属于自由派的工作。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广大劳动群众真实参与到政治并成为统治阶级，那中国的前景无非是主席改名为总统，官僚改名为政客。**打碎专制的人，不会是反专制的学者和精英，**

只能是中国无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不会止步于赢来政治上的自由，而将力求成为社会、经济、自己生活和命运的主宰。

“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思想常常被扭曲为不顾本国发展、一味冒险用刺刀往国外“输出”革命的极左主义。我们都不知道这是那颗星球上的托洛茨基！多么的可悲，如果列宁不早早离世，也要被打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叛徒遭到批判。

国际主义自始至终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革命的代表歌曲是《国际歌》，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建立一个与世隔绝的天堂，而是实现“英特纳雄耐尔”。我们在曾经的文章《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必要性》中指出：

“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是什么从道德出发的理想，而是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思想意识……如果认为工人国家只有打造所谓‘中立形象’才能保障工人国家不被推翻，那就相对于要求罢工工人在罢工的同时遵守资方生产纪律，在逻辑层面自相矛盾。”

那这种要求工人阶级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与自己国际上的同志们团结起来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呢？托洛茨基解释说：

“在一国的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再不能与民族国家的范围相调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种新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不断革命；只有到了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完成。”

如果没有国际主义，那不断革命论也是不完整的。认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内进行革命就可以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余震、建设社会主义，和今日我们看到的那些在农村开所谓“合作社”、办“红色产业”的空想主义者并无本质区别。正如之前所说，俄国不存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工人阶级却要承担起政治领导、建立新政权的使命——那推翻了专制政权后，如何确保一个健康、发展的工人国家的延续呢？列宁给出了简短而有力的回复：

“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会灭亡，这是绝对的真理。”

在这里列宁乍看如同一个“托派”一样，这种差异就来源于其所谓“追随者”们用实用主义扭曲国际主义的尝试。这时候他们立刻改口，承认国际主义，即世界革命是必



要的，但是这里“太急”了。他们说，这样自己家里头的事情还没解决好就想去管别人，是不切实际的，欧洲工人阶级才不想要红军给他们讲什么解放呢！

这种误解把国际主义当成了军事性而非思想的解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下工人阶级得出革命结论的方法，如果已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就是等着“天兵”相助。官僚不需要思想，只需要武力，创造出糊弄人的解释，自然无法理解国际主义的内涵。《共产主义者》说：

“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反对坐等革命条件“自然成熟”的消极态度，也反对越俎代庖的武力干涉（即单纯用刺刀输出革命）。为了输出革命，工人国家必须通过国际主义组织传播革命理论，构建跨国信息网络，将局部斗争经验转化为普遍认知模板。”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其核心在于将任何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非孤立的局部事件。国际主义强调全球工人阶级必须协同行动，要求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积极推动全球阶级斗争，最终实现阶级的消亡。”

坚持国际主义立场、推动世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不是矛盾的。相反，前者是后者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资本主义将全世界连结成一个市场，跨国公司和国家联盟带来了资产阶级的全球联合，自这世界市场形成以后，世界各国不可能在把自身脱离于国际分工、脱离于世界原材料供应地和先进国的技术等的情况下发展出先进的生产力，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起点应该是比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还要高”。人们不可能用锄头取代拖拉机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更不可能用虚报的产量掩盖真实经济基础的落后。更何况，传播革命的思想没有什么成本；世界革命从来不是为他国无产阶级空投物资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托洛茨基认为：

“没有人要求苏维埃政府到另一个国家进行冒险、作出不合理的举动、或者尝试以暴力催迫世界改变……这里所说的，是关于苏维埃国家的一般方向的问题。”

事实上，“刺刀输出革命”的路线是托洛茨基自始至终坚决反对的。甚至在一次辩论中他愤怒地说，**“有谁想靠红军作战取代国外的革命，那么就让这个人给自己在脖子上挂上磨盘投身到海里去更好。”**国际上工人阶级的团结应集中于帮助彼此了解并解释社会和政治经验与任务，而不是试图代替别人去解决那些任务。

背离了国际主义立场，必然走向民族救世主义。托洛茨基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克里姆林宫扼杀国际上社会主义革命前景，操纵、麻痹民众以达到无限制地对其统治的目的之时，捍卫了《共产国际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的初衷：

“全世界无产者，在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反对君主制、反对特权阶层、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反对形形色色的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第三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农民的性质和潜力

对托洛茨基思想的一种通常的误解就是“轻视农民”，就因为托洛茨基认为农民不能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发挥作用。事实恰恰相反，托洛茨基极其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巨大力量。托洛茨基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主要人口多数，且土地问题至关重要的国

家中，恰恰只有**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贫农在自愿基础上结成的工农同盟才能作为革命胜利的保证**。这个联盟，也必须由工人阶级所领导：

“关键在于谁在政府中掌握领导权，并通过政府领导全国？当我们说到工人政府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政府的领导权应该属于工人阶级。”

这代表说工人阶级应该把自己视为农民头上新的老爷去对其进行统治吗？托洛茨基特地解释：

“当我们说工人政府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工人阶级代表在其中占统治和领导地位的政府。”

这不同于排斥真正无产阶级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府，无产阶级愿意与其他被压迫者一同分享政权——但前提是自己处于领导地位。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后，**民主制度就在形式上有时并不严格限定参与者仅为统治阶级成员**，例如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形式上承认工人阶级甚至更广泛的群体的选举权，工人民主制度下也必然包含小资产阶级、农民等其他阶级参与政治，不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最终决定了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并主导政策制定与权力运行的方向。因而只要阶级存在，一切**“民主”在本质上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民主**，而所谓**“全体人民的民主”在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哪怕是工人民主制度，其核心也在于保障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这是因为只有工人阶级能最坚定的推进革命，能走到最远；只有工人阶级能最置身处地去为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而斗争，不摇摆不定。

声称政权由工人领导，那如何能让农民信服、接受革命？很多人不否认农民的局限性，却认为需要使用小把戏“拐骗”农民先在革命早期投靠于无产阶级。我们说阴谋诡计不如实际利益：在一个旧统治集团与资产阶级都不愿意在土地问题上作出彻底的改革的环境下，底层农民自身最基本的利益同整个革命的命运，即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托洛茨基分析道：

“无产阶级的统治意味着承认农民在土地关系方面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变革（没收土地），无产阶级将使这些变革成为国家在农业方面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革命初期最困难时期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兴趣，无论如何不亚于法国农民对于维持拿破仑·波拿巴军政府的兴趣（拿破仑政府曾以强大的武力向广大小农保证后者土地的不可侵犯性）。”

为什么说农民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推开并取而代之呢？为什么托洛茨基认为农民自己无法发挥独立政治作用呢？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农民要么受资产阶级“好意恩施”欺骗而对无产阶级敌视，要么在无产阶级的鼓动下参与进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更不用提农民本身上下层分化为贫农、中农、富农等等阶层。“农民”群体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从事的职业都与农业相关。**一个杂质、内部存在不同分化的群体，并不足以**

独立作为一个阶级承担历史任务、进行属于自己的革命，而是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不同人群归属于不同阶级——农村的无产者、小资产者与资产者。托洛茨基解释道：

“历史经验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市征服农村的历史。在西欧，城市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中的封建关系最终无法再延续下去。而且，农村本身没有产生一个能够革命性地消灭封建关系的阶级，这个阶级诞生在城市。城市使农村屈服于资本，并把革命传播到了农村，使后者在政权关系和财产关系上服从新秩序。再后来，农村在经济上彻底地成了资本的俘虏，而农民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俘虏……在当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税收和军国主义，使农民落入金融资本的手心，并通过教会、学校和军营灌输奴隶思想，推搡着农民为银行家们卖命。”

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中也能清晰洞察到这个真相：任何一个推翻旧王朝的农民起义军，即使稳固了政权，最终也会重新沦为乡绅地主的代言人。农民一次又一次地被不同阶级发动并进行利用，而自己从来无法建立一个“属于农民”的社会。

之所以必须重视农民问题，正因为他们俄国人口中占了极其重要的比例。而农民最为关切的，就是土地问题。托洛茨基说：

“土地问题构成了革命之下层土壤。在直接由农奴制发生的古旧的土地制度中，在地主们的传统权力中，在地主、地方行政机关与等级性的“地方自治会议”所结成的紧密联系中，盘生着俄国生活之最野蛮现象的根，成为数百年来这项制度之支持的农民，同时也就是这制度之第一个牺牲者。”

农民的斗争并未催促资产阶级和富农前进，反使他们决然后退到反动营垒去。农民革命如此被资产阶级抛弃了；如果不是工人阶级的影响，俄国农民就会像无头苍蝇一般，在一次次盲动中走向失败；但同样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工人阶级就如同孤岛般被资产阶级的海啸湮灭。

正因为如此，**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与全体劳动者被压迫者进行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是必须的。从不该贬低农民，也不该夸大农民。可要认识到其革命性与局限性，并用灵活、合适的方法进行动员以站在无产阶级的阵营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共产党人的任务。**

“革命恐怖”与“民主”

“你们共产党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疯子！”“你们打着革命的旗号，镇压一切民主的声音！”

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面对着共产主义的幽灵，这时候都联合起来了。他们日夜不停地向世界散播恐惧：如果共产党人夺权，那他们天真的理想将会建立起一个“反乌托邦”。这种聒噪是幼稚可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面对布尔什维克发动的革命，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为了遮掩自己的反动立场，将列宁与托

洛茨基所领导的党妖魔化为一个“疯人院”。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进行了超过三年的大屠杀，劳动群众因为上层阶级的打闹在战壕里彼此厮杀，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但这都不重要！你们看，布尔什维克带领暴民们阻止了反动派发言，这哪有民主！他们处决了几个反革命分子，简直是不拿人命当命！

他们为沙皇一家的死嚎啕痛哭，却从未为无数死于非难的贫农留下过一滴眼泪。在无产阶级要求行使其权利的时候他们保持沉默，而无产阶级一捂住自己的嘴就大怨大屈！

托洛茨基则在关键节点彻底撕下了所谓“永恒的民主信条”的面纱：民主不过是统治阶级执行其政策的一种手段。民主先问是谁的民主，更不要说形式民主和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上没有直接联系。他揭露说：

“民主原则——人民主权、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自由——的身上出现了道德义务的光环。它们被从自己的历史内容中抽象出来，并被描绘成神圣且不可动摇的事物。

发展成为民主理论的自然法告诉工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其背景、财产状况和地位；在决定人民的命运时，人人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越往后，它就越麻醉群众，使贫困、奴役和屈辱合法化；因为，既然每个人都有权发言决定人民的命运，那又怎么可以反抗奴役呢？

在现实生活条件中，在经济进程中，在社会关系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一边堆积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奢侈品，而另一边却堆满了贫穷和无望。但在国家法律的上层建筑范围里，这些巨大的矛盾都消失了；只有无形的法律阴影可以穿透那里。地主、农夫、资本家、无产者、部长和擦鞋匠——他们作为“公民”，作为‘立法者’，都是平等的。”

这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赤裸裸的讽刺吗？一个穿着运动服的人对一个带着锁链的人说，我们一起赛跑，谁快东西是谁的——还非要装出一副“大家机会平等”的样子。托洛茨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本质上是用来削弱阶级斗争、维持稳定的一种幻药。在特定时期它可以被利用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协助基层的组织，但到了无产阶级投身于建立自己的政权的那一刻，它的反动性质就完全显露了出来。这里没有“民主”，只有你们做主，或者我们做主。

这时候无产阶级不在满足于和资产阶级“平等”在政治上同桌下棋的权利。**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掀翻了棋盘，将资产阶级赶出了棋室**，正如资产阶级“玩不过”的时候用坑蒙拐骗、残酷镇压一样，无产阶级必须坚决、毫不留情面对自己的死敌。

在十月革命成功后，革命的另外一位领导人——列宁甚至还没有想到要对阶级敌人实行恐怖，他在革命后第十天的一次讲演（11月17日）中这样说道：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逮捕人。是的，我们是在逮捕人，今天我们还逮捕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不希望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逮捕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保证以后不再怠工，我们就释放你。他们都照办了。”



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列宁对只用拘留就能解决问题抱有幻想。然而在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却剥夺了一部分阶级敌人的生存自由。但这同选举权问题一样，**是在斗争过程中得到加强的**。列宁在《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革命后，“谈不到”采用恐怖手段，苏维埃政府不仅释放了克伦斯基的许多部长，甚至释放了用战争进行挑衅的克拉斯诺夫。**只是在剥削阶级展开了有系统的反抗后，苏维埃政权才开始对抗这一反抗，甚至采取恐怖手段。**因此，这种称为恐怖行为的镇压形式是暂时性的。

1920年2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宁声明，**在取得了邓尼金的决定性胜利、占领了罗斯托夫后，废除死刑。**同时，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恐怖是“协约国的恐怖手段所强加于我们的”，在刚刚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战争尚未结束时，苏维

埃政权就放弃了使用死刑，只要镇压剥削者的任务能够解决，“就不再使用任何非常手段”。他希望中央执行委员会承认上述措施，用“在俄国不准采用死刑”的方式解决镇压剥削者的问题。可见，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像红色恐怖那样的镇压形式是由于特定情况才加强了暂时的手段。

1919年的布尔什维克党纲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党纲明确指出，限制自由的这种暂时性不仅适用于限制选举权，也适用于其他专政形式：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要坚决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同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是绝对的顽固偏见进行思想斗争。同时，要明确指出，剥夺政治权利以及任何对自由的限制只有作为同剥削者维护和复辟其特权的企图进行斗争的暂时手段才是必要的。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一暂时手段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党要为减少乃至完全取消这些手段而努力。”

也必须清楚，民主该被用来促进革命，而不是限制革命在资产阶级允许范围内。我们革命者对工人阶级需要如何揭露不推翻现有制度下取得的“民主”的局限性？托洛茨基说：

“你们被哄骗到公民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虚构当中，但却已经被剥夺了行使这些权利的可能性；有条件的、幻影般的法律平等已经变成了一个思想上的苦刑犯锁链，你们每个人都把它拴在了资本的战车上。”

共产主义者绝不反对民主，不同于官僚主义者的闻听丧胆、下一秒就扣上“无政府主义”的帽子。我们追求的是实质性、彻底的工人民主。我们要的是，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

阶级社会必须诉诸恐怖维持运转。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向来是你死我活，社会的一切不幸都来源于此。共产主义者对此不只是道义上的批判，而是清楚阶级斗争的痛苦不可被调和，只能以彻底消灭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化解，这一点只有使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建立社会主义世界来实现。为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动用必要、合适的手段。**

一个屠夫向婴儿挥下屠刀时，我们会因为“反对暴力”而默许吗？这恰恰是对暴力的支持。共产主义者不渴求流血，但我们从不害怕流血；无产阶级本无意如同资产阶级对自己一样，对资产阶级用残暴的方法进行镇压，但资产阶级绝对不会在遭遇打击、信心崩塌、对革命恐惧而放弃抵抗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结束自己的压迫。“革命恐怖”的正当性就来源于此：

“战争期间，革命任务包括摧垮敌人的意志，强迫他们投降并接受胜利者的条件……只要是阶级社会，建立在根深蒂固基础上的矛盾就会进行下去，而压迫者也会持续使用必要的手段来摧垮敌方的意志……关于谁才是国家统治者的问题，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死问题，并不是由每一方参照宪法有关章节而完成的，而是要诉诸各种形式的暴力斗争……在历史中，除

了有目的、坚定有力地使用暴力外，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够摧垮敌人的阶级意志。斗争的残暴程度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状况。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的反扑越残忍、越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恐怖制度对其进行系统性的镇压。”

统治阶级最无助时，就在擂台上找出自己定下的规则和裁判指责被统治阶级犯规。历史上，被统治阶级从未因此而犹豫，而是一击重拳结束了敌人的最后挣扎。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提出了很多看似新颖的诡辩术，但就其本质思路还是一致的。比如，我们常听的“马蹄铁效应”就被自由主义者拿来宣传，左派和右派都极端、暴力，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早就揭露过这种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偏见：

“道德俗士所爱好的方法，就是把反动与革命的行为混作一谈。他在这方法上之所以成功，乃借助于形式的模拟。在他看来，沙皇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是双生子。同样，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也被发现是双生子。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其中搜集着天主教会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则从他们这一方面也恰恰应用着同样的方法，指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只是同一罪恶的各种不同的表现……

此种“近似”与类似的基本特点，即在于他们完全不管各种不同流派的基础，即它们的阶级性质，以及以此为标记的它们的客观的历史作用。他们只依照着某些外表的与次要的表现，最通常的则依照着它们对这一或那一抽象原则的关系，来估计与区分各种不同的流派……

他们之自外于伟大的历史运动，一种硬化了的保守的智力，沾沾自喜的褊狭性，以及一种最原始的政治上的怯懦。道德家们所最希望的，就是愿历史让他们抱着他们的小书，小杂志，定户，常识与道德的抄本，和平地生活着。”

革命不是“善”与“恶”的简单对峙，只有学习这样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才不会被空洞“道德”的压力所吓倒。

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

托洛茨基被无数人辱骂为“法西斯分子”。不同于辱骂者，托洛茨基从未回敬给莫斯科“你们才是真正的法西斯”打一场口水战，因为他不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一顶危言耸听的帽子，而是客观地分析了其产生背景和阶级成分与历史意义。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世界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上非常随意，到处随便地将“法西斯主义者”当作绰号或者政治咒语来嘲笑那些令他们感到厌恶的人：在1932年美国大选中，美国共产党指责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个法西斯主义候选人。大清洗中，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为法西斯分子、德国间谍。甚至就在今天，也能听到狂热的疯子咒骂我们为法西斯主义。多么荒谬绝伦！

法西斯主义的外表形式不代表它的一切。集中营、言论管制、对共产主义者的屠杀，尽管在1936年的苏联与德国都有出现，但这并不说明苏联是“法西斯主义”的。法

西斯的暴行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并非新鲜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谓“民主国家”们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谴责纳粹的反人类行为时，在各殖民地、自己国内，同样执行着最



反动的政策。有人说，英国的维多利亚是有史以来最为猖狂的毒贩和杀人犯，难道不是赤裸裸的现实吗？

我们希望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恶不是和“民主主义的善”对立的两端，而恰好和资产阶级民主制一样是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治模式，不过更加特殊，也带有迷惑的群众性。**不要将两者混为一谈，觉得法西斯主义没有危险；更不要将两者的本质过度区分，仿佛法西斯主义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路”。**当谎言不足以麻痹无产阶级、明日就面临被革命推翻的前景时，资产阶级用法西斯主义孤注一掷——哪怕这意味着疯子们可能将自己也送上断头台！这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残年面临社会主义威胁动用的极端手段。托洛茨基指出：

“法西斯的历史任务就是粉碎工人阶级，破坏其组织，以及在资本家们无法通过民主机制来进行统治的时候抑制政治自由……它首先意味着大部分的工人组织遭到摧毁、无产阶级被削弱到一盘散沙的状态，以及建立了一个深入渗透到群众中用于破坏无产阶级团结的管理制度。”

这种应急方案尽管短期内高效，但是不稳定且存在严重后果的，法西斯主义者在被交予政权后将作为新生的波拿巴不受控制，甚至可能出于政治利益将国家引入不必要的战争中……理想情况下资产阶级绝对不会愿意极右翼执政，这让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幻药被倒进了河里。托洛茨基分析道：

“（危机年代里）金融资本巨头们也无法依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来对付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采取行动将它的爪牙动员和武装起来。但是这一方式有其危险。当资产阶级利用法西斯主义时仍然会害怕它。”

一战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和战败处罚，加剧了德国战后复仇情绪，特别是长达数年的通货膨胀简直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当共产主义者无法给人民带来希望后，法西斯主义才有了成长的土壤。因此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危机时刻人们不信任旧体制”而诞生的两种选择，而是危机导致的革命遭遇挫折后，资产阶级用于粉碎革命的武器。革命年代，法西斯分子们就如同“街边一条”，不仅不被资产阶级所重视，也被无产阶级坚实地踩在脚下。革命中道崩粗而社会危机并未得到化解之时，法西斯主义就迎来了可乘之机：

“社会危机可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一般情况下，对于革命的发生，小资产阶级决定性地转向无产阶级是非常必要的。这将给无产阶级一个机会去使其自身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在挫折的打击下，小资产阶级动摇了，不是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转向最极端的帝国主义反动，在它身后还吸引了相当部分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稳定被打破；以及缺少一个被人民广泛承认为革命领袖的革命政党。如果共产党是承载了革命希望的政党，那么对于群众运动来说法西斯主义就是反革命的绝望。”

法西斯主义真正的群众基础，就是社会中摇摆的“中间者”。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

与繁荣的时代里，小资产阶级纵虽然会爆发强烈的不满，但一般来说，他们会依顺地服从资产阶级的管束。但在资本主义发生动荡而经济前景毫无出路时，小资产阶级就会奋力争取，企图将自己从旧主人和统治者的脚镣束缚中挣脱出来。他们的命运应该与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要做到这点，只需要一件事：小资产阶级必须对无产阶级能领导整个社会走向新道路要有信心。

无产阶级只能透过他们的力量、坚决的行动、对敌人的非常有技巧地进攻和他们革命政策的成功等等，来激发这个信心。如果共产主义者无法带领群众前进，那么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希特勒。人类的未来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毁灭在资本主义的野蛮中！

但如果在经历了不断的社会动荡和一次又一次失败的革命尝试后，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丧失了信心，甚至产生了敌意；同时他们讨厌资产阶级，但又想成为资产阶级。小店主、农民、中产者和最为落后的工人群众在缺乏一个坚定的左翼革命领导的环境下，很容易**被极右翼势力用民粹、煽动的方法裹挟**。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对象是小资产阶级。后者已经被大资本势力击垮了。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他们没有出路，也不知道出路是什么。他们对大资本家的不满与愤怒被法西斯主义者转移到对付工人去……法西斯主义从混乱的人们中组织起战斗队来。这样，就给小资产阶级一个幻想：让它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出现使小资产阶级如赌徒般开始疯狂下注，他们帮法西斯募集突击队，向秩序发起挑战，并疯狂镇压工人运动。希特勒毫不在意这些手段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但他不敢挑战资本主义秩序，依旧维护着他运转，这也使得克虏伯等工业巨头和金融资产阶级对希特勒颇为青睐并资助了大量政治献金，希望他能结束这场动乱、顺便也扼杀共产主义——这点显然他做到了。法西斯分子掌握政权后，第一个工作就是镇压工人阶级。第二个工作，就是背叛自己依靠起家的小资产阶级，转而投靠到大资产阶级一方去。

为了稳固资本主义体系，法西斯主义者使小资产阶级站立起来的同时，夺取政权后他们自己就与大资产阶级公开地结成盟友。希特勒上台后将小资产阶级抛掷脑后，大力扶持垄断大资产阶级，除了屠杀犹太人，其他所有对狂热小市民的承诺都没有兑现。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性只是粉碎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短期利器，在建立体系后，很快这些政党就会在官僚化的进程中转为极右翼的资产阶级波拿巴。

相比于法西斯主义的风光无限，德国共产党已是夕阳一片，由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机械分析，阻挠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联合，使得错过了击败法西斯主义最佳时机；最终1929年希特勒上台，德国无产阶级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托洛茨基用一个幽默的寓言讽刺了第三国际领导下的德国共产党的愚笨：

“有一次，一个牲口贩子赶着一些牛到屠宰场去。屠夫带着他的刀摸黑走了出来。‘让我们排列起来，用我们的角去顶那个刽子手吧！’一头牛建议说。‘如果你这么说，那么这个屠夫是否比那个用棍棒把我们驱赶到这里的贩子更坏呢？’在马努易斯基学院（共产国际）接受过他们的政策教育的牛们这么说道。‘但是我们下一步同样可以对付那个贩子啊！’‘没有用的，’坚持他们观点的牛们对那头提出建议的牛说。‘你正在试图从左边抵挡我们的敌人——你自己就是个社会的屠夫！’而后他们便拒绝了这个排列起来的提议。”

在法西斯由于自己的宗派主义和避重就轻夺权后，他们仍然没有作出任何有力的回击。相反，他们开始鼓吹“秘密行动”，要求无产阶级不做更多挑衅以“保存自身实力”。托洛茨基批判说：

“当先进的工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准备去对抗法西斯纵队时，那些号称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却拿着水管来降温。谁还能想到比这种挫折锐气和身败名裂的行为更加令人不齿的呢？……这一愿望太过天真地认为民兵武装可以从看不见的密室里建立起来。而我们需要的是几十、上百乃至上千的战士。他们只会在数百万男性和女性职工以及背后的农民群众在理解了民兵武装的必要性并将各地的志愿者的气氛调动以取得强烈同情和积极支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以民兵队伍来抵抗法西斯主义，这是武装无产阶级的第一步而非最后一步。我们的口号是：‘把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武装起来！’”

正如前文所说，法西斯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危机时刻统治阶级维系自身的不得已手段，而不是反对斯大林的人就是法西斯分子、法西斯间谍。这种诬陷手段和“列宁收了德皇五十万马克”同样恶劣。对待法西斯主义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探其根源，而不是随便扣帽子。所有严肃的革命者必须牢记这点。

反对“无产阶级波拿巴”的斗争

1936年，席卷整个苏联的肃反运动开始了，整个苏联弥漫着血腥和恐怖：曾经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被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被枪决；15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成员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枪决。两年间，苏共一半的党员被逮捕。物理意义上，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斯大林作出此类举动不是因为他嗜血或者邪恶，而是斯大林作为官僚阶层的一份子，认识到只有这样，一个脱离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才能稳固自己的统治。斯大林本人的主观意愿在这场行动中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说“斯大林是无意识的”。这是因为，官僚只能依靠自己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因为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不存在对其的忠诚与崇拜。官僚阶层必须把那些反对或怀疑自己的人赶下历史舞台。

新生的工人国家建立在一片废墟之上，极度低下的生产力使其难以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我们厌倦和部分托派一样千篇一律塑造一个神话中“健康”的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与斯大林的苏联做对比，因为我们向来清楚历史是延续的。树木一定有自己的根，

而日后官僚阶层的形成也与早日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民主建设、落实不足密切相关。革命政权面对物质和政治上的压力，迫不得已选择了向资本主义倒退，开始了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但随之带来的是富农、贪污的“公务员”和“Nepman”们的复出。

不少苏共党员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希望能团结贫农打压富农，并要率先完成工业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而此时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还在和富农处于“蜜月期”对工业化嗤之以鼻；官僚的特点就是短视性和实用性。他们显然看不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他更在意怎么对自己有益，对工人民主可谓是厌烦至极。

在新经济政策期间成为一名苏共党员无疑是赚钱的好方法，也就在这时上层的权力帝国逐渐形成，逐渐腐蚀着整个苏联，并成为波拿巴上台后的坚实力量。客观上官僚阶层的获胜有其历史优势，而主观上革命者们策略的失误和能力的不足也助长了这一进程。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左派反对派在其最初的十年斗争当中，并不采取那从党手上夺取政权的纲领，而只采取那从思想上夺取党的纲领，托洛茨基也不懂得利用先手的优势。当时的口号是：“改良，而非革命”。

然而，官僚层即在那个时候也是准备不惜以革命手段来保护自己而反对民主改革的。1927年斗争发展到异常激烈的阶段时，斯大林在某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对反对派说：“这些干部，惟有用国内战争才能撤换！”斯大林口中的恫吓，加上几次欧洲无产阶级之失败，托洛茨基等革命者最终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我们很难知道，如果列宁没有早逝，他的结局会不会如同克鲁普斯卡娅在1926年所说：

“如果伊里奇还在的话，他多半已经关在监狱内了。”

斯大林上台后虽然实现了工业迅速发展，但是扼杀了一切工人民主，官僚特权阶层也疯狂生长、掠夺社会财富，公费医疗、特权商店对它们早已不足稀奇。虽然依然保留着社会主义经济，但国家机器早就被官僚把控，工人也无权罢免他们，生产计划和生产资料这些本该由人民共同掌管，却落入了这些吸血虫手中。一国社会主义使苏联长期被资本主义封锁围攻，为了换取自己所需的资源不得与国际市场对接，也在进一步腐蚀着社会主义。托洛茨基说：

“党的民主制，仅只遗留在老一代人们的记忆和回想之中了。而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文化机关和体育机关的民主制，也都跟着消灭了。高踞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各级党部书记的无限权威。早在“极权主义”这一名辞从德国输入的几年之前，苏联的政制就已经是这种制度了。”

托洛茨基将此时的苏联称为“无产阶级波拿巴”政权（顾名思义取自拿破仑的姓氏），认为这时候，**革命周期性的倒退使得尽管经济基础上革命的诸多遗产得以保留，但**

政治上国家又倒退回最原始、残暴的形式。一个客观上捍卫工人国家革命成果、主观上一日复一日地对其破坏、日益高于全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器和所谓“仲裁者”成为了社会的主导者。托洛茨基分析：

“过去历史上每一个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些反动或反革命，从未曾把整个民族完全推回革命的起点去，但往往夺走了人民所得的大部份胜利品。”

这里必须警惕轻浮地断言，缺乏了工人民主的苏联一日之间就变成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直接成了“法西斯主义”这样和工人国家没有关系的反革命政权。托洛茨基认为，坚决不能把“马列分析替换为气咻咻的埋怨之声”：

“尽管存在巨大的官僚蜕变，苏维埃国家仍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工具。它确保了生产资料国有基础上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就为劳动群众的真正解放——通过清除独断官僚层与社会不平等——准备了条件。”

换言之，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官僚层压制，却仍然在根基上“领导”着国家。那能否把官僚层的独裁称作无产阶级专政？字面意义上说工人阶级被官僚层“专政”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必须摆脱术语的文字游戏，“专政”一词既有较窄的政治意义，也可表达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谈论‘墨索里尼的专政’，同时定义法西斯主义‘仅是金融资本的专政工具’。哪个说法对呢？从不同的层面讲，都对。毋庸置疑，执行权力由墨索里尼抓在手中；同样毋庸置疑，官府活动的全部内涵以金融资本的利益为坐标。阶级的社会统治具有极不相同的形式。”

斯大林中央的领导，简直没法让人联想起初期的工人政权。然而，一种体制并非立即取代另一种体制，而以数种手法完成，免不了——专断官僚打击工人先锋的——几场小内战。从历史总结的角度说，苏维埃民主被积聚难解的社会矛盾炸成了齑粉。利用既有矛盾，官僚们剥夺了各群众组织的权力。这层意义上，大可谈论‘官僚专政’乃至斯大林的个人专政。这一篡权行为的发生与站稳脚跟，仅由于官僚专断的社会内涵受工人革命奠定的诸生产关系所制约。这层意义上，大可判断官僚专断的外表下，无产阶级专政得到歪曲但确实的表达。”

斯大林的胜利和革命的被背叛在这里不是宫斗的闹剧，而是反应了极端压力下工人国家经济、阶级关系和心理上不可避免的倒退：

“第一个反动浪潮的牺牲者，照例是那些先锋份子、创始人和发动者，他们在革命进攻时期，都是站在群众的前列。他们去了之后，第二线的人物就同以前的革命的敌人联盟而崭露头角。领袖们这种戏剧式的斗争是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的，但下面隐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还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最近还是革命的群众深刻的心理变化。”

波拿巴就在革命阶级失望、迷茫，而反革命阶层摇摆、脆弱之时，替代了统治阶级实行了政治的垄断。这个政权把自己包装为“全社会”的救星，事实上，只是一个对全

社会“平等”剥削的特权阶层。它不存在自己的独立历史地位，只是在不断地横跳，以平衡社会矛盾：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两个阵营激烈的斗争把国家权力抬高到超出全民以上，表面上并且保证国家完全对阶级独立起来——其实只给予国家以保护特权者利益之必需的自由而已。斯大林政制，凌驾于政治上原子化的社会之上，以警察和军官集团作靠山，不容许任何监督——这显然是拿破仑主义的一个变种，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一种新型的拿破仑主义。”

那这种政权最终的结局将会是什么呢？托洛茨基预测，如果任由官僚侵蚀工人国家，苏联早晚走向灭亡，官僚为了维护自身特权甚至不惜向资本主义倒退，惟有工人将这些寄生虫彻底清洗掉，使自己成为社会的主人，才能解决：

“波拿巴制度与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矛盾，是国内危机的最大来源，也代表着对工人国家的生存威胁……专政的波拿巴蜕变，对工人革命的全部社会成就构成直接威胁……专权制度的必然覆灭导致工人民主的复兴需要一个前提：现制度的垮台是无产先锋自觉行动的结果。否则，取代斯大林制度的可能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制度。”

任由官僚吞食工人国家，还是工人阶级将官僚肃清？

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是苏联解体都做出了回答。时至今日，对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建设一个工人民主的社会有着警示作用。工人国家的机关，是该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社会的仆人”，还是变成高高在上的“社会的主人”？《动物庄园》的猪，是四只脚，还是两只脚？

结语

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贡献还远不止于此。文化的阶级性和共产党对文化的政策、帝国主义战争中工人阶级的立场、革命者做群众工作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等讨论出于篇幅原因，我们将留到日后解释。

我们十分清楚今日这篇文章发出，会让部分宗派主义思维比较固执的同志感到些许不爽；尽管我们自始至终都坚持表里如一的立场，还是有同志会觉得十分不适应。我们曾收到过这样的来信，有同志“警告”我们：

“如果你们想要团结所有左派，你们必须把斯大林和官僚集团分开，并且斯大林不能是叛徒或者是修正主义分子，因为毛泽东已经给斯大林下过结论了（？）……这样（我们不说假话的话）首先斯派就会和你们搞分裂……也不会认同，这样你们怎么搞团结？还是这些人在你们眼里是没必要团结的？”

在这里我们想要公开回答这位、这类同志的是，是的，那种人在我们眼里没有必要“团

结”。**反对宗派主义不是和宗派主义的山头们称兄道弟。**革命的建设过程中，对劣质的不断筛选和淘汰，是不好看但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这种党建的机会主义思维是走不长久的。托洛茨基曾经在和列宁因组织问题敌视的时候，也不得不对《火星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进行称赞：

“《火星报》时期是施加影响的斗争时期。《火星报》曾宣称：‘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线’。它确实划清了界线。《火星报》的使命是（手持马克思主义学说明晃晃的利刃）留住民主派知识分子中一切尚未完全隔绝于‘第四等级之思想’的成分，并且它实际上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的意图相当明了，我们不会因为有些人不爱听什么就不指明正确的事情。因为，这种人即使主观上想要进行团结，客观上与其的分道扬镳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呼吁的是严肃、有自己思想的革命者，与我们一同组织起来。

托洛茨基的局限性和他的落幕以及第四国际维和碌碌无为，也非常值得研究。早期托洛茨基和列宁关于组织方法的争论，至今仍然以变种的形式在我们的队伍中体现着。在最后，我们以托洛茨基自传里对自己的评价结束这篇文章：

“我一生的外在经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单调乏味的。相反，就转折、意外、尖锐的冲突、起落沉浮的次数之多，我的生平毋宁说是充满了“奇遇”的。同时我要说一句，就天性来说，我与那些探险求奇者毫无共同之处。从习惯来看，我毋宁说是一个有几分迂腐、保守的人。我喜欢纪律和制度，这不是为耸人听闻，而是出于实事求是。”

我在生活中曾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感觉，即革命妨碍了我系统地工作，我近30年的自觉生活完全被革命斗争所占据，尽管如此，如果我能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踏上同一条道路。”

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 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历史

任何政党想要以健康的形式成长并长期存在，都需要其赖以生存的、持之以恒的阶级立场，以及能够以这个阶级立场为基础构成其坚定、无可动摇的支持者群体。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其政治主张无法取得它代表的阶级的支持，其支持者无法团结、精神涣散的情况下保持组织建设与政治强大。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其土地政策，将中国广袤农村中数以亿计的贫农整合为其拥护者，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其基层组织动员工人阶级，加以内战时团结国民党腐败的独裁统治下与国府离心离德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集团，才最终得以完成 1949 年的中国革命，建立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首个工农联合政权。这一政权完成了驱逐帝国主义的经济蚕食对中国的政治操纵，结束了长达千年的中国旧社会时期土地与社会秩序，在一切层面上都实现了真正的进步和瞩目的成就。

然而，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官僚领导下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失去了其曾经赖以建国、执政的国家体制。在毛泽东时期，虽然中共党内存在严重的官僚化问题，国家也没有完成工人民主制度的建设，但是许多抱有美好的社会主义愿景的党员与国家领导人仍不断尝试从这个体制内部进行改革，对抗官僚和资本主义卷土重来的危机，并维持着工人阶级作为在经济与物质基础上的统治阶级。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共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缺乏全国性政治纲领、缺乏先锋党的组织基础的群众运动。文革中部分群众运动的独立性被迅速击垮，并转而为官僚利用为民粹主义的政治机器，使得这场运动没能建立起工人民主制度，而政权存在的足以让其崩溃的矛盾仍然没有解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官僚集团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资本主义重建的进程，试图通过这个方法解决矛盾并维持自己的统治。

由于国家的统治阶级发生重大变化，中共治下的党权与资产阶级政府的行政权也随之转向，二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中共从一个虽然官僚化，但是仍通过其施政方针维持强大基层动员与控制能力的政党，逐渐蜕变为一个腐化、保守、政策处处充满实用主义思想的威权主义执政党。这一转变是中共阶级立场重大转变的必然结果，由于

官僚集团作为独立于生产者的特殊阶层，其决策过程受制于科层制的信息传递层级，导致经济信号在纵向传递中产生严重滞后与失真。由于缺乏来自生产单位与消费领域的即时反馈，中央计划无法动态反映社会真实需求与资源分布，最终形成计划指标与实际经济活动的系统性偏差。

这种权力垄断必然引发双重矛盾：一方面，计划制定者试图通过行政指令消除市场波动，却因信息盲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为维系自身管理合法性，被迫引入利润、成本核算等异质于计划逻辑的评价标准。这种矛盾本质上是权力结构异化的产物——当经济管理权脱离直接生产者，计划就退化为封闭的行政命令体系，其自我纠错能力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而持续弱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实现工人民主制度，而这恰恰是官僚集团不愿意看到的——这意味着官僚统治的终结）。

此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国际分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导致工人国家必须与外国贸易才能正常发展生产力，而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也就是说，工人国家必然要进行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不仅为获取外汇技术，更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与资本竞争压力构成外部强制力，迫使工人国家必须调整生产结构以换取外汇和技术，此过程必然强化商品货币关系对国内经济的渗透。同时帝国主义军事威胁迫使资源向国防倾斜，挤压民生投资空间。

最终官僚只能求助于资本主义下的利润指标来完善经济，从而逐渐放弃指令性计划经济并转向私有制。因此，官僚必然在最终决心重建资本主义，并迫使工人阶级丧失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再一次产生和壮大与资产阶级官僚的上台令所谓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转向全社会劳苦大众利益的对立面，而使中共不得不加速朝着更加保守、充满剥削的方向疾驰——中国共产党不断蜕化，成为了一个由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官僚拥趸掌控的资产阶级波拿巴组织。中共先前立足于让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之上，为党内政治矛盾所限制的残缺体制，逐渐转变为依托自身政治权力，试图平衡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并以“仲裁者身份”试图维护体制稳定与官僚集团存续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体制。由于这一所谓的裁决者身份完全来自资本主义之中的阶级矛盾与冲突，其必然转而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与剥削的存续。

这一变化终结了中共在执政前四十年中建立的，以宪法所规定的唯一合法执政党领导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体，以党干部与地方官僚为政治主体统合群众的地方执政模式，逼迫其在诸多领域不断改变策略。中国共产党自1980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及其现状同它的老对手，在于1950年代大陆地区的国共内战基本结束后走向彻底失败、崩溃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愈来愈相似。然而，中国共产党坐拥中国土地上所拥有的先进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这一现状导致其必然不会像以买办金融资本的阶级利益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一般固步自封、腐败颓废，自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先后成为了全球其他资产阶级的“现代奴隶产地”、“盟友”与“头号竞争对手”。

中共，正如世界上任何有组织的政党一样，其行为都符合物质现实变化所引发的连锁反应，随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草创到繁荣再到追求争霸、位居世界之巅，中共在过去四十年不断变化、顺应其经济基础，面对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压力，其必将因为资本主义的重建而走向任何新型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内部矛盾都必然走上的道路——帝国主义。

我们力求通过分析中共的党史与中国的经济史，系统性阐述中共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与政治政策和现状，并确立一个一切共产主义者都应当了解的事实——帝国主义全球争霸时代必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无法缓解时再次到来，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和平的手段。从“改革开放”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共顺应着这样的历史潮流，慢慢走入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深渊。

党权与党争——毛泽东时期的中共建制

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的毛泽东时期，中共的党权不仅相对独立完整，而且在高层架构中明确区分了党机关与国家行政机构。这种布局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立足于工人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物质基础之上，**作为具有超然地位的执政党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而不必直接介入如政府办公，审查核算，政策打磨与具体执行办法等**由如“人民政府”或“某某部门”等“行政机关”，而非“某某地方党委”这些“党的政治机关”处理的日常事务——与今时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党委与地方政府机关基本分开，并不使用同一套官僚干部班子。在这一阶段，党的政务官指导和监督政府中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而不进行关键方针与政策决策的事务官；党的政治干部确保政策的执行和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贯彻都能基本依照党中央的决策执行。具体到现实之中，则体现为党权与党的政治方针和讨论同日常的行政工作基本分离，方针性与导向性的文件与指导皆由省级与北京中央党组织发布，而市、县、乡、镇等各地方党支部依照这些政治方针，指导当地政府与合作社、公社组织出台、实施具体执行办法。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央高层能够对绝大多数问题发号施令，掌握绝对权力的同时，中共省级以下的各地方党组织又能够以超然地位对行政工作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

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地区的中共党组与党委，同今日中共党政完全一体、党组织溶解于行政机关与行政工作的状态完全不同：如1960年代的北京市政府，各部门设立专门的北京市党委驻外党组，这些党组几乎从不参与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而是负责监督和制定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方针，并以类似督查的模式确保政府行政操作符合党的政治总纲。因此，这一时期的城市党组织仍然保持高度的政治独立

性，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们完全明白一个应当立足于政治领导地位的共产党溶于日常事务对其党权独立性的危害**——即党的政治独立性与超然地位必将为日产的冗杂工作与官僚化的办公内容所僭越、空心化；因此，北京的**党中央多以行政工作是否贯彻中共高层的“总体路线方针”为核心关切，而尽可能避免直接通过党组织干涉政府的事务执行。**

而在这一时期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农村地区，中共成功利用1954年起直至1960年代中后期持续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农业集体化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关键土地政策，**将农村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以党干部为领导核心的地方单位中。**通过消除落后的农村土地关系以及国民党执政时期农村宗族势力与资产阶级行政官僚一手遮天的政治现实，中共成功将地方党委与政务官树立为社会治理与政策制定的核心：在土地改革中，约有300万地主被剥夺土地，而超过一亿的农民受益于土地的重新分配，完全打破了传统地主阶级对农村的控制；而在随后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约97%的中国农民加入中共领导下的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公社作为农村治理的基本单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担任了基层政府机关的职能。而随着先后发动的各类政治运动以及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中共成功为农村生产和行政性工作集中了大量的劳工与知识分子，将近1700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推动农村教育和卫生等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中共具有绝对控制的农村无产阶级力量；至1960年代末，中国98%的村庄设有组织工作清晰、完全受各县、乡、镇中共党委领导的农村党支部，动员农村人口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具体的生产活动与基层治理。通过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加强基层组织工作，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在毛泽东时代就从根本上消灭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巩固了其执政建制对于中国乡村的基层控制。

然而，**正是由于这样的党政模式，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可以十分轻易地外溢到地方，**这一传统甚至直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和各大“地方局”取消建制、各个“地方派”论功行赏的时期。在这一体系下，各地党委由一位书记所总领，而这位政工干部往往隶属于某一党内派系。以此为基础，此时的**中国政治体系内飞速建立起了若干个巨大的官僚化的政工干部所形成的权力网络，并以此为基础阻挠任何工人阶级寻求民主的诉求。**同时，由于中共内部有许多政工干部没有接触过系统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的政治认识仍然受到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的清朝时期与中华民国时期行政方法的影响，其往往轻易导向官僚主义的执政方针，并同先前的地方官僚实力派合流，形成一股中共内部反对工人民主制度化的力量。尽管许多中共领导人曾经试过以政治运动和党内整风的方法处理党官僚不断堕落的趋势，但是官僚阶层结构化以后内生性的保护主义阻止了任何以城镇行政中心为基础的、自上而下地从官僚阶层内部进行改革的尝试；而由于此时的中共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力极大，其也没有能力将全部精力运用到党内的政治斗争和反对官僚的问题上。因此，中共执政体系的内生性危机便一拖再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推翻。

历史的十字路口

随着中共地方官僚主义派系在原本的政治基础上掌控中共中央，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共内部坚持旧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立场的党员失势，**实用主义官僚集团的上台导致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扑灭地方干部与普通党员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党的实用主义化以及党本身的行政官僚化（即由党员愈来愈多地直接担任地方政府与行政单位部门官僚等措施作为起始，至今持续数十年）进而令先前的党政体制不再可行；随着一个**完全放弃了任何“意识形态原则”、秉持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上台，他们急切地希望同在当时已日益僵化的所谓“苏联模式”（这一所谓模式的僵化问题实际上全部来自于同一群官僚自身忽视工人阶级需求、镇压其民主诉求所导致的）做出切割，并通过资本主义化政策为自身牟取现实的物质利益，希冀以放弃社会主义为筹码争取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冷战与国际贸易中对华缓和，为自己所掌管的、因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而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续命。



在此基础上，中共急于转变其地方控制模式以巩固新党国体制下的乡镇基层掌控力。随着工人国家时期大规模工业化积累与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中共地方组织的任务从动员工人阶级参与建设变化为安抚民众，重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与“增强经济效益”**，中共的角色逐渐从一个主要依靠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完全依赖经济发展与执政稳定性维系权利的纯粹技术官僚组织，在政治定义上更像是政府机关附属的人员选拔机构。1980年代起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开始，不断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内部裂痕不断扩大，进而不断堕入新的危机。

在经济与社会层面上，中共在自 1980 年代资本主义重建后的数十年内不断遭遇挑战。在准备结束计划经济的 1982 年，中国的城、镇、乡地区共有超过一亿五千万工人从事有组织的社会化劳动，这其中，有超过八成的一亿两千万人属产业工人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蓝领工人”，占全国人口近八分之一，该年工业产值占中国全国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些工业产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能够保证相差不大的人均工业产品消耗，并且基本无法产生较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主要指产能过剩，由于缺乏工人民主，官僚指导下的计划经济经常出现产能分配不均导致的局部性产品过剩与产品短缺，但是一些工业品的生产计划问题并不会影响总体分配的相对公平）。

施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首要条件是通过产能过剩与剩余价值剥削下的分配不均创造一个令资产阶级受益的资本主义市场，并以资产阶级为基础不断巩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这一体系所需求的根本经济基础就是廉价劳动力与失业者后备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官僚首先从庞大的中国第一产业开始，通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与所谓的“国企改革”**，令大量传统产业工人失业、下岗，产业工人数量从 1982 年的近九千万在十五年内锐减至 1997 年前后的约四千五百万。随着产业工人的大规模失业，中国国内同时出现了工业产品价格的飞升与劳动力价值和劳工收入的暴跌：以 1982 年为基准指数 100，工业产品平均价格至 1997 年已经上升至 240，而劳动力工资指数则呈下降趋势，降至 70 左右（这还是在考察货币购买力变化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购买力平价后的实际的工资指数应降至 30 左右），二者走势出现明显背离。这种背离正是由于在大规模国企改革和私有化过程中，产业工人大量失业导致劳动力供过于求，初步私有化的前国企为了弥补产能降低而推高产品价格的直接反映。这一物质基础直接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工业品价格相对高昂的市场。

计划经济崩溃所直接导致的就是党独立于行政机关这一政治状态的终结。与毛泽东时期拥有超然地位，政治性领导一切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的是，在投身于威权资本主义的党内官僚领下，党的任务从探寻**“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框架下建设国家”**变成了**“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本主义体制，来者不拒地运用政策发展经济”**。随着以上述的稀缺性为基础的中国资本主义市场在中央官僚的政策牵头下基本成型，资本主义体制的实用主义逻辑占据上风，中共不再需要维持一种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总路线、总方针，也不需要各个地方行政机关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于是，党官僚与政府行政官员的界限基本模糊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共所依仗的统治阶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党委、各企业与经济部门党支部不再是政治中心或者“政治总纲”，而变为由行政官僚兼任的党干部职位以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的繁荣并介入国企改革、加速私有化进程。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许多所谓的“党干部”与“党组成员”的帽子都戴在了那些行政官员的头上，他们用着中共党官僚的头衔领导一系列政府工作，如地方国有企业的私

有化改组，对外贸易的招商引资，1980年代末至将1990年代初的诸多国家和地方项目等等；在一些人的眼中，中共好似从一个伟大领袖、光辉政客的政党变为了一个“务实干部”、“青天大老爷”的俱乐部。原本占据重要领导地位的各级党委“一把手”（党委书记、党组书记等）却被中共高层要求“不再担任地方政府的行政一把手”，地方党支部与独立于政府的党员也被要求“不要干涉地方人民政府的日常行政工作”。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邓小平时代后期以及江泽民时代尝试进行所谓“党政分开”工作，实则是争取**彻底取缔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所拥有的独立政治意义和政治纲领，通过彻底弱化党官僚的独立存在以完整中共体制的彻底国家化并将中共深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治理单位化为中国国家政府的一部分，争取将中共的党组织虚级化，变为一个完全让位于中国政府和资本主义体制，为其提供单纯的政治合理合法性的橡皮图章。**

只有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重建才能在资本主义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旗帜下，摆脱毛时代党组织剩余的最后幻影阻挠资产阶级官僚彻底拥抱其反动、反工人阶级利益的目的、残留至今的桎梏（无论是的社会主义外衣，还是党先前深入基层群众，以基层无产阶级党员作为主体的组织策略），开足马力为资本主义繁荣这一目的服务。对于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而言，最好的情况莫过于中国政府一直由一群“名义上的中共党员”所运作，把中共的一切机关弱化为一种仪式性的、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任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单位，并通过文官政府与各路资产阶级的直接合作达成他们理想中的“波拿巴主义”政权。

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与“中国政府”这两种术语几乎可以混用，而这在毛泽东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决策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果，更是低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于一个稍显弱势的国家与政党所能展现出的最大的恶意。由于资产阶级对于各级立法机关、地方政府等资本主义制度下代表其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国家机器先天具有极其强大的影响能力，中共中央领导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若是失去了一个强大、具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某种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的一切政治地位都将迅速被资产阶级扫尽历史的垃圾堆，而这样的政治现实也将在十几年后彻底扭转先前的“既定方针”。

筑起“世界工厂”

既然中共的新官僚们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纳上如此丰厚的一份见面礼，以美国金融资本为首的全球垄断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寡头自然也投桃报李，于改革开放后开足马力在华投资，将中国建设成为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现代雇佣奴隶制国家”——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一小册子中所论断的，发展到顶点的资本主义国家会通过金融垄断的方式，将本土的工业与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地转移到工业基础较差、现代化产业刚刚起步的国家，以此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牟利与安抚

国内工人，通过本土去工业化的方式尽可能削弱最具有组织能力和革命性的产业工人的阶级力量——**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所扮演的角色就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国家所属“殖民地”的地位**（这只是一种类比，而非对其的定性）；只不过，由于全球的金融资本已经在上个世纪将全世界几乎每一份土地与每一个国家的财产瓜分殆尽，中国这最后一片劳动力极为丰富、工业品需求量极大、其官僚竭力谄媚国际金融资本，调节本国汇率以迎合外国资本的投资和商品进口需求的国家就成了**全球资产阶级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也正是因此，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成了中共官僚的“黄金十年”，随着中共着手于完善资本主义市场建设，吸引大量外国投资涌入，中国政府得以缓解极高失业率带来的政局不稳，并着手从1980年代末持续至1990年代末全国工人运动的余波中复苏。**中共成为了“世界工厂”当之无愧的“厂长”，代替全球的所有帝国主义“股东”们牢牢锁住工厂里的每一名工人。**



但是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在此过程中**仍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非“新殖民地”。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制造业时，中方通过强制性技术转让条款和合资企业股权比例限制，确保技术溢出效应。世界银行2008年报告指出，中国汽车产业要求外资合资比例不超过50%，且中方保留品牌所有权（如大众-上汽模式），使中国在2005年后逐步掌握整车平台研发能力，催生奇瑞、吉利等自主品牌。这与拉美国家被动接受外资控股、丧失技术升级路径的模式（如墨西哥汽车业）形成本质差异。

另外，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2006 年研究，中国电子产业虽依赖外资代工（如富士康），但通过本土供应链集群化实现逆向创新：深圳华强北在 2003 年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的手机零部件生态系统，本土企业占据 PCB 板、电池等中游环节 70% 份额，为华为、小米的自主品牌崛起奠定基础。反观“殖民地经济”，本土企业仅能从事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

中国始终将外资创造的贸易盈余转化为自主产业链建设。2001-2010 年，中国累计投入 4.3 万亿元建设港口、电网和高速铁路（世界银行数据），其中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的 30 万吨级船坞（2008 年竣工）使中国造船业从散货船向 LNG 运输船等高附加值船型升级。2010 年中国造船完工量达 6560 万载重吨，超越韩国居全球第一。在通信领域，中国推动 TD-SCDMA 成为 3G 国际标准（2000 年），迫使诺基亚、爱立信等外企适配该标准。此外，亚洲开发银行 2010 年研究显示，中国在 2010 年前，就在东亚产业链中从“加工终端”升级为“集成中心”：2005-2010 年，中国从东盟进口集成电路增长 320%，加工后出口欧美，掌控设计、物流等高附加值环节。同期越南对华出口中 78% 为中间品，用于中国整车 / 整机装配，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嵌套式分工”。可见，**作为“世界市场”的中国，是全球化分工中的阶段性角色（代工），而非结构性依附。**

1994 年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制度逐渐转变为分税制开始实施的重要年份，标志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为了刺激资本主义化进程的前中期发展，通过将土地资源管理和以劳动力密集为特征的基础设施投资等财政权下放地方的方式，中央政府成功刺激了各省级行政单位在物质利益刺激下大规模发展资本主义市场、**通过土地的迅速私有化与此后持续超过二十年的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扩张为起点建设了一个极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

然而，财权下放的同时也导致事权的下放，虽然这一时期的分税制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极为混乱的财政包干制度——这是一种近似于“财税联邦制度”的央地财政关系，各地的税收上交部分多以固定收入部分的固定份额为主，导致地方政府尽全力通过各种手段将收入从政府财税收入部分以私有化、社会募捐、特别基金的形式从应缴税账目上划去——通过 1994 年开始施行的分税制，中央虽然收回了部分对各地政府的财政控制权，确保了中央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但由于各级政府获得了除特定固定税种、增值税和其他几类消费税种外绝大多数财政收入的自助支配权，其不再需要像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前中期一般以花样繁杂、巧立名目的方式扩大财政收入，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发展本地经济而不必担心收入会流入国库、无法投资于本地并成为本地官员的实际“政绩”。

通过将国税与地税区分并将绝大多数土地税收转入地方政府应用于本地财政预算的收入，辅以国有土地管理和经营权基本下放至各地方政府的措施，地方政府得以将全部

土地增值带来的收入投入扩大再生产，这些政策与上一章所提到的广泛存在的工业品与传统产业供不应求与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产生了连锁反应：由于任何外国投资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金融业繁荣的期冀都有赖于高速城市化与对良好基建的极高需求，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成为全国各地所有政府机关“淘金”的行业，官员们疯狂地招商引资、鼓动政府内具有“良好商业能力的人才”“下海经商”，以期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资本来华，以全球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合作共赢的方式帮助他们稳固国内经济、并以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回击中国国内以工人阶级动员为主的一切反对力量。

在这些极其有利于外资进入中国的条件加持下，加以此时的中国如上文所述，是**全世界资本主义投资目的地的最后一片“完美净土”**，全球几乎每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每一个产业之中**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发达的一群企业代表都疯狂地在中国开拓业务，期待分得一杯羹**。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外国资本对华年均投资额从九十年代末的三亿美元左右暴增至2012年前后的一百亿美元，且在此后长期维持在一百亿美元以上。由于外国投资伴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技术的应用（如高端装备制造、金融、信息技术及服务业）导致平均工业品价格指数相较于1982年的基准值100继续飙升，达到了2012年的约280。这一现象被2008年金融危机后胡锦涛与温家宝政府实施的四万亿元救济计划在经资本市场杠杆作用派生出的该年度新增约四十万亿以上现金流进一步刺激，形成了二十一世纪最初**中国市场经济极度繁荣、经济极度过热的所谓“改革开放黄金十年”**。

由于各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与生产率提升，**传统的制造业产业工人逐年递减，以从事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蓝领工人和全体工薪阶层的数量却仍逐年增加**，蓝领工人人口更是在2012年达到了超过三亿——这是由于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线引入国内所创造的新型需求所导致的，以个人消费品、第三产业等新型需求产业为主。然而，蓝领工人的购买力平价工资指数（仍以1982年的基准指数100为基期）却在这一年降低到了不到40，而全体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平价工资指数也减少到约60（以1982年为基期）。

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随着依赖生产过剩与不均衡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代替指令性计划经济，工人阶级生产的工业品从通过平均分配的方式满足绝大多数人基本一致的工业品需求和消耗转变为在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剥削体系下展现出远远虚高于其实际生产价值的交易价**：随着全球人口在新世纪继续爆增，以欧陆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愈加旺盛，而他们同中国官僚的政治联盟愈发猖狂，人民币同美元的实际兑换汇率从1982年的约2:1暴跌至2012年的约6:1，这一令人诧异的数字变化充分暴露了全球资产阶级伙同中共官僚以操纵汇率的方式剥削广大中国劳动人民所拥有的、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的每一分血汗钱，并将这一过程中获取的巨额利润全部转嫁到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头上了。

这一所谓的“黄金年代”的幌子更是**中共不断分化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巨大谎言**。中国政府通过**利用市场繁荣带来的金融机构扩张需求壮大小资产阶级和生活更加富足的工人阶级人口**（即“工人贵族”，其“富足”主要体现在工资高、工作环境较好，甚至工作时长会比其他工人都少些），并通过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确保一群绝对拥护中共官僚机关的“中间阶层”群体（即资产阶级学者常说的所谓“中产阶级”，不过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同上述所说的一般，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的人口构成）。仍以1982年为基准指数100，中间阶层群体（包含收入较高的专业人员、企业中层管理人员、高技能工程师、高校和各类研究所科研人员与教授等知识分子，等诸多类别，涵盖工薪阶层中生活水平较优渥的工人阶级，从事小规模商业经营、零售、个体服务等经营活动的小资产阶级，以及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行业内从事非柜台等服务性工作的脑力劳动类金融从业者，包括没有实际产权的基金经理、信托管理人员等）的收入指数在1980年代和1990这一经济动荡、社会不稳，工人阶级收入同比下跌超百分之五十的时期仅下降不到百分之三十。

在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国政府这一阶段鼓励“高知工人”与“前国企、政府职员”“下海”及“青年金融人才”的政策，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应届大学生、前普通工人阶级纷纷选择加入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时的对资本主义市场极为重要的诸多金融机构（这一时期金融机构从业者由于资本市场起步导致的较高生活水平也是一大关键原因，1999年金融业从业者人均收入较同期的熟练产业工人人均收入高约百分之三十），如保险业、银行业、各国家交易所等，以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所有者为主的城镇小资产阶级人口在1990年代末较增长到超过一千四百万，较1982年增长约百分之八十到一百，而前述的脑力劳动类金融行业从业者人口则在1990年代末骤增至约三百万，较1982年（1980年代前中期，绝大多数金融从业者都集中在国有的四大银行系统，仍属普通工人，而到了1997年则已经有约百分之二十供职于私有的新型金融企业）的七十万左右有约百分之四百的令人震惊的增长率，到了2010年左右，狭义的脑力劳动类金融从业者已经超过四百五十万。

在包括上述所有中间阶层的工薪阶级与自雇类个体户的统计中，大部分中间阶层人口的购买力平价收入指数较1982年的基期仍有减少，只不过同产业工人骇人听闻的截止至2024年约20的指数相比，绝大多数中间阶层仍然能维持约75-80的指数，而金融业从业者的收入指数更是在2019年前后回升到了约100左右。截止至2024年九月，在中共大力鼓励金融业和个体创业者的政策推动下，城镇个体户、金融业从业者、自雇人员等群体所组成的中间阶层占总就业人口超百分之十五，具有一定的人口数量与类似的阶级利益。

由于上述中间阶层相对于其他工人阶级更为富足的物质条件完全来自改革开放后较为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激发的城镇和金融、贸易等资本主义市场下的媒介型基础产业繁

荣，他们的阶级利益极度仰仗中共镇压工人运动并“维护社会稳定”。中间阶层在这十年中的极速扩张与这一集团在各类社会群体，尤其是媒体产业中的大量存在，也创造了所谓“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显著提升”的谎言，事实上仅仅是一小部分掌控公共知识与发声渠道的中间阶层生活的相对生活质量显著改善的假象，与之相对的是工人阶级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这十年中，如上文统计数据所展现的那般，所受的无尽剥削与压迫。

“世界工厂” 牢头的抉择

工人阶级迎来了十年苦难，而试图将中共在消除其阶级意识与党的政治独立性后让位于行政机关和官僚科层制的进程也同样迎来了彻底的失败。由于中国当今政府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经济建设和民生发展（尤其是对上述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扶持）的成功，也同样来自中国解放战争以及革命建设时代遗留下、得以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的巨大威望——这一威望完全归功于广大工人阶级党员与群众的政治与经济参与。

显然在基层群众的心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绝对无法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赋权的。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愈加猖狂的资本主义市场剥削、压迫下（先前触目惊心的数据已然证明了这点），一个缺少健全基层党组织的中国政府更没有能力在缺少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光环”庇护后，依靠官僚机构与隶属于新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如二十一世纪大量涌现的企业商会，各地方私企的行会等）完成对地方群众与乡镇地区的政治统合，尤其是在这些资产阶级团体已经发展出自立意愿，经常性同外国资产阶级沆瀣一气，利用一部分追求更多民主与个人权利的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动员与罢工等事件要挟中共向资产阶级与自由主义者“放权”。

2012年前的中央与各地人民代表大会与今日不同，其仍然能够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国土地上有巨大缺陷的资产阶级立法工具，通过发表公开言论、各类议案、进行对政府机关的监督与调查等手段动员群众力量对中共构成一定压力，中共在此时为了安抚外国资本和同国际资本合作所必必要的本国资产阶级仍未完全掌控全国各立法机关；以许志永事件为例的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后期爆发的诸多事件都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民主化诉求和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被国内资产阶级通过人大、政协或是境外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污名化为“反共反华”运动并试图以此向中共施压，要求其交出更多权力的方法。**对于新产生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而言，中共的机关就是一个“尾大不掉”的无用机构，一个所谓“完美”的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并不需要它，而是希望借用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机关”，彻底瓜分中国的一切经济利益并防止一个对全社会一切方面有着强大渗透能力的中国共产党掣肘他们的食利——毕竟，这样庞大的统一国家、统一政府和统一政党可是随时拥有撕破同国际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一切联盟并寻求争霸的能力。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由于工人阶级的动员还不够强大、小资产阶级提出的政治纲领还没有触及中共中高层官僚们作为一个管理全国的“高干特权集团”存在的根基，中共中央的领导们还能容忍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融入全球资**

本主义潮流而带来的工人阶级动员扩大与资产阶级力量壮大。

然而，随着国内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其愈发猖狂，甚至有妄图干政的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愈发明显地期望通过国际金融资本势力颠覆中国共产党党员操办下的国家秩序、肢解或半肢解统一的中国国家官僚机器以增强欧陆和英美资本对华经济剥削的力度，而工人阶级又随着经济剥削的愈演愈烈加大了动员力度，中共各级机关在2010年后都逐渐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惧——中共与中国政府高层官僚自从重建资本主义制度以来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稳固自身的利益，并确保“中国政府”这一大集体下每一个官员能够永远以“世界工厂代理人”或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好伙伴”的身份永持权柄：然而资本主义化措施导致的二三线城市没落和资产阶级实力壮大已经令许多地方党官僚丧失许多特权与许多利益，并正将矛头指向中央；北京的官僚们惧怕资产阶级有朝一日当真和“境外势力勾结”，从他们手中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政治权力；他们同样惧怕那来自中国工人对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滔天的怒火喷涌而出，吞噬他们自1982年以来努力打造的一切供自己坐稳位置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党机关内部的政治矛盾和危机首当其冲。中共在改革开放前的以地方党干部为核心的执政传统以及数十年的宣传令中共党内仍留下一大批政治上虽然极度懒

散，完全不愿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党的机构强烈守旧、坚定捍卫自身政治利益的所谓“老干部”——这些官僚往往存在于并未受益于改革开放，而是沦为输血机与劳动力储备区的各省份，尤其是因改革开放初期因廉价劳动力需求而被迫去工业化、摧毁经济基础的东三省，以及结束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后依赖沿海地区经济支持、经济迅速衰退而导致大规模人口和就业岗位流失的山河四省、华中南地区等——由于改革开放后北京的中央政府长期施行经济发展优先、政绩评估与升迁同经济挂钩的方针，尽管这些地区的官员能够因广泛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债务扩张而发展本省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招商引资与扩大债务的方式创造经济增速，但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数字显然在华东、华南的对外贸易区面前黯然失色，而这也导致这些省份的官员往往只能在地方省份内做到较高职位而很难升入中央，除非能够主管某些重点的国家工程、国家工业项目、创造落后地区因特别因素导致的极大量经济增长、在经济以外诸如少数民族治理、统战或是文化与社会稳定等方面有极为突出的成绩而被作为中央政府成员候选人调入广东、上海等地区主政作为前置考察，进而作为高级专家、专业领域技术人才或经济学者进入中央政府；如果满足不了这些条件，就算一个中共官僚已经是省级领导官员，其也很难离开现任进入中央，这样的现象逐级下沉，导致许多市级、县级官员都因为缺少空位而升迁无望。显然，袁家军、胡春华这样的翻身咸鱼属极少数，而真正具有技术能力或自身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中共官僚在这一时期更是凤毛麟角。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市委书记是国家领导人储备岗”、“江浙沪地区主官最有希望当主席”的种种刻板印象更加印证上述政治现实，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往往因为中国政府金字塔结构的天然倾向与种种不均衡因素长期呆在同样的岗位直至退休。

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坐同一把板凳的现状只会导致**地方官僚的权力集团愈发集中于某些个人**，反而扩大中国经济较落后地区政府权力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渗透，造成招商引资等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常规商业行为与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深度捆绑——这些地区的地方官僚一方面不可能通过稳健的经济发展像他们的上海、广东同僚一样升入中央，又亲眼看到在**沿海地区资产阶级壮大造成的政府权力流失、地方主官甚至需要和资本家“共治天下”**（比如蚂蚁金服上市事件之前的马云及其资本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省官僚集团完全依赖于其经济贡献，不过这些官僚并不害怕，因为他们可以迅速因为经济发展的政绩而进一步青云直上），进而被激发出失去权力的深刻恐惧，自发甚至自觉地操纵行政手段扼住资本集团迅猛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培养贪污腐败的手段将新生资产阶级关进政府权力的牢笼，通过将资本发展的节奏与资本家主动令官员受益、帮助其巩固权力的腐败行为挂钩，地方官僚得以大权在握，成为一省、一市的“土皇帝”。而由于北京政府在此时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数据提升的态度，贪腐官员就算是造成了天大的社会不稳，只要其事态不超出一个地区或省份的边界范畴，其就几乎不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最多也只是平调雪藏而已。在这一时期，**北京政府为了安抚进一步升迁无望的地方大员、加速资本主义市场的建设，往往采取近乎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时期“笼络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治联盟态度，地方官僚的无法无天令人哑舌。**

这些较为落后地区的腐败干部虽然直到习近平上台前都不被重视，北京政府也对他们的贪腐行为听之任之，但是他们却同时能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共在较为落后的省份内基层治理体系内影响重大的一环。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新常态意味着这些官员所管辖的、庞大的地方公务员体系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共执政集团内的一股庞大趋势。如果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北京的中共中央将在许多省份内不再能够确保政策能够深入地方。

在中央层面，邓小平等人可以通过“中央顾问委员会”等特别机关实现平缓过渡并建立新的权力交接体系，但是在中国如此庞大的地方政府中，他们完全无法做到任何“和平交接”——尽管经历过毛泽东时期的官僚一波一波老去、退休，但是他们只要仍在任上一天就必然会因为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阻止任何动摇官僚特权的改革在不伤害资本主义市场的情况下深入地方（为了维护自己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外国资本家面前的“开放友好”形象，北京政府根本不敢深究此时与资产阶级深度绑定的地方官僚，更是不敢树立任何可能破坏根基未稳的资本主义市场秩序的改革），而他们的“接班人”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他们“先辈”们的宗旨，**尽全力防止改革开放造就的新生资产阶级过度干涉党国内政与地方机关的治理体系。**

正如先前所论述过的，市级以下的各基层单位的党政划分并不清晰，县委书记与基层各单位（村委会等）书记、主任基本隶属于党务官僚的范畴，虽然权力较大、级别较高的地级市和省份主官能够通过贪腐的手段维护权力，而上行下效，导致在市级以下的广大县、乡、镇地区也出现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导致的贪污腐败以及由这些现象支撑的地方政府权威幸存，但资产阶级壮大与上级单位要求扶持民营企业的政令也确实导致他们丧失许多改革开放深入地方前八十、九十年代时所拥有的裁定权，而不得不与外来投资者与资本家协商本地发展事宜，许多2000年前后的影视作品中所体现的“官商一体”、“容纳资本”等情节正是反应了这样的时代背景。不仅如此，贪污腐败横生虽然抑制了资产阶级绕过中共官员建制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也同时将地方政府的物质利益置于资本家的经济活动与黑幕交易之上，变相地促进了资本集团以另一种方式渗透中共的党和政府机关。

这一现象同中国县、镇级官僚数千年以来作为“父母官”维护自身权威与统治力的阶级利益严重冲突，进一步刺激各地官僚的严重不满并导致中共基层控制力减弱。在2010年前后，有许多反对江泽民、胡锦涛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共内部反对派都曾试图利用各地党员与干部对这一现象的不满大做文章，其中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在重庆妄图通过动员并控制群众运动唤起工人阶级对过去工人国家时期的怀念，进而巩固自身民众支持并要挟中共中央选择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前任重庆市委书记，“太子党”成员薄熙来。薄熙来是中共内部保守派干部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元素与“父母官”身份糅合的代表人物，曾在重庆主政期间尝试打压外资与民营资本的无序扩张并重建国营企业的关键主导地位，并得以号召一系列重庆辖区内的地方官员效仿。**尽管薄熙来**

在党内斗争中败于以习近平为首的诸多其他意识到他动员群众行为所具有的巨大不可控因素的官僚，他所引发的诸多政治事件仍然成为一个分水岭，既将中共党内斗争日益扩大的风险暴露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也另愈发恐慌的许多中共官员意识到即刻更改航线迫在眉睫的必要性。

上述的腐败问题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而进一步扩大。由于分税制的逐渐落实与固化，中央对经济较好、经济责任较高的许多地方政府的掌控随着财权转移与地方政府对大多数行政事务所属事权的全权负责进一步弱化。分税制明确将税收收入按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却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这种“收入中央、支出地方”的格局导致上一周期的地方财政收入往往不足以覆盖下一周期庞大的支出责任，从而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其他融资渠道，如加大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各种地方融资平台的依赖。地



方政府在自主筹资过程中的行为极大增强了其财力和决策自主性，但是也极大刺激了各级政府对当地资本家和民营企业的依赖性，直接增强了各地资产阶级对政府财政政策的直接影响。

先前所提及的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 4 万亿刺激计划，催生了地方大规模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化解政府入不敷出的现象，但是也创造了大量新的公共债务，为未来激

化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矛盾埋下引子。自 2010 年起，许多地区的地方债务总额占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2010 年已达到百分之十五左右，而隐性债务规模远远超出公开统计数据，根据一些估算后累计可达到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些地区有的是改革开放的重点实验地区，有的是内陆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无论如何，地方债的炸弹只能通过滚雪球的方法解决，也就是不断扩大新的政府投资、创造新的经济需求、以一笔债务化解另一笔债务、以新投资化解现有投资所需的收益。这一切投资需求须依靠改革开放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重点地区的“龙头产业”扶持，比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万科、恒大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企业。他们依托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通过社会融资、贷款与先前政府公债的叠加掀起一股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带来中国长达十几年的高债务、高投资、高回报经济增长。

显然，这样极度依赖企业和政府社会信用的举债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需要某种庞大的社会力量为其背书的一一这一力量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性扶持与鼓动，在 2010 年代风靡一时随后暴雷的 P2P 个人贷款时间也是这一资产阶级头脑过热的副产品之一，很好地阐释了这种**举债型经济模式极差的稳定性与不持久性**。就像 P2P 必然因为坏账而爆雷，地方政府一环套一环的公共债务扩张也随时随地都处于危机之中，这就导致他们不得不通过更大的注资实现债务抵消、维护体系。不过，此时的中国社会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高涨的热情和极好的预期，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都满怀赚的盆满钵满的期望，随时准备吃的满嘴流油——不断扩大的公债和基建扩张象征着投资机会、象征着利润，而资本家必然会哄抢利润。巨量企业在政府的包装掩饰和积极预期下对这些投资机会的争夺创造了更多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进而形成又一个恶性循环，创造中共执政危机到来时有一个巨大的“薛定谔的原子弹”。

与这些往往被称为“保守派”的贪污官僚相对的，是在华东（如江浙沪）、华南（如广东）等改革开放后迅速自由化、对国际资本门户大开省份主政的官员。在这些地区主政的官员因为中国政府举全国之力创造的资本主义金融、工业窗口，可以通过更为“健康”的企业真实盈利而产生利润，并不需要触及其他地区那样危险的债务炸弹，他们往往能够直接从看似繁荣、稳定的资本市场受益，而资产阶级扩充实力所创造的经济增速也能直接折算为“有效政绩”，助他们在青云直上的仕途一臂之力。这也是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看似“贪腐”官员较少的原因，实际上，**资本主义市场对工人阶级加大剥削的行为能够直接扩大他们的阶级利益，这些官员当然不需要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官员一样额外贪腐**；除此以外，他们也不需要为扩大自身政绩而增长的地方债务炸弹而负责。无论是违反资本主义法律的贪污腐败，还是任由资本主义无序扩张、剥削工人的所谓廉洁官员，其本质上都是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器与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血汗牟利，只不过方法不同、对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维稳和动乱结果不同而已。

然而，**这些地区资本家的自由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那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能够通过与这些“门户开放”与“自由贸易”地区资产阶级的经济往来，培养起逐渐**

支持欧式、美式自由主义、反对中共统治的政治力量。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些物质基础的发展更加依赖自由主义市场规则，就连中共官员的升迁也取决于资本家生意好坏的地区，令资本家更为舒适的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和所谓的“小政府”模式（所谓的“小政府模式”和任何资产阶级专政制度都没有区别，本质上无非是通过缩小政府与国家机器的公权力将更多可供资本家牟利的公共领域投资私有化，以减少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权力这一资产阶级之间的公共契约的方式加强资本集团的独立权力，这同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是同样反动的）自然能够慢慢取得支持，就连在中共政府内也出现了汪洋、杨雄，以及上文提到的胡春华等曾在改革开放关键地区任职而支持进一步放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经济和行政控制、加速资本主义扩张的政客。**这些政治集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或“自由派”，而只是改革开放重要节点地区物质基础变化的自然产物，尚不能够对中共的执政根基造成迅速的深刻改变，**但广大中共公务员就算不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也能感受到、预料到资本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领土上继续无序扩张对社会稳定、对他们渗透社会的行政机器能够造成的破坏。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内因不同的阶级利益导致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重要节点，一个如果不迅速转变则必将令外部帝国主义势力有机可乘、像面对袁世凯北洋政府时一般激化中国的地方主义倾向，进而造成全国的政治分裂与动荡——处于两个互相对立的极端位置上的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内的“建制派”，他们希望通过维护个人权威与经济腐败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党内自由派”，他们直接从资本主义市场的繁荣发展与资产阶级的壮大而收益，希冀进一步“解冻”。

然而，正如上文所说，他们能代表的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两个极端”。与这些人相对的重要政治势力是上文一直没有机会谈及的另一群“公务员”——“务实派”技术官僚。如王沪宁、陈吉宁、袁家军等高级知识分子、中央部委官员或先前提到的“重要国家工程”负责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务机关的负责人，如各地与中央政府内的中共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以及在改革开放前中期被“边缘化”的各省市中共党委书记。与那些直接参与政务和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事务官员相比，**这些专家往往更加难以同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市场产生直接的物质联系，他们的阶级利益更加直接地反应在中共作为一个执政集团的稳定存续上——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作为中共治国体系的一份子，维护整个政府的稳定运行。**无论是陕西的贺荣，还是来自华东、华南的韩正与李希都基本能代表整个“务实派官僚”集体，他们看的比“保守派贪官污吏”与“自由派中共人士”都要更远一些，既能够认识到一个稳定、有条理的资本主义市场对中共巩固地位的好处，又能够明白中国共产党过度放弃公权力、迎合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必然带来的执政危机。

事实上，能够代表绝大多数中国政府内“公务员”的阶级利益的集体，恰恰是这个“务

实派官僚集团”；在任何政府内，占据绝大多数的公务员都是行政办公人员以及身处基层、完全没有能力干涉政务决策，他们不可能像贪官污吏一般以权谋私，更是一辈子无望升任中共体系内处级以上领导岗位。这些公务员真正构成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内“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既不想看到资产阶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进一步夺取他们手中本就微乎其微的权力，更不希望中共因为外部势力干涉而自毁前程，砸了他们的“铁饭碗”。正是这些占据中国政府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公务员们作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高级政府职工追求社会稳定、保全自身利益的集体发声，才促使了习近平上台后中共的调转方向。

似乎是迎合了他们对社会不稳的恐惧，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压迫的动员也在2010年后不断激化。中共在1980年代重建资本主义至2010年前中期这三十多年的政策基本完全忽视了工人阶级任何增长物质利益的诉求，尽管保留了诸如普遍的社保、医保与低收入群体较低税收等政策，但是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与物质生活较1970年代末逐年下降；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在这三十年间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展一个繁荣的资本主义市场以巩固自身作为一个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波拿巴主义集团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对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资产阶级一再缓和，不断向他们的许多诉求屈服。

然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这个成为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政府尚不足半个世纪的统治集团在此时已逐渐慢慢意识到国际资产阶级吃人的本性，他们若是想要当这个“波拿巴主义的居中仲裁员”，那么就绝不能放任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无序扩张，尤其是当这一扩张已经威胁到中共自身的统治根基，动摇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与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的团结。中国政府必须中国工人十年以来由前所未有的经济压迫所带来的，愈发无法压制的滔天怒火泄至他处，更需要重新缓解党内矛盾外溢的巨大风险。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的中国工人集体罢工事件数较2011年增加将近整整一倍。

正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务实派”将很快夺权，组成“习近平集团”的领导核心；而政府内“沉默的大多数”将组成其最坚定的政治基本盘。同“邓小平理论”的全盘解冻与胡锦涛时期的“温和自由主义”政策分道扬镳的时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慢慢成型。

北京的阴谋家

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由胡锦涛及其“党内自由派”政治集团的操纵下，以“温和”形象自我伪装的习近平以及新一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被代表中共各地党员和官僚机关利益的党代表们在中共中央委员会指导下被确立。习近平在2014年以前曾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内外不同政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中共领导人、海外自由派、前民运人士、诸如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达赖喇嘛等反中共的宗教人士等）广泛认定为“改革先锋”、“民主卫士”，期待中国在习近平的“带领”

下继续深化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时期持续并加强与国际资产阶级利益接轨的诸多国内政策；当时，绝大多数海内外自由主义者都认为习近平的上台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一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掌权者们愿意进一步向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妥协，继续实现中国的自由主义建设和资产阶级以同政府直接协商的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成为真正的国际资本之天堂。

然而，自由主义者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官僚机构运行的内部逻辑——中国共产党并非民主议会制度中的党，其党内官僚的升迁与履职并不依靠“个人魅力”或“人设”，而是依靠政绩与顺从整个政党的机关通过其有机的执政网络于无声之中做出的集体决策。正如在上文中已经反复提及的那样，自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全速推动资本主义复兴、彻底消除中共作为“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意义以来，公务员与政治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统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合署机构内浑然一体，改革开放后的中共绝非一个政治上持之以恒、坚定理论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任何据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们在资本主义重建后的中国都只需要坚持一条永恒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左右摇摆的“实用主义”本身。习近平的所谓“亲民主自由主义”态度是由全中国与执政党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倾向渲染的，是官僚们通过紧锣密鼓、环环相扣的执政机器，以海量文书行政工作与政治指导方针，在全国暴力机器支持下得出的政治道路，这与任何个人的政治抱负或理论偏好都几乎毫无关系；或许身在北京中南海的几位大领导能够对这处国家机器的最终面貌打几个补丁，放上几块好看的牌匾，但最终，中国共产党把握地方实权的一切行政领导干部的唯一核心纲领，就是作为中共官僚整体的一部分忠诚地反映并执行这个机体通过上述的一切方法以集体思考下达的集体结论。

很明显，既然亲自由主义的态度与一味迎合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威胁到了这一执政机体的存续本身，既然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独立代表们已经开始公开发言、试图借用本国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通过仅存的民主议会制度直接凌驾于政府的诸多秘密之上、指挥这个执政党和政府的施政方针，那么这些噪音当然不能被允许存在下去。官僚集团的恐惧浮出水面，而如薄熙来等令恐惧继续深化的“鼠目寸光之辈”已经被执政党的自我清洁机制所击垮，那么习近平和整个中央自然不可能延续那上个十年的政策。

比起他的前辈，如胡锦涛和“团派”，习近平无疑是更加灵活的政客，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整个执政党内深深的不安，更能够意识到在国际资本主义于中国盈利的背后对整个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已经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和破坏——2014年前后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罢工斗争运动的高潮，而这样的运动又和不在安分的国内资产阶级企业家们联动，对中央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胡锦涛和他留下的老“自由派”班子没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仍对帝国主义势力抱有侥幸的妥协心理，认为通过适当的政治、市场经济化与言论管控的宽松能够换取一些喘息的时机；然而正如我们早就论述过的，中国的国内局势与资本主义力量之间尖锐的矛盾早已不允许任何缓和的空间——就像

1914 年的欧洲那样，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爆发已经迫在眉睫，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一般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源持续被剥削、希冀获得本土工业化的目标与中国因生产过剩而竭力寻求新市场、输出劳动生产力的需求结合在一起，在 2010 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促使中国资本涌入亚非拉地区进行投资，而这样的金融运作必然彻底摧毁欧陆和美国金融寡头输出矛盾、转嫁危机的根本方式——那就是以欧元和美元，以伦敦、巴黎和纽约为基础操纵全球货币的新殖民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当新旧两种资本主义处于利益完全针锋相对、且任何一方的失败都将导致其统治阶级彻底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帝国主义统治者们自然也就失去了任何妥协谈判的余地。这一历史轨迹将导致日后“全球不稳”的集中爆发。



不过，此时的习近平及其幕僚集团尚未认识到这一点，仍然希望同敌对的帝国主义势力妥协而——**中国资本主义全力扩张的奋力一击要等到中国国内矛盾与中共改革彻底失败，中美之间彻底脸皮。**2012 年的习近平及其集团虽然是骗过了胡锦涛及其背后依赖上海与广东金融资本支持的“团派”和“新上海帮”，以自由主义倡导者的形象登上中国政府的第一把交椅，但其本身也不是什么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或“反西方派”，而是如上文所说，只不过是代表“务实派”或“稳健派”官僚阵营的一群阴谋家。此时的习近平无非是想要以改革的方式缓解国内矛盾，以一种更加稳定、自主的方式在更为安稳的国内环境下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尽管如此，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无论是无法缓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不断累积的国内矛盾还是新帝国主义争霸时

代下吃人不吐骨头的的资产阶级行动方针都不可能允许他们实现这样的夙愿。最终，这一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将在为期五年的内部改革和对外重新谈判策略失败后，走向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最熟悉的一幕——帝国主义霸权。

全面崩盘的国内改革

经过 2012 年到 2016 年间通过“反腐倡廉运动”以及各类通过中央以空间规模自上而下运用暴力机器整顿政府与党务机关、抑制资产阶级对执政体系渗透的尝试基本成功，习近平通过 2016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代表党内广大政务官员与看似更加“保守”的地方官僚利益的政治集团似乎以自由派口中“习近平欺骗全中国人民建立极权统治”的方法再次“掌权”。从表象上看，随着“一带一路”策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术语出台，新一届中国政府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改革开放的西化大方针一下子转向为反对西化、重建宣传口径上对“党”的强调，希冀通过重建一个去“国家化”、无需“算经济账”的执政体系帮助官僚在各社会领域从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权力——在自由派与新生不满的资产阶级口中这无疑是所谓“毛泽东回来了”、“中共倒退三十年重回共产独裁”的标志；但事实上，**这并非是所谓“习近平背叛改革开放”，而只不过是中共官僚集体作出的自救选择——中共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北京中央政府抛开“经济账”，把中国的资产阶级整合起来算一笔“政治账”、成为仲裁者，逼迫中国的地头蛇们在内斗而崩溃的阴影中悬崖勒马；而中共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也绝非什么“彻底掌权的起步”，而是中共内斗愈演愈烈、国内矛盾亟须立刻转移的标志。**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上文已经指出的一个观点，即习近平及其政治力量的行为并不是所谓的政治前瞻性体现。虽然革命共产主义者能够通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出官僚集团不断崩溃的必然趋势，但在邓、江、胡时代被包容扶持了数十年的中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归根结底是一个被中共培养扶植、没有任何强大独立力量，中共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更多来自对西方帝国主义介入中国事务、阶级矛盾不经缓解继续扩大，以及 2010 年后资本主义不断扩大所带施加的“未来阴影”，而不是所谓能够随时被“自由派”夺权的迫在眉睫的政治威胁——习近平集团和中共官僚做出回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内部的不安与恐惧所导向的自发行动，而非自觉的政治规划——中国的历史很长，同地方金融资本与“实业家”勾结而逐渐脱离中央政府控制，拥兵、拥权、拥地、拥金而自重乃至自立的官僚和“地头蛇”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大清帝国正是亡于地主阶级和军官集团（北洋军阀等）的阴谋勾结，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正是由于地方军阀内斗、全国财阀资本家为牟取暴利而坐山观虎斗才能够制造出足以令其如此迅速就亡国的巨大危机；是历史的阴影导致中共绝不希望重蹈其资本主义先辈们亡国的覆辙。当然，**自由派资产阶级不乐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一个强大的波拿巴主义中共集团能够对其产生远超完全依赖税收和贿赂支撑财政的国家化的中国政府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意见并不能产生什么关键作用。他们虽然渗透了中共的执政机器，但是**

截止 2016 年他们仍需附属于更广泛官僚 - 资产阶级集团的小阶层。因此他们自然也可以迅速被重新打压，纳入官僚的全面掌控之下，再次成为更彻底的、辅助中共官僚集团掌权的工具。

许多自由派和欧陆与英美学者、政客使用“习核心”、“习近平集团”、“习派”等词汇指代随着习近平上台而“掌权”的一股政治力量，包括但不限于习近平主政福建、浙江时期的“属下”。这一说法当然有迹可循，毕竟此时的中共中央为巩固权威、加强信任，必然需要一批拉帮结派、称兄道弟的政务官员执掌全国事务，派系政治和山头主义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执政联盟通过国家机器划分势力范围、巩固自身物质利益的方法。只不过，这种说法把中共的最高权力机关降格为仅仅是一群通过“仕途”走上个人成功道理的官僚结盟的小圈子堂口，而彻底忽略了**中国共产党体制本身为习近平执政赋予的“党内法统”与“政治支持”——简单来说，就是一群官僚为了维持自身的政治权力动员起来支持习近平执政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中国政府的国家机器层层渗透。**

于是，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在党组织建设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新政策。**中共不再追求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党政分离与中共的橡皮图章化，而是完全接纳了党的国家官僚化，并试图通过一个看似强大的党的力量，将整个政府融入党的管理体系。**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地方的主要行政事务往往由市长和“政府官员”而非党的书记这类“党务官员”操办，著名案例如山西省大同市前任市长耿彦波，上海市前任市长韩正等，都是在任职市长期间取得突出政绩、主管辖区事务而党委书记并不占据重要政治位置的代表人物。（韩正在 2017 年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市委书记，这里指代他任职上海市市长的 2010 年前后；即使是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后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韩正也因为上海在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位置，在任期内对实际政府事务的直接掌握低于其上海市市委书记任期内的上海市长应勇、杨雄等）。党的书记和事务官不再有任何政务官与事务官意义上的差别，而彻底成为了公务员仕途的不同升迁阶段，中共给这一整个进程打上了所谓“党指导一切”的大旗，妄图通过复兴对毛泽东时期党务机关崇高地位的追忆而赋予根本意义完全不同的党国一体化合法性外衣，以政治威权的中共统治全国。

不过，一个政党的存在需要一定阶级的稳固支持和一种基于阶级立场、能够团结全党的真正的意识形态，而当前阶段，中共作为一个实用主义为体的政治机构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它既无任何意识形态魅力，也无法从政治性角度直接团结任何阶级；因此，中共只能通过中央与地方高级别行政主官中扩大“讲政治的技术专家”（这些人选能够给绝大多数中共官员带来“可靠掌舵人”的印象），在地方上增加党的规模（截止 2024 年的超过 9700 万党员）以尽可能地笼络更多不同阶级与集团并保留甚至增加市级、县级主官中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与其他“政治色彩较弱”的公务员数量以抑制老派保守官僚的贪污或迂腐作风、维护稳定，但这反而进一步导致党员与官员之间的差异过大，阶级成色、出身背景五花八门，这些人的唯一共同点是对“党”或任

何意识形态没有任何信仰上的忠诚——他们要么是出于朴素爱国情感加入政府，要么就是完全为了追求个人仕途的机会主义者；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官僚国家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可能遂中央高层官僚们的心愿，因为一个无论思想还是成员的阶级立场都极度分裂的组织是绝对不可能维护其作为一个“政党”的独立力量的。

正如我们在改革开放数十年进程中所看到的，党需要在城市不断创造新的资产阶级，并在农村通过重新建立私有化与雇佣关系，加速人口的财富与阶级分化。失去强有力的工人阶级专政制度与基层动员能力的中共不得不在地方上采取和先前不同的另一种治理模式，也就是农村宗族势力和地区集团的卷土重来以及这些势力融入党国体系的过程——由于缺乏优秀的，愿意为社会主义理想做出贡献的青年干部与党员，中共不得不从利用其他方式吸纳新的党官僚。



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省市级地方政府的技术官僚也并未放弃通过各种手段对抗地方势力对行政机器的政治影响。地方官僚打造自己的“独立王国”的政治手段要么创造本地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通过类似中华民国时期晋系军阀阎锡山的封闭治理模式削弱中央对物质基础的直接掌控，要么是以拉帮结派等政治手段形成联合体。显然，中共拉拢基层知识分子集团、重新巩固地方政治掌控力的尝试缺少不了地方公务员体系的协调，因此直接公开矛盾并进行对抗是不可能的。针对此问题，习近平政府使用了非常高明的手段，即其人上开展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政策。通过纯粹的政策性帮扶，中国政府鼓励较为发达地区的企业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大额投资，并将落后地区的农产品以政府分工的形式派发购买份额予经济更为发达地区的单位和个人作为消费者，以此为基础扩大市场的消费能力，同时削弱落后地区的经济独立性，同时也拉拢了一部分农村人口并通过物质条件增长、经济发展的事实令许多地方官直

接获益。

改革开放后极速扩张的官僚行政权力与生产过剩问题通过乡村基础设施扩张与生产力转移的方式暂时得到缓解，这也是许多建制派支持者引以为傲的事情，即通过大量国家投资消灭短期贫困的现象。消灭贫困、提升农村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以及推行通水通电通信号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准提升当然是革命共产主义者乐于看到的，但是一个对受剥削压迫阶级有利的事件未必是资产阶级善良的体现——相反，绝大多数这些事件体现的都是资产阶级利用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需求巩固自身权力的尝试——对于脱贫攻坚这一政策也是一样。由于政府强制干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背书，在疫情后掌控力大为下降、债务危机爆发风险剧增的情况下，许多曾经建立起某些产业、被安排到某些“对口市场”的欠发达地区迅速面临产业濒临破产的窘境，同时，基础设施扩张并没有解决受剥削的工人消费动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将一些农村的土坯房和瓦房翻新成现代化的公寓楼的确会让短期的财务报表更好看些，但住进去的人拿的是政府补贴、做的工作依然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从一开始，这样政府通过消耗国库延缓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方式还能暂时持续，可随着客观市场并没有得到有效扩大、工人阶级消费能力并没有提升，这样饮鸩止渴的方法带来的仅仅是债务危机进一步滚雪球、向内陆投资的企业愈发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

回到政治问题上的分析：正如之前所说，巩固中国的资产阶级官僚集体的运行稳定的一大“法宝”就是在已有的政府官员与完全拥护中共统治地位的城乡、城镇结合地区小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地方新宗族势力“地头蛇”中加速入党进程来创造一个看似辉煌的政党。这些势力的重建是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复辟所必然导致的，但是他们对执政体系自下而上的渗透与改造却是由中共官僚“开闸放水”所开始的——毕竟，在农村和地方政府管辖的广袤欠发达地区中所找出的“专家候选人”与“有志知识分子”几乎只能来自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随着愈来愈多这样的人入党、加入政府，他们背后的地方势力也加入中国的政治牌桌，中共意识到地方公务员与本地资产阶级沆瀣一气创造出的一批不受上级政府制约的资产阶级“独走”所带来的危害性，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些新资本家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巨大冲突。应对这一问题，北京政府采取的策略是**尽量促进地方资本国家化、政府话，使各类资产阶级能够通过中共的执政机构加入政府，给予其物质利益进而要求其将资本掌控权的一部分交予国家监管，尤其是那些和地方公务员已经有人尽皆知的联系产业。**

例如，浙江省的许多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愈发疯狂地追求加入政协、人大等机关，而他们往往和某些“家族公务员朋友”有错综复杂的联系，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中共不断干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发展轨迹，通过增加对“爱国民营企业家”（例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策性支持，促使这些较小规模的资本家与他们达成政治协作，为中国政府装点门面。另一方面，中共急于在地方上恢复中国传统的“父母官”模式，逐步打破了公务员的地域回避原则，直到2011年仍然强调的同市出身官员不得在本地任

职的规定如今基本成为废纸一片（这是当年北京政府对抗贪腐几乎唯一的有效方法，随着中共统治成本的暴增与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官僚短缺而不得被废除），诸如山河四省等难以吸引政治人才的北方地区地区、县级政府与党委中相邻地区或省内干部任职比例超过75%（2017年）；借助官员的个人威望以及朴素落后的、对于官员和执政体制的个人化认同，中共才得以在乡镇地区维持大不如前、难以为继的地方掌控力——以北京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进一步“隐性缩水”为代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虽然以“官二代”为代表的权贵官僚子弟因习近平集团上台后为平衡党内利益并提拔“稳健派”专家而消灭“太子党”后逐渐淡出政治核心圈（如内蒙古的乌兰夫家族彻底被空心化、排除出中共执政集团等事件），一批“出身高贵”的城市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得利益者集团却在习近平对这类主要为城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僚的需求下掌管了主要的中央权力和升迁渠道，使得地方势力依旧难以进入党的中央治理机构。这一现象刺激地方官员要么铤而走险，面对北京政府“反腐倡廉”运动清洗官僚队伍的威胁依然选择与宗族势力和地方资产阶级集团通力合作，继续巩固这些社会力量通过官僚个人对整个体制的影响力，导致地方主义的利益集团规模进一步扩大；要么彻底不再有上进心，不再追求“吃力不讨好”的政绩——2018年以来全社会对公务员“铁饭碗”的追捧与强调无疑证明公务员作为稳定收入职业而非追求政治权力场所的属性扩大，这样的属性将被经济危机的弥散进一步强化。

无论是“十八大”以后“不收手、不停手”的腐败官僚，还是因为中央政府的维稳与调和利益措施而放弃“上进”、懒政的官僚集体，其都能代表中央与地方政治目的、物质利益的不一致。由于地方强力集团的介入、非党力量的干涉以及官僚体制在自我清洗政策下导致的动荡，中共愈发难以作为一个拥有超然地位的政治实体掌握国家。**中共尝试将极度庞大的资本主义行政体系融于自身的尝试自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失败，北京的中央官僚们完全忽视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与庞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对波拿巴主义政党强大的渗透能力，结果只能是其被中国庞大的地方政府体系彻底反噬，越来越丧失其独立性。**在许多县城政府与地方党委，中共与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要么成为宗族势力，城乡资本家与政府官僚“角逐权力”的战场，要么成为地方“懒政不作为干部”的茶话大会。

2016年后的中共完全体现了中国国民党在1930年代的特征，这一进程可以总结为“共产党的国民党化”。随着传统的党权与国权、地权界限丧失，地方执政机构彻底丧失意识形态热情的驱动力，“党和政府”在中国十几亿民众心中的地位要么沦落为旧社会走“仕途”的“官场”，要么沦落为“衙门”，而非那个改革开放之前，笼罩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官僚集团对广大群众的号召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衣治下，掌握国家每一个政治齿轮的，具有超然地位的、拥有巨大意识形态驱动力和魅力的、来自革命时代之遗产的中国共产党。随着资本主义因生产过剩导致的周期性危机以改

改革开放繁荣时期地方投资与债务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方式集中爆发，各级政府的财政储备与商业信用又面临崩溃，地方官僚只能进一步向资产阶级集团投降或是彻底“躺平”、期待安然退休。

与此同时，北京竭尽全力想要维持的强大中央又与渴望更多政治自由与自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形成不断扩大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体现在资产阶级资助下广泛出现的自由派公众人物与媒体平台上“谏言良多”所谓知识分子。**随着不可避免的政治矛盾扩大，同床异梦的中央与地方党政机关亲眼看着矛盾正吞噬全党——自习近平上台后从未停歇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与官员落马正是这种对抗的外化体现。**随着中共的政治斗争随着权力的重新洗牌与对地方政府控制力的争夺而不断激化，不同派别不断降低底线，加大这一你死我活的资产阶级内斗的力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代表的就是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及其所代表的技术官僚集团尝试通过镇压党内矛盾、整合中共作为执政集团的阶级利益，并通过行政机器与党内清洗继续树立控制力的尝试。

上述的事件随着中国在2017-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妥协、随后被第一届特朗普政府背刺，以及房地产泡沫达到高潮、中共反贪和中央政府加强治党引发的党内矛盾激化导致政治危机和生产过剩问题在2019年达到顶峰——这些危机总爆发的前兆无不向中共和北京的习近平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共的统治危机已经无法用内部改革和经济充足的方法解决。中国若是想要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强有力的一份子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找另一条出路，一条国门外的出路。**这条寻找出路的过程是缓慢的，最早从2013年“一带一路”的概念被提出而开始，随着内部危机的扩大而愈来愈被重视。显然，被剥削压迫到喘不过气的中国工人已经无法被压榨出更多利益。于是北京的双眼望向喜马拉雅山和五湖四海之外——那是追求帝国主义霸权、追求“世界民族之巅”宝座的道路。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随着中国国内矛盾的不断累积，再一次出现在亚细亚东部的平原与丘陵上。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并不会因民族与国家旗帜的更换而改变其本质。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将目光投向国门之外，寄希望于以海外扩张、资本输出和所谓的复杂战略布局化解内部矛盾的累积。这种转向并非偶然，而是由中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困境所决定的：国内市场持续疲软，产能严重过剩，地方债务如山压顶，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停滞不前——一切迹象都表明，统治阶级必须寻找新的利润来源与新的矛盾阀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赋予了某种神圣使命。它不仅是一个国内民族主义的动员口号，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全球政治格局下一切对外经济

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总称。中国政府将这种战略粉饰为和平崛起、合作共赢、互利互信的“新型国际关系”，然而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政策与百年前列强推行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并无差别——**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海外投资、军事存在与外交攻势，不过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争夺更高利润份额、确保关键资源与市场通道的手段；它的代价，则是迫使中国工人阶级为这一套帝国主义工程支付劳动、生活与权利上的成本。**

然而，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百多年前的德意志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不是列强在“上个多极化世界”里肆意瓜分殖民地的那一幕。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与数波全球化浪潮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早已从列强间的争霸与瓜分，转化为以美帝国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之下的利益交换与局部博弈。无论在亚太、非洲还是拉美，资本家阶级和各国统治集团之间的合作与勾连远多于全面的直接对抗，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样的格局下，中国政府，正如本文前篇的结论，更愿意充当全球资本的“代理人”，“管好、镇压好”近十亿中国工人阶级，把这个庞大的人口与劳动力市场稳稳锁在资本主义秩序之中，而绝不会为了中产者与小市民（即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等社会群体）幻想中的帝国主义霸权去冒险博取新时代的全球霸主宝座。

这并不是说中共无意进行资本输出或全球产业布局——恰恰相反，它必须这么做来缓解国内危机。但这些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将自己捧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顶峰，而是向欧美的“洋老爷”们展现自己的统战价值：“你们看，我替你们管中国、管亚洲、甚至管非洲都管得井井有条，你们可千万不要把我当成敌人。”可惜，这种讨好换不来安全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根本无法允许他们为一个中国代理人让渡哪怕一些象征性的利益份额。**于是，中共在现实中既要维持与全球资本的合作，又被世界局势与国内民意的双重压力一步步推向那看似强硬的道路——一条充满姿态与口号，却从未脱离资本主义利益积累之原始逻辑的道路。

我们将沿着这一现实展开分析：首先揭示中国资本对外扩张的经济意图与其帝国主义性质；其次剖析民族复兴意识形态机器在国内外的双重作用；最后对习近平路线的“强硬”表象与资本主义懦弱的本质作出评判。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将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复兴，也不是民族的复兴，而是资本主义中国在全球资本体系中的一次全新升级——而中国工人阶级要走出这条日益暗淡无光的死路，唯有依靠独立的政治力量与国际主义的团结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带一路”——中国帝国主义的双重性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逐渐崩塌。三十余年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全球需求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冲击下，暴露出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债务累积等一系列无法用常规政策调和的矛盾。钢铁、水泥、造船、家电等行

业的闲置产能长期高企，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和举债投资的模式早已摇摇欲坠。即便是被奉为经济奇迹样板的沿海制造业集群，也在产业链重组、劳动力与生产力过剩与市场萎缩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遭遇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的困境。在这样的国内与国际背景下，中国资本的对外扩张代表了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于这样一个依赖资本积累维持政治合法性的政权来说，外向型资本战略——**将剩余资本和过剩产能输出海外，争夺新市场和新利润来源**——便成为唯一可以延续统治稳定的选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早已证明，当内部市场无法支撑积累速度时，资本必然会将触角伸向国境之外，通过投资、贷款、贸易、技术和军事的综合手段，把利润来源和积累空间转移到外部。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格局中，重新走上了列强百年前走过的道路，于是，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了这一转向的集中体现。

中国政府宣称它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但细究其运作逻辑便可发现，**这是一个由国家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承包商、能源和运输垄断企业、以及**

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民营资本共同运作的资本输出平台。资金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以贷款形式流向目标国家，附带长期偿还义务、资源优先采购权、项目由中方企业承建等条款，确保在项目周期内为中国资本创造稳定回报。以2013-2023年的官方数据为例，中国对“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2400亿美元，其中70%以上集中在能源、交通和资源开发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国内产能严重过剩、需要外部消化的行业。这些“一带一路”项目的具体内容往往以大型基础设施为主——高铁、港口、能源管道、矿山开采、光伏与风电园区等。例如在东非，中国承建并融资的蒙内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与港口蒙巴萨）造价38亿美元，其中90%的资金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且明确规定承包、设备、施工、管理全部由中方公司负责，连轨道铺设与列车运营人员的培训都由中国企业垄断。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更是典型案例：项目耗资15亿美元，由中国贷款融资，但由于“港口在前期缺乏足够吞吐量带来的收益无法偿债”等理由，最终**斯里兰卡政府在2017年将港口及其周边土地以99年特许经营租约的形式交给中资企业运营。**这不仅意味着经济控制权的转移，还为中方在印度洋关键航道上获得了长期立足点。

中巴经济走廊则在能源与交通领域实现了深度绑定。中国投入超过600亿美元，涵盖公路、铁路、输电线路和多座燃煤电站。这些电站长期向中国国企供应合同锁定的煤炭和设备，发电后的电力供应合同也保障了中方投资回报。然而，这类项目在巴基斯坦引发了电价上涨与债务依赖的批评，同时，巴基斯坦的国内产业链被中资高度占据，导致本地企业和劳动力被边缘化的情况十分普遍。类似的模式在赞比亚、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国反复出现：中国贷款与承包商捆绑销售，确保资本、技术、利润循环在中方体系内部流转。缅甸皎漂港和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案例也完美体现了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战略渗透的模式。这两个港口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关键项目，为中国提供通往印度洋的战略出海口，绕开了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尽管这些项目的建设资金来自中国的贷款，但项目本身却规定由中国企业承建，并长期由中方运营。例如，皎漂港的深水港项目就由中国中信集团牵头，未来可能获得90%的股权，并拥有长达50年的特许经营权，这使得缅甸在港口的运营和收益分配上处于被动地位。同样，瓜达尔港的运营权被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COPHC）获得40年，港口腹地也规划为经济特区，巴基斯坦对港口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被让渡。这种“建设-运营-控制”的模式，使得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 and 战略布局中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此外，2015年，中国山东岚桥集团以99年租约的形式获得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的运营权。然而，达尔文港作为澳大利亚北部重要的战略港口，其附近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驻扎，这一交易引发了澳大利亚国内对国家安全的强烈担忧。尽管澳大利亚政府在后期进行了审查，但租约并未被撤销。这个案例表明，即使是在传统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的长期租约模式也能穿透其防线，获得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权。

吉布提港的例子也值得一提。吉布提位于红海与亚丁湾的交汇处，是全球最重要的海

上航道之一。中国不仅投资建设了多哈雷多功能港口，还在此建立了中国首个海外军事保障基地。尽管中国官方声称该基地仅用于后勤补给，但它与港口的紧密联系不言而喻。通过对港口的投资和运营控制，中国为自身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后勤保障。这是一种“以经济筑巢，以军事固巢”的模式，港口作为经济工具，为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服务。

显然，**这种资本输出并不单纯是经济行为，其也同时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债务依赖和基础设施控制使得目标国家在外交政策上更易与中国保持一致，从而为中国资本在欠发达国家构建势力范围提供了地缘政治支撑。汉班托塔港在国际航道上的战略位置，使中国得以在印度洋的能源运输线上建立长期势力存在；中巴经济走廊的公路与能源网络，使巴基斯坦在外交上更倾向于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立场。这种模式与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的“债务外交”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列宁在他的若干著作，尤其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批判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此类“高利贷帝国主义”）：先通过贷款和工程项目绑定目标国，再通过债务和基础设施控制形成政治影响。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一直避免传统的殖民主义手段，即使用直接的殖民占领或军事征服，而是利用全球化的金融与贸易规则，把自己塑造成“发展伙伴”，因此塑造了一个“全体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的形象。**不过显然，这种差异并不能掩盖其帝国主义的实质。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并不打算像旧殖民主义那样全面取代西方资本，更无意主动挤压美国或欧洲资本在全球的核心生存和政治空间。它的目标是最大化自身利润、确保关键资源与市场通道、并借此缓解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中国企业需要剥削广大亚洲与非洲国家的资源，也同样有赖与欧洲和美国企业的合作达成广泛的“共赢”。在许多“一带一路”参与国，中国资本与西方资本并非零和竞争，而是长期合作与分工：在巴基斯坦，能源与交通由中方主导，但金融体系、部分制造业依旧由美欧和海湾资本控制；在非洲，矿产开采项目常常是中企负责基础设施建设与初级加工，而最终的高附加值环节（典型如钻石和黄金产业所催生的奢侈品行业，铝和其他金属开发所产生的末端汽车制造业等等）仍由欧美企业掌握。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体现——一带一路自始至终都无意真正挑战美欧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更遑论取代他们。

正因如此，中国的海外扩张呈现出一种“双重性”——**在国内民族主义宣传中，它被塑造成与西方帝国主义平起平坐、甚至有取而代之潜力的“新型大国”，而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它是全球资本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是美国主导秩序下的一个遥远东方国度的稳定承包商。**这一双重性既是出于中国统治阶级试图维持国内稳定的需要，也是其在国际体系中生存的现实策略——但这一策略的内在矛盾在于：它既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生产力过剩危机，也注定无法真正获得西方核心资本集团的平等接纳——毛泽东曾经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通过友好竞争自然是无法夺去政治“统战价值”的。就像胎死腹中的亚洲经济联盟和中日韩自贸区一般，一带一路几乎永远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地缘政治摩擦中不断被迫调整姿态。**就连自由派所渲**

染的所谓“中国海外军事基地”代表的帝国主义军事扩张，也仅仅是在吉布提港口，一个几乎所有强大资本主义国家都拥有驻军的地方，修建了一个供海洋巡逻的港口而已。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共的实际“生态位”是世界工厂的牢头，而绝非屠杀“恶龙”的“勇士”。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反噬

在这现实双重性中，“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政府所主导的更广泛的海外扩张被国内宣传机器赋予了极高的象征意义。中共深知，单靠海外项目的经济回报不足以在短期内稳固其国内统治，他们必须将这些资本扩张性质的工程包装成民族复兴的标志物，让它们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成为全体国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被动参与的国家集体荣誉工程。这种包装方式并不新鲜，它与美国人的“上帝保佑美国”、一战时期的各类“泛民族主义”乃至二十世纪的军国主义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在对内动员上的做法如出一辙：**以虚伪的宏大叙事和民族自豪感掩盖其资本主义扩张的实质，将社会内部的紧张转移到对外的竞争与“赶超”上。**在中国的主流媒体和教育体系中，“一带一路”被反复描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象征，也是构建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新闻报道和纪录片强调的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互利共赢”的故事（张维为、沈逸之流每天高强度念叨的中国自信，我想读者们都不会陌生），而从不提及项目背后的债务结构、目标国本地产业受排挤、工人被剥削压迫等事实。（它们也必然不会提及）

于是，影视作品与文化宣传承担起了为中国资本扩张正名的任务。无论是讲述海外工程建设的电视剧，还是表现中国企业与外国“兄弟国家”合作的纪录片，都强调中方

的慷慨、勤劳与技术优势，把资本输出塑造成道义与责任的结合。这类作品中的外国形象往往是友善、感激甚至依赖中国的“伙伴”，以此反衬出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和“复兴”进程——不过中共在这一问题上似乎已经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高强度视觉化的民族主义动员不仅强化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浪漫想象，更是为中国狂热的小资产阶级和市民集团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似乎明天中国就可以团结起数十个“被西方资本压迫”的“亚非拉兄弟”，对美帝国主义来上“最后的反戈一击”。**对中国光辉外交形象的高强度复读似乎让民众忘记了，中国公民还在家门口的老缅泰被一波又一波的诈骗集团割取器官；他们似乎也忘记了，“黄皮肤小眼睛”的东亚病夫形象至今是从里斯本到大马士革之间每一个国家每一寸土地上的统治阶级对中国人的唯一印象；他们似乎更是忘记了，中国资本的扩张无法带来外国人民对中国人的尊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在2025年1月3日的报道中引述多方消息称，莫桑比克在总统选举争议引发的骚乱中出现大规模排华浪潮，不少中国人经营的商店被洗劫，甚至有人驾驶中国援助的装甲车冲撞华人超市。报道还提到，一些当地舆论将中国在莫桑比克的投资和援助视为“与腐败政权结盟”的象征，并在社交媒体上用“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来形容这种关系。

显然，资本扩张与民族主义宣传并不能掩盖西方霸权与欠发达国家被剥削压迫人民对中国政权的巨大敌意，这对于想要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有自己作为帝国主义力量的一席之地中共是必然的。显然，这种宣传在国内发挥着巨量的稳定政权功效，通过制造民族共同体的虚幻认同感掩盖国内的阶级分化与利益冲突。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民族主义是一种成本极低、效果显著的政治工具，它能够在短期内缓和社会不满，同时为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提供合法性。然而，这种民族主义与真正的反帝国主义毫无关系，它并不主张工人阶级跨越国界的团结与联合，反而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进行合作与分工，将工人与工人之间可能的联盟扼杀在萌芽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在国内话语体系中的功能，并不仅仅是经济宣传，而是整个所谓“民族复兴意识形态”机器中的关键齿轮。它既向内提供民族团结的幻象，又向外传递中国愿意在既有国际秩序下承担“包工头”角色的信号。在这种双向功能的运作下，中共既能在国内压制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诉求，又能在国际上避免与核心资本集团发生根本冲突。这种姿态，正是它在“强硬”外表之下的真实面貌：谨慎、投机、以维持资本主义秩序为最高原则。

这种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民族复兴”宣传工程并不仅限于媒体和影视，它早已渗入到教育、学术、外交话术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小学教材、大学课程以及各类干部培训班上，“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被人为连接成一条“历史长河”，明示这是所谓中华文明“天命”的自然延续——**这种叙事不仅塑造了国民对海外扩张的认同感，更在潜移默化中淡化了阶级矛盾，把国内经济困境的责任转移到所谓“外部挑战”的应对上，让未来的各类专家、社会精英和地方干部习惯性地**把资本输出视为“无可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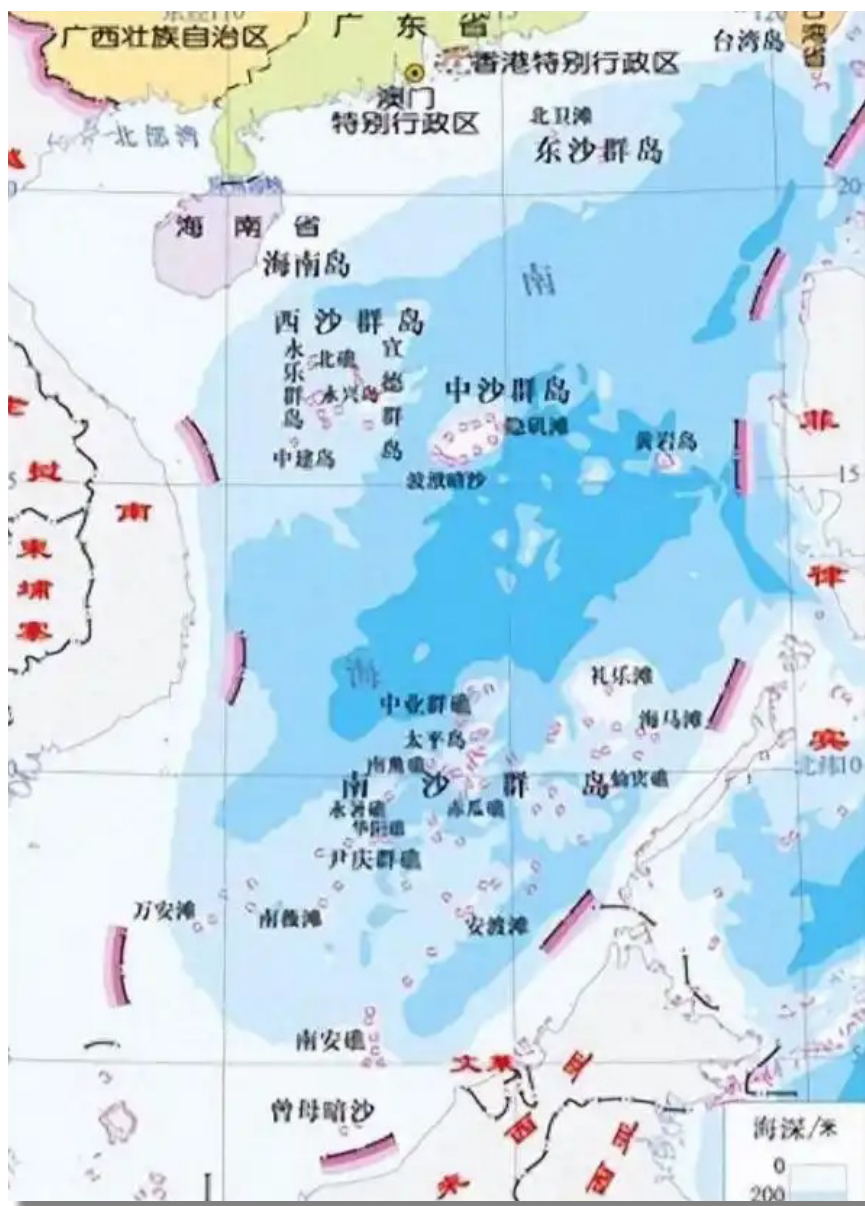
辩的国家责任”。中共在运用民族主义时尽力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它需要民族主义来动员国内情绪，掩盖阶级矛盾，为资本输出与海外工程提供合法性；但它又必须避免民族主义演化为失控的民粹主义或激进的对外冒险主义，尤其是要求“真正对抗日本和欧美”的群众诉求。过度的民族主义会逼迫政府采取高风险的对外政策，而这与它想要在全球资本体系中安稳生存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我们看到，中共的对外姿态经常是表面强硬、实则留有巨大的退路：在外交辞令中不乏“坚决反击”的口号，实际操作却常常是谈判、妥协、利益交换。

这种表面强硬与实质妥协的反差、内部宣传和国际事件的反差，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外交中已成为结构化、制度化的操作模式。它不仅是一种策略性的形象管理，更是统治阶级在内外矛盾夹击下的本能反应。对国内而言，“坚决与日本帝国主义、欧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姿态有助于维持民族自信心与政权的威望；对国际而言，背后的妥协与交换则向全球资本和西方列强传递了中国的可预测性与合作意愿。换言之，中共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所谓的双赢体系：**面对国内民众时，它强调“国家尊严”和“绝不退让”；面对国际资本时，它强调“规则遵守”与“互利共赢”**。然而，这种平衡有着脆弱的前提——它假定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是可控的、可被调节的，更假定西方资本愿意让中国人拣去它剩下的残羹剩饭。中共利用民族主义为统治加固基础的同时，也在不断为这种情绪添加燃料。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此种叙事和操作有一个致命问题：它要求国内民众相信两个互相矛盾的神话——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与所有“兄弟国家”平等合作、受到感激和尊重；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时刻警惕西方的遏制与围堵，随时准备“斗争”。在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对稳定的阶段，这种双重叙事尚能并存，但当经济下行、失业增加、国际摩擦频繁时，民族主义的受众便会开始质疑：既然我们如此慷慨、如此强大，为什么依旧在国际上被轻视、被欺骗、被算计？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投资，那些“阿拉伯人、黑人、东南亚人”，那些“本来应该好好给我们当兄弟当小弟的民族”竟敢“骑到我们的脖子上来”？为什么台湾迟迟不收复？为什么菲律宾都敢在南海耀武扬威？为什么？为什么……这种怀疑一旦积累，就会转化为对政府外交与对外投资政策的不满，而这种情绪往往不受中共的精细引导，最终反而威胁其统治稳定。

一旦外部形势的变化引发公众期待的急剧上升，或者国内经济困境削弱了民族主义叙事的说服力，这种燃料就可能反过来点燃政权不愿承担的政治风险。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反复波动、中澳、中印等双边摩擦的起伏，都曾在舆论场上制造短暂的民族主义高潮，而每一次高潮之后的政策软化，都让部分公众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佩洛西访台是一次高潮，而中共在2024年以来不断只说不对做的对台政策更是不断加深这样的情绪。这种情绪积累下来，可能会**催生一种与中共意图背道而驰的政治压力——要求它采取更加冒险、更加激烈的对抗姿态**。

对于一个在全球资本体系中高度融入、高度服从的政府而言，这种压力是致命的。习

近平治下的中国虽然具备了与美欧核心资本集团进行全面、长期冲突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绝不愿意进行这样的最后一步——**中国政府高官子女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欧美国家，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依赖的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主导的结算网络，中国资本家的国际市场需求仍是外贸和产业链稳定的生命线。**一旦因国内民族主义推动而采取激进的外交或军事行动导致外贸与投资渠道受阻，中国资本家将彻底被“逼上梁山”，丧失最后闪转腾挪的出路。



同时，深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经济必然出现国内就业、财政和社会稳定崩溃，小资产阶级与市民集团也必然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反抗中共的统治——中共统治集团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几乎所有帝国主义扩张之路与其他大国产生矛盾时都选择了妥协与退缩——哪怕在公众视野中这种退路被涂上了“战略克制”的颜料。

这种退路不仅存在于外交谈判桌上，也体现在中国的军事布局与安全战略之中。近年来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南海岛礁的军事化部署、海外保障点的设立，都被国内宣传包装成突破性的战略进展。然而，细看这些军事存在的性质与部署范围，就会发现它

们的核心目标完全不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南取百越”的前哨基地。显然，南海的岛礁更多是用来监控与防御能源运输通道，吉布提保障基地主要用于亚丁湾护航和海外工程人员撤离，甚至在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安保力量部署也主要围绕着保护中资项目和人员安全，而非扩大区域军事影响力。换句话说，这是一套为中国资本保驾护航的保安策略——显然，一个连在缅甸屠杀自家公民的军阀政权都不敢正面干涉应对的中国政府根本无力进行区域内的军事霸权扩张。

但正如前文所述，双重策略的最大风险在于民族主义反噬。一旦公众情绪被长期的高调宣传推到足够高的水平，即便是统治集团自己，也很难在不付出政治代价的情况下让情绪降温。对于一个本就依赖民族主义和对资本扩张的宣传策略来转移阶级矛盾的政权来说，这种局面无异于饮鸩止渴。它需要民族主义来维系统治，但民族主义的逻辑最终必然会要求它去承担与自身生存策略冲突的巨大风险——而在历史上，被民族主义情绪绑架的资本主义政权往往会被迫在经济理性与政治生存之间做出痛苦而危险的选择，德意志帝国、沙皇俄国、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等一个个帝国主义先辈正在路上注视着走向深渊的中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死路

如果我们把习近平治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放到上述的全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框架中来看，就会发现它本质上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外衣的资本主义内部改革**。它的经济基础是国内积累体系陷入瓶颈、资本急需通过对外扩张寻求新的利润空间；它的政治形式是统治集团在维护全球资本秩序的前提下，利用民族主义和宏大叙事巩固内部合法性；它的战略路径是在不与核心资本集团发生根本冲突的条件下，尽可能扩大中国资本的国际份额，并由此换取在国际体系中更稳定的生态位。这一切构成了习近平路线的真实底色——一种以谨慎、退路、风险规避为核心的“强硬”，一种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剥削的“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战略既没有要彻底挑战美欧的决心，也没有要实现真正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能力，它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笼子里寻找更宽敞的活动空间。**

这种路径的最大局限在于，它注定无法兑现对国内群众的承诺。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还是南海、台海、边境的“斗争姿态”，最终都无法转化为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福利的现实成果。相反，工人阶级为这些资本主义扩张项目付出的，是被压低的工资、被剥夺的劳动权利、被削减的公共服务，以及被民族主义狂热所取代的阶级意识。民族主义反噬的风险在中共的统治逻辑中越来越突出。习近平路线依赖民族主义动员来维系统治，却又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展现出不敢越界的保守本质。这种反差让部分民族主义者感到愤怒，并推动他们走向更激进的立场——要求彻底对抗西方、要求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国家统一、要求用“硬实力”证明中国的崛起——本文已经反复证明，这些诉求和资本主义中国的生存逻辑直接冲

突，因为真正的全面对抗将动摇老爷们赖以生存的整个体系。

因此，习近平治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死路。它无法通过与全球资本的合作获得真正的平等地位，因为核心资本集团永远不会容许一个潜在竞争者在体系内成长到足以挑战自身的程度，西方政权自己的内部矛盾也不容许出让利益；它也无法通过对外投资的扩张真正解决国内的经济危机，因为这些资本扩张本身就依赖于欧美霸权的市场和国际资本合作；它更无法依靠民族主义长期维持内部稳定，因为这种情绪迟早会要求它付出与资本积累的原始欲望互相冲突的代价。最终，这条道路可能在三种情境下走向终结：一种是国际资本体系的重大危机迫使中国失去赖以生存的外部支撑，在美国与欧洲政权率先崩溃的情况下“幸运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安全港湾；一种是民族主义反噬推动中国走向高风险的对外冲突乃至全面战争；而最后一种，则是国内阶级矛盾的积累突破民族主义的桎梏，让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诉求重新进入历史舞台。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在于彻底超越现有的西方资本主义霸权牢笼，打破中共作为全球资本代理人的地位。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而言，这意味着必须拒绝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中国共产党所伪造的复兴神话，拒绝为中国资本扩张和海外投资的利润付出代价，拒绝接受与本国统治阶级绑定的虚假民族共同体。**真正的反帝国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同欧美世界争夺份额，而是要彻底打碎这在数百年间压迫中国人民、夺走我们无数条性命与财产的资本主义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互相关联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的制度转型期，在这一时期，中共放弃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开始主动引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重构国内的生产方式。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积累创造制度条件——土地流转、劳动力市场化、国企改革、私有化和税制改革——而这些改革的代价，是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被剥夺，毛时代残存的社会保障体系被拆解，农村集体经济被肢解，城乡分割制度被重新固化。**这一阶段还没实现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工人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但是改革已经为2001年的彻底复辟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中期至2008年的高速增长期，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工厂”定位逐渐确立。依托廉价劳动力、土地补贴、环境破坏换取的生产成本优势，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迅速占领国际市场，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时期的统治逻辑，是用出口创汇推动积累，用投资驱动增长，用压榨劳动力来维持国际竞争力。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向型经济模式达到巅峰，资本主义也实现了彻底的复辟，但这一模式的内在缺陷也在逐步积累——对外需的高度依赖，对核心技术和市场的严重受制，对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的高度敏感，都为后来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

第三阶段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危机应对期，持续至今。2008 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引擎从未完全恢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遭遇外需下降的冲击。中共选择通过大规模信贷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来维持经济增长，结果是债务规模急剧膨胀、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泡沫化和地方财政依赖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这种“内循环”模式的代价，是经济结构更加畸形，社会不平等加剧，工人阶级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到了 2010 年代中后期，这一模式的潜力几乎耗尽，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伟大复兴”和“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危机向外转移的战略尝试。

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种向外转移的逻辑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宿命轨迹。列强的扩张史无不证明，当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海外市场 and 殖民掠夺暂时缓解国内危机时，它同时也在为未来更大规模的危机积累条件——**对外依赖一旦受到冲击，国内危机便会以更猛烈的方式爆发。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重蹈历史的覆辙**——只不过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对外扩张必须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体系中进行，必须与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西方世界核心资本集团形成合作与分工，而这恰恰注定了，资本主义中国绝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霸权挑战者。

如果说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中国被动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点则是主动在这一体系中寻找最有利的代理人位置。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中国人民而言，这四十余年的历史是一条不断丧失一切自由的幻梦——从政治权利的丧失，到劳动成果的外流，再到中共的复兴幻想取代阶级意识——一切的一切都将我们带到了这处和 1914 年的欧洲愈发相似的十字路口。而打破这闭环的唯一力量，只能靠我们自己。

针对没有翻墙渠道的读者们

推荐 VPN：魔戒

国内直连官网（任选其一）：

- <https://mojie.app>
- <http://mojie.host>
- <https://mojie.co>

打开官网注册账号（邮箱注册，常用邮箱即可），登录后台，购买套餐（支持微信、支付宝）

邮箱推荐使用 Proton，其家的 VPN 也有安全保障：<https://proton.me/mail>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